〔日〕白川静◎著
张莉 译

しらかわ しずか

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伍绍东
装帧设计　汤　磊
责任校对　余艳艳

ISBN 978-7-201-07786-4

9 787201 077864 >

定价：20.00元

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

白川静◎著
张莉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川静文字学的精华／（日）白川静著；张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201－07786－4

Ⅰ.①白… Ⅱ.①白… ②张… Ⅲ.①日语—汉字—
研究 Ⅳ.①H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784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150 千字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1/ 导读:关于白川静文字学体系

19/ 释文

53/ 释史

123/ 我的履历书

185/ 白川静先生简历

197/ 白川静先生著作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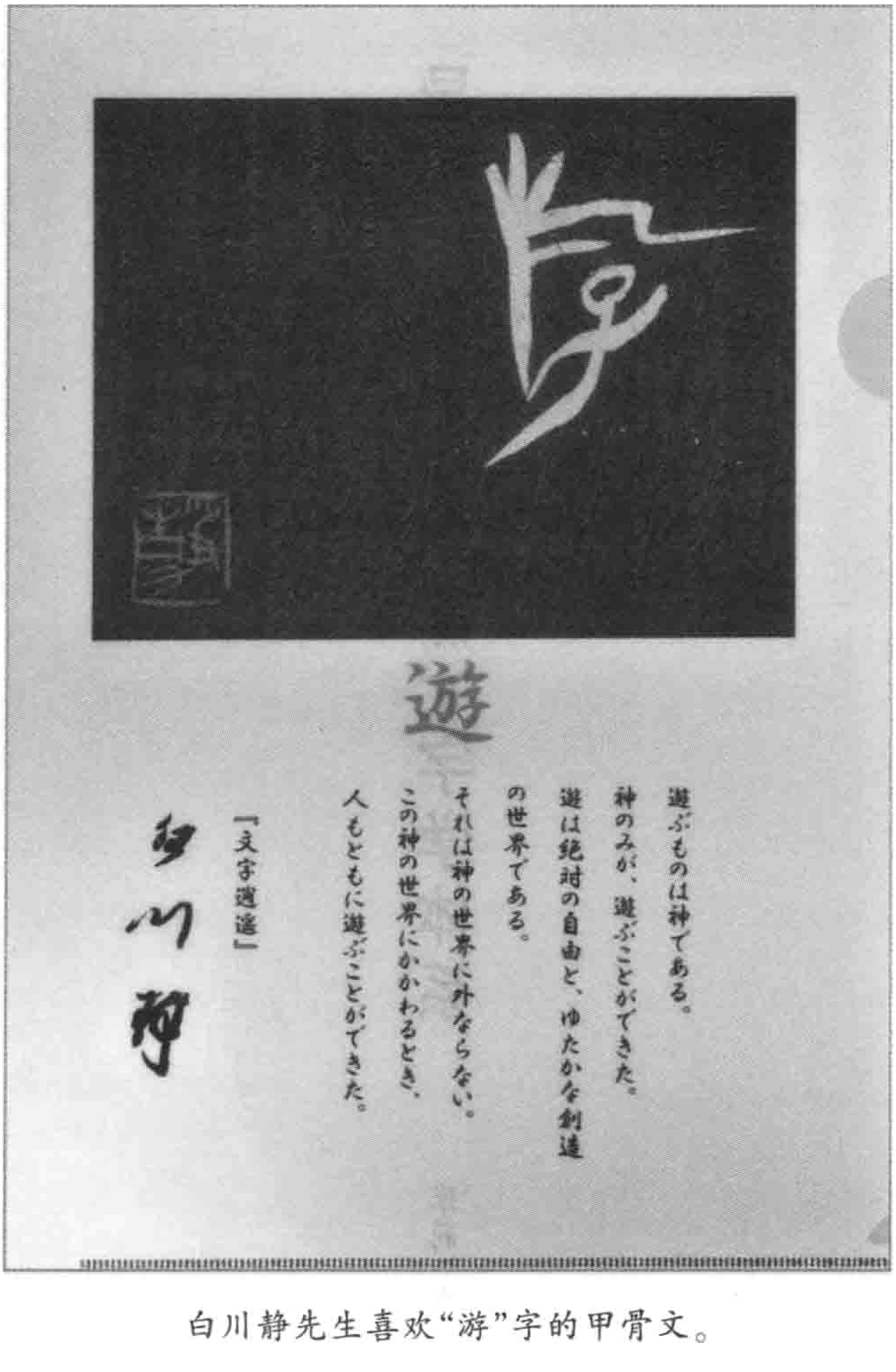
209/ 白川静著作中文翻译出版现状

215/ 我心中的父亲

221/ 后记

导读：关于白川静文字学体系

张莉／文



白川静先生喜欢“游”字的甲骨文。

白川静博士是日本研究汉字的泰斗。他的甲骨文、金文学研究在日本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文字学研究与其他专家、学者相比有独创之处,世人称之为白川文字学。白川文字学的体系不只停留在文字学方面,且涉及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及东亚广泛领域的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汉字文化是东亚突出的文化之一，因此在创造汉字的中国被置于应有的重要学术地位。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像电脑文化、简体字等只注重汉字的使用效率，从汉字的字源中可以看到的文字文化的渊博知识及其文化性好像被遗忘。白川静先生经常说"东洋之回复",我想白川静先生是在挖掘东亚文化的精髓之处。翻译白川静著作,是想通过白川先生的思想,传播汉字的文化性。在中国,甲骨文、金文的解释方面是更应该进展的重大课题,白川文字学对中国本土的文字学研究有独特的借鉴作用。

但是在现代中国,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是以前人的甲骨文解释为基础进行综合而得出自己的解释较多。在中国,公认最初解读甲骨文的有甲骨学巨匠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接着是郭沫若、陈梦

家、唐兰、于省吾等甲骨学权威。因此,他们的学说有金科玉律的倾向。我认为在中国,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前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没有获得更深的进展。

在中国,白川静著作的翻译已经出版数册,但是较难懂,错误之处较多。考虑现状,难懂之处应该加上注解。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白川文字学体系。例如,白川静的《金文通释》作为金文的参考书而著名,在中国也得到很高评价。但是现在中国对白川静的甲骨文的解释的全部内容并没有充分地了解。在中国,白川文字学的内容,只有一部分学者能够理解,其详细研究情况还没有被多数人所理解。

我尤其想翻译《甲骨金文学论丛》中的《释文》、《释史》,并希望在中国出版,是因为在中国,关于白川文字学的"文"、"口"、"史"的解释只被看作是一种学说的人较多。其理由是这些字多数是依据白川静著作《字统》。《字统》是对文字学不熟知者了解字源的概要书籍,但白川静先生解释字源为何持这样的思想几乎无人论述。与此相比,在《释文》、《释史》中,白川静先生举出多数"文"、"史"的原义进行了考证。白川静先生得出文字解释结论的思想探索过程,在此两篇论文中表现出来,可以说这两篇论文是理解白川文字学体系最适当的论著,其论证过程正是白川文字学的真正价值。论文中证据过于详细,不可否认其中有些繁杂的内容,但是在仔细阅读后,可以充分理解白川文字学的体系。

一、白川静简历、著作

白川静(1910—2006)简历

1910 年 4 月　出生于日本国福井县福井市

1943 年 3 月　毕业于立命馆大学法文学部

1943 年 10 月　立命馆大学预科教授

1944 年 4 月　立命馆大学专门部教授

1945 年 10 月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助教授

1948 年 2 月　新制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助教授

1954 年 3 月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

1967 年 3 月　京都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71 年 3 月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退休

1971 年 4 月　立命馆大学特别任用教授

1981 年 4 月　授予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

1984 年 11 月　授予每日出版文化特别奖

1998 年 11 月　授予文化功劳章

1999 年 1 月　授予朝日赏

2005 年 5 月　立命馆大学　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所长

2006 年 10 月　逝世

白川静主要著作

《金文的世界》平凡社　1946 年 4 月

《甲骨文的世界》平凡社　1947 年 2 月

《汉字百话》中央公论社　1978 年 4 月

《字统》平凡社　1982 年 8 月

《字训》平凡社　1987 年 5 月

《文字逍遥》平凡社　1987 年 6 月

《字通》平凡社　1996 年 10 月

《文字游心》平凡社　1996年11月

《说文新义》全八卷，平凡社，2002年1月—2003年3月，(《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平凡社)

《金文通释》全七卷，平凡社，2004年1月—2005年11月，(《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12卷，平凡社，1999年11月—2000年12月刊行

《甲骨金文学论丛》(油印本，1955年3月—1962年6月全十集)

《甲骨金文学论丛·上》全五集(《白川静著作集》别卷，平凡社，2008年6月)

《甲骨金文学论丛·下》全两集(《白川静著作集》别卷，平凡社，2012年6月)

2007年4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立命馆大学时，立命馆大学把白川静先生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写成的三部书《字统》、《字训》、《字通》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温家宝总理。我想，将来会有更多的译著面世，呈现给广大的中国学者、读者。

二、关于白川静博士系列字的解释

白川文字学的主要特点是系列字的研究。白川静先生关注构成甲骨文、金文的符号(有时是偏旁，有时是更小的单位符号)，及包含此符号的文字中的共通之义。同时从甲骨文、金文的系统解释来阐明殷周时代的宗教、民俗等，从文字学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的面貌。在中国，关于白川文字学体系未有详细说明，以下举出有关“ㅂ”、“鸟占”、“神梯”的系列字，论述白川文字学的方法。

1. 关于白川静博士解释口“𠙴”(sai)为祝祷容器的经过

(1)关于载书

在《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述中,诸侯与郑国结交盟约时,可见晋国的士壮子作載(载)书情况。杜预注:“载书为盟书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载书也被称为载。《左传》几篇中的载书及相关记述,是了解当时载书的形态及用法的参考文献。

《周礼·司盟》上说:“掌盟载之灋。”此“盟载之灋”的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盟载是在天子与诸公、诸公相互之间、诸公与卿大夫、国人、卿大夫相互之间进行的。其内容是战争善后的讲和、对于功勋的赐与、诸公的会盟等,还有对于国人的恩赦、对于诸侯的盟誓忠诚等。

盟誓之后,载书在盟府保存。周王室的盟府也被称为周府。盟辞由会盟者宣读,其内容当然是众所周知,日后需要时也能打开宣读。盟誓的内容把国人作为对象时,当然采用国人周知的方法。盟书除了会同之礼以外,还用于违反法令者、违反盟约者,也用于民间在契约上的纠纷,在司盟有盟约书时参与裁定;还在狱讼时、审理事实、证据方法困难的情况下,根据诅盟(对神不违背的盟誓)进行神判的裁定。

(2)关于“載(载)”字

“载”金文作“載”。声符是𢦏,“𢦏”是从才和戈的会意文字,甲骨文作“𢦏”,金文作“𢦏”。“才”的甲骨文作“丫”,金文作“十”。“才”是作为“标木”(标记的立木)的树木、在立木上加上横木的十字形之物,榜示用的树木之形,即圣标。在纵横之交处挂上祝祷之器“𠙴”。

“ㅂ”有时是用小粗点表示，可看作所谓的加上牌子的形状。《说文》六上：“艸木之初也”，从地面稍微露出新芽之形，甲骨文、金文不是此形。在甲骨文中“才”如“才三月”(《合集》三八二二三)，是“在”之意。由于立标木，净化其地祓除不祥，成为神支配之地，当时的时间、空间也有为被净化之意。“才”是“在”的初文，“在”是“才”加上“士”，“士”表示钺的头部。“王”“士”用钺的头部作为祭祀的象征表示其身分，在“在”中作为圣器(祭祀时使用的器具)而附加上“士”，作为神的支配之处，再用圣器守卫树立“标木”之处。“存”是从“才”、“子”之字。表示对孩子施加圣灵之力，因此保证孩子生存。“才”是圣标之形，在此加上“戈”成为“𢦏”。“𢦏”是净化戈之意，大概是开始军行时使用之物。“哉”是开始之意。从“𢦏”声之字有载、哉、裁、栽等，都是受于“𢦏”声义之字。也就是说由神意而有行动开始之意。“才”之声大概是从祝祷之器意思的“ㅂ”而来，由此而得声。“ㅂ”是载书(祝祷之书)。因此白川静博士把“ㅂ”发音为“sai”。

关于“载”的字义，白川静博士在《字统》中有如下记述：

> “载”大概是净化兵车的仪礼，由此开始军行。从系列上来说，才、在、𢦏、哉、载是一系列文字。《师虎毁》：“虎(人名)、载先王既命乃祖考之事”，“载”是“在”之意。《诗经·大雅·皇矣》：“载锡之光”，“载”是哉始的用法。……载的最古字形是“㞢(sai)”，“𢦏”的十字形部分的正确字形是“㞢”形。卜辞中“㞢王事”是“载王事”之意。“㞢”是放入祝祷、盟誓的容器之形。“载”《说文》一四上：“乘也”，这是把放入祝祷、盟誓的容器装上兵车开始军行之意，之后把东西装在上面称为载。

关于“甴”再补充说明一点，放入祝册的容器是“𠙵”，把“𠙵”缔结在长杆上，或者放在殳上面称为“甴”。《说文》及后世研究《说文》的学者，都把“𠙵”解释为耳口的口，施加了牵强的解释，仔细观察原初字形的话，找出含有“𠙵”形诸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困难之事。

(3)关于“告”字

“告”字甲骨文作“𠮛”。《说文》二上：“牛触人，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诸家几乎都从此解释。近人潘任记述如下：“告字当从干从口。是言必赖舌。开口舌启、始能告于人。告字当从舌。乃得舌之伸也。”林义光视为：“从口从㞢。口之所以之为告也。”这两者都是对《说文》的解释产生疑问的例子，但是以两者的解释来说明甲骨文“告”字还是困难的。吴其昌由“酷”(残酷的酷)字想到，把“告”看作斧形，“告”的本义视为刑牛之斧的形状。按其字形，甲骨文的牛作“⅋”，决不能作“Ψ”。因此“𠮛”的字形应该从与《说文》不同的观点来解释。

我认为“告”是从“木”和“𠙵”之字。“𠙵”本来是放入祝册的容器，把此容器挂在树杈上，表示把它高高悬挂之物，就是“告”的字形。在树木上悬挂之形有“磬”、“南”。磬分量轻所以能直接悬挂在树枝上，南、铜鼓较重，现存的铜鼓都有镮，可以明显看出有穿过锁的痕迹。关于祝册之器挂在树枝上的仪礼，还没有发现有文献的记述，但是从神高高在上的观念来考虑，用把“𠙵”高高挂起向神祈祷的方法来进行的可能性较大。

从甲骨文的例子来看，认为“告”是对先公、先王所进行的，把祝册挂在神圣的树杈上的仪礼。“告”的祭仪是为外寇、祸灾、疫病等的防御、祓禳而进行的。《说文》一上“祰”：“告祭也。”“告”字本来

是表现祭祀之意，对于“告”的祭祀，神意的表示称为“诰”。正像“召”与“诏”的关系一样，本来都是以神为对象的祭祀用语，用于人王无非是后来的转义。

(4)关于“言”字

“言”字甲骨文作“ ”。《说文》一上：“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䇂声。”“直言”是“无所指引借譬无也”，《说文系传》之意，“语”是联想龃龉，而“言”是直言吧。“语”的声符是“吾”，“吾”有敌、禦(御)之意，“言”是攻击性的语言，与此相比“吾”是防御性的语言之意。“言”在卜辞、金文中都作“ ”，从辛。因此此字应看作“辛”、“口”的会意字。林义光视“言”从”辛”、“口”，“辛”是罪人，“口”为耳口的口。“口”如上所述，应看作“⊌”，从甲骨文来看还是祝告的容器，向神明发誓，表示如果违言施加“辛”，正是在神面前进行诉讼之意。“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1]，其不信者，服墨刑。”(《周礼·秋官·司约》)正表现了此意。

(5)关于“音”字

“音”金文作“ ”。“言”下面是祝祷之容器的“⊌”，在里面加上“一”，表示容器中发出自鸣音。虽是指事字，“言”已经是会意字，“音”由“言”变化而来的，所以“音”应解释为会意字。故“言”如上所述从“辛”和祝祷之器“⊌”。向神祷告时，若不真实会受到神的惩罚，进行这样的誓约，把其形式形成文字，就是“音”字。如此祈祷，神有反应时在日本称“音づれ(访づれotozure)”，意谓神临发出声音。即向神祈祷时是“言”，而神的反应是“音”。

“意”也是从音之字，是臆测神的暗示之意。“意”(小篆)从心

①珥，血誓之意。辟臧，服从善恶之法。

和音。《说文》一〇下，“察言而知意也”，应该是从音之字，应谓“由音而知意”。“音”是“神音的来临”。因此由推测神意而来，“意”本来是臆度、臆测之意，由此意成为心意的意。

“暗(闇)”也是从音之字，有黑暗、沉默、幽暗等意思。“音”本来是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略微能听到的东西。“暗”古写为“闇”，经典都使用“闇”字。“闇”本来是与在庙门进行仪礼相关的字。“問”(问)是在庙门放入“ㅂ”即装入祝告词的容器，是询问神意之字。因为表现暗中、不被人所知的事物，所以产生幽暗之意。“闇”之后用于明暗的暗之意，从“日”的“暗”字，本来是神出现的“闇”之字。

(6)关于“史”字

关于中国古代官制中占重要地位的史官之起源，像周代官制多数从殷代起源的事实上来考虑那样，还是有必要追溯到殷代来考察。考察“史”字的初义，通过殷周社会发展的关联，想弄清“史”的起源和其官制整体的发展过程。

“史”，甲骨文作“ ”，金文作“ ”。关于史字上部的“中”，以前有两种代表性的学说：一是以中字为缄札簿书之类，这是清代的文字学家吴大澂提倡的论点；一是以中字为在《仪礼·大射》等所见到的筹筭之器(用竹等制作的算木)，或者作为简策之器之类，这是王国维提倡的论点。内藤湖南[①]与王国维的简策之器的想法相近，王国维视“史”字初义是王政执行官、天子诸侯官，与此相比，内藤湖南视“史”字本义为祭祀的祝告之义。

下面叙述白川静博士关于“史”的解释。

关于“史”的字形，《说文》三下：“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

①内藤湖南(1866—1934)，明治、大正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东洋史学者。

也。”这是所见到的最古的学说。《说文》中“持中”的“中”不从 。卜辞、金文中所见 、 字形与《说文》的篆字相同，从 形。在造字之初，卜辞、金文中从史字的都是载书之形的 ，不是左中右的“中”字形。“ ”是把祝祷之器挂在树枝上之形。史字是手持“ ”，向神供奉的祭祀仪式，即是史祭。上述“告”是对于灾祸等的特殊祭祀，史祭是最一般的祭祀，似乎是每月进行的祭祀。卜辞中可见“又史”祭名之语，“辛巳卜，我贞，我又史，今十月”前·八·三·三、“辰巳，子卜贞，今我又史”前·八·三·七等，每月进行祭祀。史祭的对象列举了大乙、祖丁、小丁等祖王之名。“史”之后成为史官，即是掌管记录之意。史官原来是保存史祭时的祝词，通过按照实行先例保持、记录传统的职掌，之后成为保管文书、记录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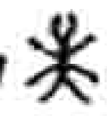
(7)关于“事”、“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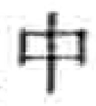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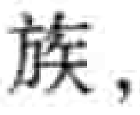
史祭是在殷国的庙堂举行的内祭，祭祀河、岳、山川的诸神时，派遣祭祀使者。使者把祝祷之器“ ”挂在大树枝上，奉此出使。树枝上部使用丫形之物，再加上旗、幡。幡在金文 中可见，是向外出使时加在旗上的咒饰。其字形是“事”、“使”的初文。“事”的甲骨文以 来表示。

“史”的甲骨文“ ”和“ ”，有时通用，从“ ”之例来看，两字之间有区别，“ ”包含到远处出使之意较多。从其字形上说，“ ”是持有树杈长杆之形。“ ”只是宗庙中捧持把祝册之器挂在神木上的形状，与此相比，可看出“ ”包含出使于远处都外之意。卜辞“ 人于河”、“ 人于岳”等，是派遣使者祈祷自然神之意；“ 人于美(部族名)”、“ 人于我(部族名)”等，是派遣使者到地方部族之意。掌管河岳的祭祀权是确立其地域支配权的方法，在其他部族施行殷的祭祀意味着其他部族从属于殷。

“事”的卜辞有如下例子：

丙午卜，宾贞，召弗由其王 　续·三·二六·三

甲戌卜，宾贞，易取由其王 　甲·三三三七

文中的是王族亲缘之族，召是方伯诸侯之族。“由王”本来是作为王室的祭祀所进行的，派遣祭祀使者让诸方诸侯奉行此祭祀，由此具有确立殷国的祭事和政治性统治之意。因此承认殷王室使者祭祀意味着政治性的从属关系，所以“事”是王事、政事之意。从以上见解看，“史”称为内祭，“事”称为外祭。

“事( )”有进行祭祀的使者和作为使者进行的祭事之意。之后有了分歧，前者成为“使”字，后者成为“事”字，本来同是 字。“使”、“事”的初文“ (事)”也有使役之意。周代金文的《叔随器》“王姜，史叔事于大保”的“事”是“使”的初文，“史”是使役助动词的用法。“使”是承接“史”的声义，“史”的使役之意暗示着后来“事”字向“使”字的分化。这些使者还担任进行祭祀，至少以包含宗教之意的使命被派遣，卜辞的“事人”、“立事”与其说是纯粹的祭祀官，不如说是带有政治性使命的派遣，由此可见祭祀和政治的分离。同时“史”和“事”在官制上也是分化的，“史”是专管祭祀祝告的职务。

下面关于“使”字的右边“吏”加以论述。“吏”的甲骨文作“ ”，金文作“ ”，原来也和“事”是同系列之字。“事”字既表示祭祀，也表示祭祀的使者，“吏”是从“事”之声义而分化的字。“吏”在《说文》一上：“从一从史，史亦声。”“史亦声”既是会意字，同时也是形声字。“吏”与“事”的字形本来相同，是从外祭之意的“事”的声义分化而

来的字。“事”是外祭之意，与此相比，“吏”是作为祭祀官被派遣进行外祭的使者。金文中的“使”是使役之意，祭祀的使者用“事”。古代“吏治”也称为“事”，金文有“卿事”、“四事”、“死事”等词语。虽不见“吏”的适当例子，“师寰盘”中叙述淮夷叛乱，有“反厥工吏”之语，是“吏人”之意。“吏”属于“史”、“使”、“事”一系列之字，可看作是后来意思分化之字。

(8)关于“口”

上述白川静博士关于“𠙵”系列字，考察了其贯通之意和系列字后来的分化过程，那么白川静博士对于“口”字究竟怎样看待，最后加以记述。

在卜文、金文可见的字形中，应视为口耳的口的几乎没有，大体上是作祝祷之器的“𠙵”形。关于以前的《说文》学说，都是口耳之口的解释，故字形解释错误极多，“古、召、名、各、吾、吉、舍、告、害、史、兄”等字，都含有祝祷之器之形。从“曰”之字有“者、曹、鲁”等，也都是放入祝祷辞之器的字形。从口耳之字，大概是后起的形声字。口耳之“口”在卜文、金文中没有明确的例子，不能确认口耳之“口”与祝祷之器的“𠙵”形的异同。

2. 关于“鸟占”的系列字

“鸟”和“隹”都是鸟的象形文字。鸟字的甲骨文作“ ”，金文作“ ”。隹字的甲骨文作“ ”，金文作“ ”。据《说文》，鸟长尾、隹短尾，这种说法难以相信。从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来看，鸟特别是图像性的具体形状的表现，隹比鸟在概念上使用广泛。两字不同声，所以本来是不同之词。鸟只用于名词，隹的用法范围广泛，也用于动词及其他。其用法大概与占卜的方法有相关之处。

殷代的占卜方法的一般形式为提出肯定与否定的两命题。例

如："贞，疾隹父乙旹"、"不隹父乙旹"，用"隹"表示肯定词，用"不隹"表示否定词。"隹"有"有"之意。"隹"的古音大概和"有"、"与"相近，有通用的关系。

"隹"是表示神意之字，也可由"唯"的字形来确认。"隹"上添加的"口"不是鸟嘴。"口"写作"ㅂ"，"ㅂ"是被称作载书，向神祈祷，是放入誓约祝词及盟誓之词的容器之形。此"ㅂ"与"隹"结合成为"唯"，所以"唯"应该是向神奏祝词、注视表示神的使者鸟的动态之字。由此而表示神的应允，"唯" 有肯定之意。遵从长者之命称为"唯"。与此相比，"雖"(虽)表示其否定。"虽"表示反论之语，是因为在"唯"的字形上附加了"虫"字。"虫"被视为作祟，称作"蠱"，是诅咒时加上的，加上其邪灵，所以神意被受到阻碍，其实现受到阻碍称为"雖"。

鸟作为媒介者，可以考虑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鸟灵的观念，早就有人之灵由鸟带来、又成为鸟飞去的想法。鸟被视为有灵之物的典型之例是候鸟的生态，这可视为是灵的往来。人们大概有远去灵界的先人像候鸟那样定时回到出生地的想法。因此候鸟飞来的水边被视为圣地，那里成为守卫先人之地。周代时把祈堂称辟雝。雝，谓雝渠之鸟名。雝为雍之意，可认为是雍字的初文，雍是鸟占得到好结果。雝的字形从隹、邕声。金文作"[illegible]"，从"水"、"吕"、"隹"。"巛"形是水循环之形，"吕"是宫室之形的祠堂，"隹"大概表示水边的候鸟。

3. 关于与神梯相关的系列字

"阜(𠂤)"字甲骨文作"[illegible]"，像神梯之形。"阜"的字形至汉碑才能见到，汉碑之前全部写作"𠂤"的字形，楷书作为偏旁使用时，省略为"阝"。

神梯是神上升下降时使用的梯子。从"阝"部之字，与神升降圣地相关的字较多。《说文》十四下："𨸏，大陆，山无石者，象形。"不可能把山写作"𨸏"。甲骨文中表示升降之字，是神上下神梯之意，神通天时使用此神梯。神梯前面的供品称为"隮"。"尊"的甲骨文作"𢍜、𨽍、𨽍"，两手把酒樽供奉神灵之前的字形。"隮"是把酒樽放置神梯之前的字形。

"際"(际)是从"𨸏"(阝)、"祭"之字，在神梯前放置祭祀桌子、供奉肉进行祭祀。神梯是神与人相接之处，天与人相感应之处，所谓天人之际，也就是"际限"(止境、尽头)的"际"之意。"限"的金文作"𨸏"，是为守卫圣所而把眼睛挂在上面的字形，所谓邪眼有辟邪之意，"匕"是人后退之形，背着神梯回去之意。从"限"的金文字形来看，与神梯前辟邪的邪眼会面，表示辟易(退缩)、向后退去之意，即以此地为界限之意。表示把此作为界限的领域，禁止进入此领域所进行的诅咒法。殷器的图像中，有数种配置邪眼之形的。

"陽"(阳)的甲骨文作"𨸏"，金文作"𨸏"。是台上的玉光向下放射之形。玉光被视为有震魂的咒法。震魂是震撼神灵、提高灵威。"陽"是在神梯前放玉之形，表示神的威光之字。"陽"上部的"日"形表示玉，下部是阳光放射之形。

"陰"(阴)的声符作"侌"，应看作"今"与"云"的会意字。"今"是有塞子器物的盖子之形。"云"是"雲"的初文，但"侌"的字形表示灵气吧。把灵气盖上封闭起来叫"侌"。"陰"与"陽"从表示神梯之形的"𨸏"(阝)，是表示在圣所震魂之仪礼的方法。《易经》中的阴阳二元论是与五行相关连后来出现的。

"墜"(坠)的甲骨文作"𨸏"，金文作"𨸏"。"墜"是"隊"(队)与

"土"的会意字。"隊"是"𠂤"(阝)与"㒸"的会意字。"㒸"是垂耳的兽形。把此兽作为牺牲使用，现在的行为是否进行，占卜吉凶。根据占卜决定行为继续时，而行为继续、遂行(执行)。"㒸"是"遂"的初文。"隊"字是在神梯的"𠂤"(阝)前面放置作为牺牲的"㒸"之形，表示神从神梯走下来之情景。那是神灵降下之地，即"墬"(坠)。"墬"是"地"的初文，"墬"(坠)变为坠落之意，后来出现代替"墬"的形声字"地"。汉碑及《汉书》中把"墬"用作"地"字的较多。

三、结语

在白川静博士的著作《字统》中，关于"𠙵"系列字有如下论述：

文字由字形表示其意，其系列字有相关连之意。从"𠙵"之字都有载书之意，形成一系列字，然后分化为曰、言、音、意，这些字又作为意符或者声符、或者作为限定符号，涉及数百字的整体形成一个体系。这样的文字体系，与其时代的意识体系相对应，其意识表现在具体的字形。

这样的文字系列之观点，是以前研究文字的学者所没有的，是白川静博士的独创之处。自古所认知的系列文字可谓是以意符为系列的形声字。像上文说那样贯通形声字之声符有共通字义，例如，供、拱、恭等字都有用两手供奉的共通之意。这些和白川静博士的系列字的不同之处是，比形声字、上文说的系列字更加分化的符号形成系列字的依据。另外，上文说表示以声为媒介，在义上也是一致的，与此相比，"𠙵"的符号与声无关，是通过字形而形成的系列字。关于鸟占、神梯的系列文字也同样。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白川静博士汉字学的先驱成就。通过贯通这些系列字之意，能够不相矛

盾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宗教的各种情形，这也是极其出色的功绩。文字的成立过程反映古代人的社会状态、观点，读懂这些可以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学术上的先辈开创的甲骨文、金文的学术成果是伟大的。因此后世研究文字的学者一直在追随着他们，这些成果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常识，在此之上没有创新。像白川静博士这样在学术上以崭新的思路勇于探索、进取的态度，我们应该借鉴。

释文*

白川静

*本文来源于《白川静著作集·别卷·甲骨金文学论丛·上》，平凡社，2008年6月。

1996 年《字通》的草稿，大约 3 万张。

一

我在《释南》[①]中论及了殷王朝与南方文化的关系，特别涉及了关于殷与西南夷文化的关系的一部分。本文关于殷与东南夷民族的关系试作了一些考察。作为此考察的端绪，想探讨"文"及与"文"相关文字的字源，并由此来推断殷文化与东南夷诸族的交涉关系。与上述的西南夷诸族不同，东南夷诸族的原委不明之处居多。因此殷与中原诸族的交涉关系难知之处居多，通过少量的文字资料，只能够作一些推测，我想现阶段只是提出问题也是有意义的。通过甲骨文、金文来考虑殷与东南夷诸族的关系，再另找机会论述。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九上："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文"部还收录有斐、辬、嫠三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错当作逪，逪画者这逪之画也。"其中还引用《周礼·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逪，画之一端也，逪画者，文

①见拙稿《释南》，《甲骨学》第三号，1954年10月。《甲骨金文学论丛》十集，1962年6月重新收录。

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关于把"文"解释为"文字"，段玉裁根据《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作了注释。对"象交文"的注释为："像两纹交互也。纹者文之俗字。"徐灏《说文解字注笺》："文，象分理交错之形，因以为文字之称，左氏隐公元年传，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即指分理言。"大意与段《注》相同。

《说文》中的"文，错画也"的解释，其后几乎没有疑问。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也多从此说。但是关于汉字的解释，最近提出诸多新颖学说的加藤常贤博士[1]关于"文"提出了新学说，说"文"是戴弁（冠名）时包裹头发的冠卷，阐述了甚复杂的字说，摘录如下：

> 此字甚难解。□与□本来为不同字。□金文的使用例与□同义，但这是借用的用法。□是《说文》心部所见"忞"的古字形。《说文》中"忞""慔""愐"排列的三字是同声同意，皆"勉强"之意。《说文》中皃字："□籀文皃，从□，上象形，□或皃字。"契文之"□"与"□"是同系之字，契文、金文"□"之上部与"□"上部为同形字。于是试考虑□（见《金文编·附录》）字，𠆢正是"□"字之𠆢，□与契文之文字同形。于是金文"□"看似取𠆢之形，实应看成□之省文。因此𠆢与□是不同之物。于是余认为𠆢是"弁"之形，□是为戴弁包发之冠卷。于是×形表现布纹之形。冠字，《说文》以"絭"解释。如从卷韬头发之意知"帣"[2]，即□字与"文"用法相同，我认为把□看作冠卷不误。此

①加藤常贤（1894—1978），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科教授。——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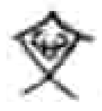
②《说文》（七下）："囊也。"——译者注。

想法从以下“彦”“颜”字来看不误[1]。

甲骨文　文　

金文　文　

金文　玟　

为论述方便，首先简要探讨加藤博士的字说。他的学说完全脱离以前《说文》的解释，的确新颖，但从结论上说，我对其字的解释不能表示赞同。第一，关于“ 与 本来为不同字”的主张产生疑问。加藤博士认为 与《说文》的“忞”同字，忞、慔、愐都是声义相通的同一字，表示忞字的 ，在金文中“文”字的使用是假借的用法。这是把 中的 解释为“心”，是从文、从心的字形解释作为前提的。然而“文”字的金文如上所示字形，“文”字中加上心字形或V形，“文”字未必从文、从心。可是大致也有看作心形的字形，金文中被使用，还有古文献中好像也存在，汉儒以来有把此字误释为“寧”的例子。即《尚书·大诰》中有“宁王”“宁武”“宁考”“前宁人”之语，都是把“文”误释为“宁”的。

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

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

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

---

①加藤常贤：《汉字之起原》(五)，1951年9月，第51-52页。

上文中，释为“宁”的字都是金文“文”字的误释，可知《尚书·大诰》原文本来是用西周金文字形所记载的。

卜文中没有单独使用“心”字的例子，在“文”字加心字形的至金文才可以看到。吴大澂在《字说》中初次纠正了此《尚书·大诰》中的误释。其《文字说》[①]所述如下：

> 《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诗·大雅·江汉》："告于文人。"《毛传》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潍县陈寿卿编修介祺所藏《兮仲》云："其用追孝于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追敦》云："用追孝享孝于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为周时习见语。乃《大诰》误文为"寍"曰："予曷其不于前寍人图功攸终。"曰："予曷其不于前寍人攸受休毕。"曰："天亦惟休于前寍人。"曰："率寍人有指疆土。"前寍人实前文人之误，盖因古文文字有从心者。壁中古文《大诰》篇，其文字必与寍字相似。汉儒遂误释为寍。其实《大诰》乃武王伐殷、大诰天下之文。寍王即文王，寍考即文考。民献有十夫，即武王之乱臣十人也。"寍王遗我大宝龟。"《大诰》郑注："受命曰寍王。"此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说也。既以寍考为武王，遂以《大诰》为成王之诰。不见古器不识真古文，安知"寍"字为"文"之误哉？

吴大澂根据金文把《尚书·大诰》中多处所见的“宁王”“宁考”的“宁”认为是“文”的误释，订正为“文”，是正确的。但是，吴大澂并没有论及“文”有时从心，具有何意义。我认为他还是采取《说文》的

---

①吴大澂：《字说》，第 29 页，《文字说》。

“文画说”吧。加藤把“文”解释为冠卷形象,“文”的形义都不相通,只不过是揣测的说法。因为“文”是与人文相关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字,大概与民族文化相关,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文”在表现整个人形中隐藏着重要的暗示。

我认为“文”是表现文身之字。加藤博士关于钱坫《说文解字·斠诠》中把“文”解释为文身的意思,与《说文》的解释一并否定为“两说都不能说明 字形”,这是应该慎重探讨的字说。近代人孙海波把“文”解释为文身[1],在此之前我国(日本——译者注)中岛竦的《书契渊源》中有同样的字说[2],两者都指出“文”的字形是站立的人形,胸部有花样的形状。

中岛及孙海波的解释主旨明确,但解释不详之处居多。特别是文身的解释,在文字学的体系中,不与其相关文字合在一起说明的话,不能完成其学说,在此试作一些补充。

“文”的下部与下边所举的“大”字形的下部极其相似,比较容易理解。这还与“立、夫、亦、腋、夹”等字形进行比较也是容易理解的。“文”与“大”字形相比较,特别是胸部较宽。于是,在宽大的胸部加上×、∨、○、凵、ψ等诸形的就是“文”。那部分相当于人的胸口,可以从甲骨文“衣”( )的字形得到确认。文身如上述“文”的字形表所示,是加在胸部上的。那是在最重要之时——人临终时加上的。称前王时,称为前文人、文考。

大　甲骨文 　金文

---

[1]孙海波:《中国文字学·下编·文字之构成》,东京文求堂刊,1941年12月,第65页。

[2]中岛竦:《书契渊源》(第一帙·中),1943年6月,第116页。

立　甲骨文 金文

夫　甲骨文 金文

亦　甲骨文 金文

夾(夹)　甲骨文 金文

文身一般是作为“通过仪礼”所施加的。出生时在前额、成年时在头部或手脚、结婚时或当父母时施加文身。施加文身之处因地域或部族的不同而异，有的地方从头顶至脚趾及全身施加文身[①]。从现在遗留的未开化民族的例子来看，在头部、四肢、胸部施加文身的居多，施加在后背、腹部、臀部的不太多。妇女的话在两乳上施加文身。这种情况的纹样左右并列施加。如下所述，奭、 、 、 或爽 就是在妇女的两乳上施加的。

男性还是在胸前施加的最多，沿着胸廓的形状施加V字形等的居多。Carl Schüster在太平洋两侧和大洋洲岛屿施行的文身中，探求以胸部为中心施加的V字形表现的例子，图示了五四例[②]。其中与中国内地接近的地方只有印度阿萨姆邦的Nagas、安南的Moi、中国台湾的Tsarisen、菲律宾的Lfugao和Lgorot、印度尼西亚的明打威群岛、Sapwak的Sca-Dayak，有文身习俗的种族除此之外，还有沿海民族之间也很多。另外现在也有失去文身习俗的种族，还有只记载于古代文献中的文身。我以为这种习俗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③]，

①例如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人，复活节岛也有这样的习惯。清野谦次：《太平洋民族学》，岩波书店，1943年5月。

② “V-Shaped Chest-Markings:Distribution of a Design-Motive in and around the Pacific.”Anthropos vol.47,1952.

③参照本文第4节。

之后随着文化的进步而消失。我国[1]在古代也有文身的习俗，好像在大和朝廷的末期已经消失[2]。检索汉字中与文身习俗相关的诸字，能够确认在殷代有文身的习俗。

段玉裁曰："遣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文是文身，彣是表现其文身的纹彩。因为人已有文身，身体的花纹全以文表示，虎文称虔（《说文》五上虍部）、文马称斁（《说文》十上马部）。彡，《说文》九上："毛饰画文也"，即是须发之形。现在的字形中从彡之字有多义，不一定只有一种意义。例如像彣彰那样表示纹彩的、须发表示毛发的、形雕表示修饰之美的等，还有像彭彤表示殷富状态的等，各种各样。从两肩到脐部、在V字形中间加上的文身是因为美丽而富有纹彩，以纹彩之意在"文"字上加彡。文章也称彣彰。彣彰的"彰"也是与文身有关之字，是施加文身器具之字。

文字的本义是在胸部施加文身，"胸" 也有胸部文身的意思。《说文》七上："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说文》把"凵"中的×解释为交字之义，但没有此意义。我以为凶字的×也指胸部的文身，凵是表示胸廓之字。《说文·凶部》："兇，扰恐也，从人在胸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曹人兇懼。'"从儿是下半身之形，兇是在人身上特别大写胸部、表示兇惧的意思。

胸的本字为匈。《说文》九上勹部："匈，膺也，从勹凶声，胷、匈或从肉。"勹是人的侧身之形。《说文》："勹，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大致正确。《说文》十四下"孕"字的卜文也从勹形。据此来说，

---

①日本——译者注。

②中国的历史书《隋书·倭国传》中记载："男女多鲸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北史》中有同样意思的文章。之后似乎没有记载倭人文身的文献。《日本书纪·景行纪二十七年》记载有把虾夷的文身作为异族的习俗。

胸的本字匈是在侧身之形上加凶、表示胸部之字。凶不只是声符、不像是匈、胸的初形，应该说是亦声。卜文的“文”字形多带有×，不是加藤学说的冠的粗布的孔眼，而是凶、匈的×。

凶系列之字(篆文)

凶 　兇 　匈 　胸 　恟

文身也施加于胸部以外，根据字形可得知在面部上施加文身。即彦也是从文之字，此字从属《说文》九上彣部：“彦、美士、有彣文章。人所言也。从彣厂声。”“人所言也”是以“彦”与“言”同音来解释的。《尚书·秦誓》：“人所彦圣也。”《诗经·郑风·羔裘》：“邦之彦兮。”《尚书·太甲上》：“旁求俊彦。”由此可知“彦”是国家出色的男子、杰出者。现在未开化民族之间施行的文身，是根据身份高低而文身有多少，文彩的纹样也有差别，拥有最美丽文身的大概是首领或是有特殊地位的祈祷医师之类的人物，所谓“邦彦”、“彦圣”的初义大概是这种意义。加藤博士已经把“文”解释为“冠卷”，“彦”也谓：“产是表现戴冠弁之字。”[1]因为戴冠的是男子，是指出色男子之称，但我已经论述不能把“文”的字源解释为“冠卷”，此彦字的解释也不能赞成。“厂”大概不是《说文》所言之声，而是指施加文身的前额部分，在前额施加文身称“颜”。

产，《说文》六下：“生也，从生，彦省声。”“产”与“彦”声不同。“产”是指孩子出生时在其前额施加文身的习俗吧。在南方的绣面蛮[2]有孩子

①《汉字之起原》(五)，第 53–54 页。

②中国南方傣族的别称。

出生后，过一个月在脸上刺文身的习俗，“产”字表现了那样的习俗吧。齐器《陈昉𣪘》：“余墬仲𢀛孙。”此“𢀛”字郭沫若释为產、读为彦[①]。“初”是初生的意思，加上新生婴儿衣服的形状，认为与“彦”是同义之字。

顔，《说文》九上：“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𩕄籀文。”段《注》把“颜”字作为“目”字的衍文来解释，《国语·齐语》韦注也引用了“目”字的解释。“眉目之间”是指两眉之上较宽的部位吧。《方言》卷十：“𩔁、頟，颜𩒎也。湘江之间，谓之𩔁。中夏谓之頟额，东齐谓之𩒎，汝颍淮泗之间，谓之颜。”把颜称额。《战国策·宋卫》宋康王“为无颜之冠、以示勇”。是不遮盖前额而显示冠冕之意。关于此问题，加藤博士说：“颜为冠覆额、或戴冠之美貌之意。”若是女子的鬒髮还可以说是美的对象，男子的冠弁能不能作为美的对象还应该怀疑。为了表现脸面之意，以在头上戴冠的样子来说明“颜”字，实在感到不自然。

我以为“颜”也称施加文身之面，其施加之处多是前额，于是在前额施加文身称“颜”吧。关于脸面的文身，从全额至头顶施加的，或者从前额、颊、鼻、耳、颌、颈等其中一部分或各部分组合施加的，虽根据种族不同而多样化，原则上文身越多地位越高，文身作为身份特权而施加的较多。“颜”本来是在脸面上刺文身的意思，因为施加文身的部位、作为脸面的主要部位是前额，所以其后产生了把前额作为“颜”的狭义的用法。可以认为在“颜”刺文身作为夷人的习俗到后来也遗存着。《左传·庄公五年》中引用的世族谱所见的郳颜，字称为夷父，名与字的字义对应，王念孙早已指出[②]，夷人有在

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𢀛殆產之异，从初彦省声，產者生之初也，故从初，字在此与和对文，盖即读为彦，美士曰彦。”见第 214 页。

②见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上下》。

"颜"上刺文身的习俗,由此习俗对于颜之名而称夷父之字。因夷人披发不戴冠,如果加藤所言,"颜"称冠弁之美,那么"郑颜、字夷父"是不能解释的。

二

文身中多次使用的×纹样,是从喜好几何学线条的古代中国人文身的一般倾向来推测的[①]。□、□、□字中都包含×纹样。四个×重叠的㸚也与文身相关联。《说文》三下:"㸚,二爻也。"这不是重叠二爻之形,《说文》的解释值得怀疑。爻,《说文》三下:"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六爻头交"的说法不是其证,卜文中与爻形相近的是"學(学)"的初形□,指有交叉长木的入母屋[②]的形状。由此可知×像两木相交、×与易爻相关是不正确的。我认为四个×的㸚之形状是表示文身的纹样。从㸚之字有爾(尔)、爽诸字。爾字《说文》三下:"丽爾(尔),犹靡丽也。从冂㸚。㸚,其孔㸚㸚。从尒声。此与爽同意。(段《注》本)"靡丽视为本义。《诗经·小雅·采薇》:"彼爾维何",毛传:"爾,華(华)盛也",《说文·一下·艸部》引用此诗句作"薾"字。我认为爾与薾是古今字。《诗经·齐风·载驱》"垂辔瀰瀰"的释文中把瀰作爾。即爾、薾、瀰为同义之字。从㸚是像花纹之多的形状,还与文身之×形相关联。禰在《说文》一上新附:"亲庙也",《周礼·甸祝》注:"父庙也",为父庙之名,又从爾。爾在此情况下多理解为邇(迩)近之意。但《公羊传·隐公元年》:"隐之考也。"根据注"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禰(祢)",此禰与祭祀时称文考时的"文"有相同的用法。我认为禰祖

---

①松冈静雄:《密克罗尼西亚民俗志·后篇》第一章二、三,岩波书店,1943年1月。

②上面是两面坡的山形,下面是四面坡的屋顶。——译者注。

与文祖之称相同，禰的音义与爾、湼有关系。

关于“爽”字，《说文》三下：“爽，明也，从㸚从大。𤕭篆文爽。”对此篆文段《注》有“浅人窜补”之语。“爽”字契文及多数金文与现在“爽”字相差极大，与“昧爽”的爽、“得喪（丧）”的喪有混淆之处。因下面举出的“爽”的第二字与金文散氏盘“爽实”的字形相同[①]，能够确认其形与声。据此字形，“爽”是由大人之形与㸚组成，我认为㸚又是“文”所从×的繁文。从“爽”字例来说，㸚是文身的纹样，加在人胸部左右的。丽尔的尔也从其形。尔称华盛、爽称爽明，都是从文身靡丽、光华而得其义。如果此“爽”字义明确的话，那么关于被视为卜辞中难解字之一的 字形也能得出释义吧。

學·斆　甲骨文 　金文

爾　金文

爽　金文

卜辞中记载有举行祀先妣的特别祭祀，这被编入祀历代诸王的五祀周祭的体系中，秩序井然地举行。其辞中王名与妣名之间加上与“爽”字相似之字，现将其字形释为“奭”字。

庚辰卜贞、王宾示壬奭妣庚翌日，亡尤　后·上·一·七

甲子卜贞、王宾示癸奭妣甲祭，亡尤　后·上·一·八

---

①“爽”字在散氏盘可见二处，如“有爽实”、“余又爽变”，有“爽实”、“不一致”之意。金文“昧爽”用“昧丧”，不用“爽”。把“爽”用为“差贰”（差异）之意都只看作假借用法。

丙寅卜贞、王宾大乙奭妣丙翌日,亡尤　前·一·三·七
壬寅卜贞、王宾大戊奭妣壬劦日,亡尤　后·上·二·九
癸卯卜贞、王宾仲丁奭妣癸祟,亡尤　后·上·二·一一
庚午卜贞、王宾小乙奭妣庚劦日,亡尤　后·上·四·六
辛卯卜贞、王宾武丁奭妣辛翌日,亡尤　前·一·三七·四
戊寅卜贞、王宾祖甲奭妣戊彡日,亡尤　后·上·四·一三
辛酉卜贞、王宾康祖丁奭妣辛祟,亡尤　后·上·三·九

劦日、彡日也都是祭祀名。根据世次与干支的顺序对祖王依次施行此五种祭祀,大致需要一年时间。这在殷朝称"隹王三祀"。

关于"奭",以前有诸说。罗振玉说:"奭有妃之谊",增订考释·中·五一、"所祭之妣曰奭。"增订考释·下·五九,关于上载辞例看作王妃合祭,因为祭日是各个干支名之日,如果干支名不同就不是合祭。王国维把此辞例解释为先妣特祭戬寿堂·释六。另外,关于字形,罗振玉释赫,叶玉森释夾(夹),于省吾释爽,郭沫若、唐兰释字形原样。关于配妣之意全都没有异议。但是关于其字形中包含的左右一对纹样的解释有极大争论,好像还没有合适的解释。首先介绍在诸家中引起争论的郭沫若学说。郭氏先举出字诸形后加以论述。

> 奭字习见,有诸异形,用于祖妣之间,有匹配义,犹言某祖之配某妣也。《戊辰彝》云,"遘于妣戊,武乙奭",则先妣后祖,义亦同。罗振玉释赫,谓与奭为一字,学者虽祖之,然其说不确。余案次字有与母字通用之例,如祖丁之配为妣己,它辞均言"奭妣己",而有一例言"祖丁母丙己"见下第一三六片,又大乙之配为妣丙,它辞均言"奭妣丙"。而有一例言"大乙母妣丙"新

> 获卜辞三三六片，又说文林部无注“从林㚔，㚔或说规模字，从大𠕁”，其音必近于模，再就其字形而言，则分明于人物之胸次左右各垂一物，其所垂者乃是乳房也。是则字之结构亦与母同意，母之二点亦象乳形，所异者仅母跪而敛手。㚔立而张手耳，此必母之古文，专用为母后字以示其尊大，盖母权时代之遗字矣①。(《卜辞通纂考释》二二页)

归纳郭氏学说，字音为模，字形为乳房，音与母相近义相通，母后之意。

奭字形　甲骨文

对此吴其昌认为左右相配之形、不像妇人乳房之形，郭氏之说荒诞不合逻辑。并且举出令彝、令尊：“今我唯命汝二人、太𠬝矢奭。”“奭”不一定是夫妇男女之间的用语，这是对太师和作册矢令的用语。但是关于奭的释文，吴氏几乎采用罗氏的学说，吴氏言“大致碻不可易”，承认奭有妃之意②。吴氏指出两点：一，此字不一定只限置于二名之间；二，不一定只用于夫妇男女之间。解释令彝之文时，此字如“今我唯命汝二人亢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我认为继续读下文才为妥当。

---

①郭氏还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9页中提出其说，主张奭与母、模同音。最近杨树达支持郭氏学说，卜文的奭作为母字的异构，来试证其音。并说明母的原义不是母子的母，把男子称某父或某甫、女子称某母。不过关于其字形没有任何说明。见杨氏《积微居甲文说》，1954年5月，第9页。

②吴其昌：《殷墟书契解诂》，《文哲季刊》第3卷第2期，1934年，第245页。

罗振玉释此字为赫，解释与奭同文。吴氏也支持此说，下面介绍其内容。

> 《说文解字》：赫从二赤。此从大从𡴀即二火之字，省二大为一，谊已明也。石鼓文，奔，从三走，卜辞中彗字，或从二又持二帚，或从一又持一帚，是其例也。此字即召公名之奭，《尔雅·释训·奭》：奭，《释文》本作赫赫，《说文》，奭从皕从大，盛也。《诗·出车》传：赫赫盛貌。《常武》传：两云赫赫然盛也。《节南山》传：赫赫，显盛也。赫从二火，故言盛。从皕，则无从得盛意，知从皕者，乃从𡴀之譌（讹），奭乃爽之讹字，卜辞或作ㅂㅂ、UU、ⅩⅩ、ⅩⅩ者，皆为火之变形，许书又变百从皕，愈变而愈失其初矣。卜辞中，凡王宾之以妣配食者，则二名间，必间以爽字，《戊辰彝》“遘妣戊武乙爽”，爽字虽在二名之下，义亦相同，卜辞又云“有爽”，犹言有妃也，是爽有妃之谊。许书奭字注：召公名，又引史篇召公名丑，二说不同，疑召公或名奭而字丑。古人名字，谊多相应，丑训比，卜辞对父言称匕，意爽亦有妃谊，此古谊之仅存者。（《增订考释·中》五一页）

罗氏的学说是，赫、奭是一字，本义是指火赫然盛大，从用法上来说有“妃”之义。但是字的形义之间没有紧密的条理，这是罗说的弱点，特别是写在腋下的两火之形表示赫盛之义，实在是不合理的。对于罗说陈邦怀氏评价说，奭与赫同谊通假、不是同字，省二大为一的说法尤其不恰当[1]。叶玉森氏认为罗氏之说过于迂回曲折，

[1]陈邦怀：《殷墟书契考释小笺》，第 17 页。

而郭说新奇过度。“夾(夹)”从大、像人两腋下夹东西之形,因夹着的东西可以是任意的形状,所以字形涉及许多方面,除二、三个以外没有像乳房之形的。有“夾”,“夾辅也”仓颉篇、“在旁也”释名的解释,都是妃之意①。

唐兰是在古代文字学上具有特殊学说的人物，他举出以前诸说进行批评后,认为此字为左右相并之形,是从“皿”字变化而来的,这些字应释为“夾”。《说文》十下:“夾,盗窃褱物也,从亦腋有所持,俗谓蔽人俾夾,是也。弘农陜(陕)字从此。”于是与夾相近之字、音也多相近,举出爽、赫诸字,这些字的左右相对部分也都看作是皿形。另外关于其用法,郭氏以“祖丁母匕己”后·上·二六·六、“大乙母匕丙”新·三三六的两例为证,把此字作为母的古文、作为母后的专字,唐兰认为正确。唐兰又举出“卜丙母匕甲”文录·二七一、“且丁母匕甲”铁·余·一〇·一两例,进而说明母只是女子之称,夾、妾相通,母、夾、妾是异名同质,其中母、妾是属于早期的称呼,夾是属于后期的字。妻、妾是一声之转、“女”的古声是泥母、也与“妻”声相近,夾、妻又是声转,与“妾”声相近,即夾、母、妾都作妻。但是卜辞所见伊奭、黄奭都是早期的字,不是借夾为妻,伊奭为伊陟,黄奭为黄尹。卜辞:“庚申卜、贞、翌辛酉又㑥且辛……又奭。”前·一·一二·二罗氏把奭释为有妃,早期没有把奭读“妻”的例子,因此读陟为畜生名,是漫无条理的说明②。

唐兰的学说长达四页,归纳其要点:奭为人两腋下持皿之形、

①叶玉森:《殷契钩沈考释小笺》,第 7 页;又《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一,第 16~17 页。

②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第 36~39 页。

夹辅[1]之义。其字为夾,从用法上来说与卜辞后期的女、母、妾、妻同义。但是奭字异文较多,这些都是夹皿之形的解释,比罗氏的“火形说”、郭氏的“乳房说”更加奇妙,不用说是曲说。唐兰认为“奭”字与女、母、妻、妾通用,这些都是形、声、义异同的身份称呼,超过通用的范围。即使这些字形有时没有遵循严格的笔画,也不会失去其区别。采取最近唐兰的学说,也有女、母、妻、妾、㞋都是同义而应释为婦之说[2],“帚”字也自然有其义。卜文例中,关于五祀周祭中在王名之下、妣名之上位置的字,都应视为妣意的奭或其异文,与用为牺牲的妾、㞋不同。奭与妻在配偶之义这一点上虽相同,但奭作为五祀祭祀的对象应视为特别仪礼时的名称[3]。

最后举出于省吾氏的爽字说。他的学说也有根据新资料的地方,因他又通晓经典之训诂,值得一看。

> 卜辞□字,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形,异构或从……等形,皆火形所演变,按唐兰疑爽即□形之变,颇具见地,惜其与夾字混牵,未能融会贯通。□即爽之初文,《说文》:“爽明也。”传记注解,亦多训爽为明,大象人形,左右从火,爽明之义尤显,其□、□、□、□、□者,与变而从□,迹尤相衔,且□与□,只单双之别,在古文字中,画之单双,每无别也,⿱“遘于匕戊武乙□”,去岁商人陈鉴塘,由安阳买一㘡卣,余往观之,陈与余以

①在左右辅佐。——译者注。

②岛邦男:《祭祀卜辞之研究》,1953 年 7 月,第 27 页以下。

③见拙稿《殷代之殉葬与奴隶制》,《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 2 辑,1954 年 1 月,第 31 页;《白川静著作集》第 4 卷,第 435 页所收。

墨本，器盖两铭，亚中有獏字，亚下有父丁二字，又有长铭在卣之外底，共三十七字，其铭云“丙辰，王令𠨘其兄贶□[illegible]于峰田□”，宕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匕丙乡日大乙爽，隹王二祀，既𡚬于上帝”，铭内大乙爽之爽作奭，作其书法与散氏盘有爽之爽作奭同，其语例与肄毁同，得此确证，则卜辞奭字及诸异构，均为爽之初文，灼然明矣。

卜辞通例，爽字用法多在祖妣之间，变例或在妣祖之末，爽为匹配之义，已无可疑，惟其语例，载籍无征，凡卜辞云某某爽妣某者，言某某之辅配妣某也，云妣某，某某爽者，言妣某乃某某之辅配也。……

总之，奭字得𠨘卣爽字为证，知即爽之初文，其异体甚繁，爽之本义，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取光显之义，故古籍爽之通诂多训明，明之至而差生焉。故亦训为差次，卜辞用于二人之中及二人之末，皆差次匹配之义，尚书金文爽字用于句首者，乃发声词，说文以爽从㸚从大，不知从㸚乃由火形所演变，载籍无迳训爽为匹配者，爽之义训，其湮盖已久矣[①]。

以上，试举出以前卜辞研究者中有权威的诸说，关于“爽”字从大人之形，诸家之间也完全没有异论。但是关于附加于两旁之形的解释，记述了罗、于两氏的“两火说”、郭氏的“乳房说”、叶氏的“夹物说”、唐氏的“两皿说”等。其中关于“两火说”，第一，此诸形不能认为是火之象形，这样表示的火形在卜文中难以找到证据；第二，在腋下附上两火难以认为是持火的方法。另外，郭氏的

①于省吾：《双剑誃殷栔骈枝》，1940年6月，第41~42页。

“乳房”说像已经指出的那样，※等形不能认为是表示乳房之形，“爽”与“母”在造字上也是有区别的。叶氏的“夹物说”，不能说明“奭”字与“夾”字的异同，此诸构形看出的各种形状，看不出表现的是什么物体。至于唐氏的“两皿说”不但在字形上不相符，腋下两皿重叠本身也是不自然的。

我认为奭的诸形是表示文身的。关于“文”字诸形，上述举出了作为“奭”字形的诸形中有○、×、V、U等表示文身的纹样，金文中也有同样的纹样。这些不是火、不是乳房、不是物、不是皿，应该全部理解为文身的纹样。由此可以说，这些是以两乳为对象的各种文身的纹样，只是把“文”字中的单形的纹样加在两乳左右。我在上述中指出了，根据加在胸部的文身形成的“凶”字是“胸”的本字，“兇”、“匈”字是演化而来的，×的繁体是※，爾、爽等有华盛光明之意的文字是表示同样文身的文字。现在调查奭字诸形，文及凶、爻等字的文身的基本形×和U形，都在奭的诸构形中可以看出，此诸形之字是女人胸部两乳之上作为文身施加的装饰性的纹样。

“奭”字在其用义法上，用在王名与妣名之间，表示王的配妃身份关系之语是无可置疑的。我认为女子的文身是在隆起的乳房被分成两部分的胸部，以乳房为中心左右对称施加文身为原则的。“文”一般是称男子文身，而“奭”称妇人文身、称王妣，这是其本义。男子的文身主要是在胸部的正中间施加V字形、心字形的，而女子的文身是围绕着隆起的乳房施加的，具有强调其胸部神秘性的意向，因此施加了与此相称的图案。爾、爽都是从㸚之字，有丽爾、爽明之意。本来这也是表现妇人文身之美的字。

在卜辞中“爽”用为祖王的配妣之意，似乎是其专用语。我认为

在殷代男子美称“文”、女子美称“奭”，对于配祀的王妣用此语[①]。“文”作为美称多用于庙号，以文武丁、文丁为首，有文庙、文祖、文考等语。“文”作为庙号的美称之后也被长久使用；相反表示祖妣身份的“奭”，殷代以后不能看到其用义之例。“奭”之称或许只使用在殷室殷族的狭窄范围内，殷朝灭亡后失去了其用义。特别是在早期确立父系的西北系周人，没有文身的习俗，因而称王妣王母的文身的“奭”的用义周人没有袭用，只有男子的“文”作为美称残留下来，王妣王母也称文母，“奭”失去了本来的用义[②]。

关于“奭”之诸说中，认为此字与“爽”字有关的于省吾的学说，有些值得参考的地方。于省吾把此字的诸结构看作罗氏学说的火形，但于氏没有注意到殷文化中文身存在的事实吧。在殷墟发掘了柱脚石上刻的石人，石人上加有花纹，残存着殷朝文身的物证[③]。“文”与“奭”是王与王妣或相当于其身份关系中使用的文字，我们可以通过文字的形象想象出由于文身被装饰得华丽的古代王朝的王与王妃的容姿。那就是人生最庄严之时、即埋葬时的容姿。

---

①在张政烺《奭字说》中，“奭”字作奭，与“仇”相通，应释为匹，即释为好仇之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9月。

②西周初期的金文中“奭”可见两处。即令彝“爽左右玗乃寮巳乃友事”。“奭左右”相当于班𣪕“左比毛父”、“右比毛父”。另外，班𣪕有“隹乍卲考奭益，曰大政”。我认为“卲考奭”是卲考之妣的意思。我认为此两器都是殷人遗裔的作器。见拙稿《小臣考》，《立命馆文学》一一六、一一七，1955年1月、2月，并收入《白川静著作集》第4卷；《释史》收录《甲骨金文学论丛》；《作册考》收录《甲骨金文学论丛》2集。

③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12月，第249页。加在此柱脚石人上的花纹与唐草纹样相似。

三

文身本来是具有诅咒之意而作为身体装饰施行的，具有表示社会地位、身份、年龄、阶级等功能，其后文身的风俗衰落，最初的意义消失，作为社会上判处刑罚使用的很多。刑罚的黥辟在周代以后的文献中多处可见，我认为其风俗在殷朝已经存在。

文身的方法有绘身(Painting the Body)、黥涅(Tattoing)、瘢纹(Scarification)三种。因为绘身只是用丹青[1]在身体上画花纹，是非永久性的。其他两种是加在皮肤或皮下，是永久性的。瘢纹是用刀剜肉或用烈火烧灼的方法施行。黥涅大概是用数支或数十支针刺皮肤，把颜料揉进皮肤里。上文举出的“文”、“奭”，加在死者身上时大概是用绘身的方法施行的，因此都具有美丽之意。

文身时使用针。文身时也有使用颜料的，所以其美称“彣彰”。“章”是在文身用的辛(针)上积存墨的形状([illegible]、[illegible])，在此加上颜料称“彰”，“彡”表示其美的记号。《说文》五上：“䘓，伤痛也。从血聿、皕声”，与“奭”相同从“皕”。“䘓”([illegible])。“聿”是筆(笔)的初文，“皿”是指文身的容器。“䘓”与“奭”相同、从“皕”之字，可知“皕”是两乳加花纹之形。但是“䘓”如有伤痛之意，这不是绘身而是文身。中国古代的文身中，仪礼性的是加绘身，刑罚性的是加文身、黥涅。因文身使用针，相关之字大概含辛字形，也有作辛形的。《说文》三上可看到其

---

①丹、青的颜料也与文身有关系。“丹”字，《说文》(五下)：“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丹不是从赤石所取之物，不是其象形。贵族的文身使用丹，一般的文身使用青。参照后文。卜片等也遗存有华丽朱砂的痕迹，可认为文身也根据同样原理。

字，“辛，辠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凡辛之属皆从辛。读若愆、张林说。”“干上”是“犯上”之意，但是把字分成“干、上”不太合理，这和“辛”是相同形象，像“辛”字那样而不加“剌”之形。《说文》辛部有童、妾二字。

> 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声。
>
> 妾，有辠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辛女。春秋传云、女为人妾。妾，不娉也(段《注》)。

另外，《说文》十四下有辛部：“辛，秋时，万物成而孰。金刚味辛，辛痛即泣。从一从辛，辛，辠也。辛承庚，象人股。凡辛之属皆从辛。”还有辠、辜、辥、辤、辭诸字，都有刑罚之义，特别是“辠”：“犯法也、从辛从自”，段《注》把“辛自”释为酸鼻，按照字形应看作在鼻上文身。我认为虽《说文》把辛、辛二字分别说明，但根据卜文、金文的字形来看，童、妾都从辛形，《说文》对两系统的字的看法产生混乱。接着辛部又有辡部：“辡，辠人相与讼也。从二辛。”“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间。”我认为“言”也是从辛之字、有立誓之意。“言语”二字双声，“言”字《说文》三上：“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言”字从辛，如其立言错误时，表示用辛受文身之刑的盟誓之意，诉讼时进行“言”的立誓①。

从辛之字还有辟字。《说文》九上：“辟，法也。从卩辛。节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卩只是人屈伸之形，没有节制之意。“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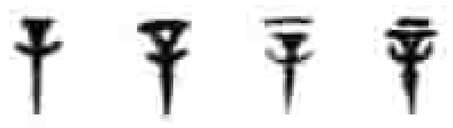
①卜文的言字从辛𠙵。𠙵是祝告器。与誓约之言相违时受到用辛(针)之量刑，“言”就是誓约的“言”。参照拙稿《释史》，本集所收。

金文的字形也有作成○形的，是表示以“辛”剜取肉的大辟之刑，其刑称𤮏[1]。辟字还从亏，曲刃之形。此部还有䢃字。“䢃，法也。从辟井。周书曰、我之不䢃。”(段《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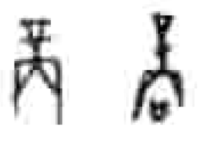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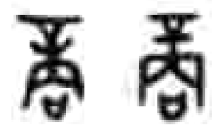
䇂　甲骨文

童　金文

妾　甲骨文 　金文

辛　甲骨文 　　金文 

辟　甲骨文 　　金文

商　甲骨文 　金文 

《周书·金縢篇》：“嬖，治也。从辟乂声，《虞书》曰：‘有能俾嬖。’”引自《尚书·尧典》之文。这些《尚书》之文大概古文的辟、乂字本来作䢃、嬖字。

从辛之字还有“章”、“商”字。“章”字，《说文》三上：“章，乐竟为一章。从音十。十，数之终也。”本义是如上所述文章、彣彰所用之字，显著之义。“章”表现文身文彩的明显之意。“章”字从音，是从“乐竟”附会而来的。金文从“童”字之形，“童”字如上所示，目上加辛，在上面施加文身。我国自古也有此风俗，神武东征时大米久命与伊须气余理比卖问答时的歌谣：“阿米都都知杼理麻斯登登　那杼佐祁流斗米(胡鷰子鹡鸰千鳥　等鲸利目)。”[2]表现了在眼睛的周

①王国维：《释辟》，《观堂集林》卷6；又《毛公鼎铭考释》，《遗书初集·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

②见《古事记》中卷，“神武东征”一条。

围刺黥的锐利表情极其奇怪。“章”和“童”都同样是刺青的意思，也称文彩的文身，于是与“文”合起来称“文章”。

“商”字《说文》三上：“商，从外之内也。从冏、章省声。”其下收古文二字䞞、𠷎，籀文一字𠻮。关于部首㕯：“言之讷也。从口内。”不知“商从㕯”之意，“商”的古用例多数没有𠙴。段《注》中引用《汉书·律历志》：“章度”，《白虎通》：“章其远近，度其有亡”，主要释为商量之意，金文中多用为赏赐之意，与“赏”字通用。“商”本来是殷朝的本号，他们自称“商”，其京城称大邑商。[1]《诗经》中称殷商是与称楚为荆楚相同，在蔑称的下面加上本号来读吧。[2]“商”的本义是把表示刑罚权的“辛”树立在容器上，似乎表示其支配权的意思，“辛”的左右加上像古文、籀文那样的纹样是其纹饰吧。“矞”是在台座上树立“矛”，表示其支配权，与进行遹正（遵循）相同。殷朝有文身的风俗也表现在其本号上。

四

我首先考察属于“文”系列的诸字，讲述“文”是在成人胸间加上文身的正面形状，凶、兇、匈诸字是加在胸部的凶礼之字。彦、顏、產字本来也从文，因此我明确了“文”是男子的文身，礼仪时在额上加上的。其次，弄清楚了“文”的爻文是㸚、𠀤之形，加在两乳房上形成爾、薾、爽、奭等字，这些是在妇女的丧礼等情况下施加的，都具有丽尔、爽明之意。然后，叙述了这些文身主要是用针即“辛”刺皮肤、施加黥涅，多用于刑辟，刑辟的字多数从辛。还叙述了殷朝作为

①《甲骨缀合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六。

②《诗经·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军，其会如林。”《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自称使用的“商”字，实际上也是表示刑罚权的字。

上述事实指出从殷朝文字构造上来看文身习俗的证据。关于古代文字构造上可以看出文身证据，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关于造字的时代①，其种族本身有文身的习俗；另一种解释是其他种族的文身习俗的知识反映在造字上。但是这种情况首先要注意，与文身相关的文字在其生活上有极其重要意思的词语中可以见到很多，可知这不是根据其他种族文身知识而形成的。国族号称“商”，在宗庙中称先人为“文祖”、“文考”、“文母”，祭祀先妣时称“某王之奭”等，可知文身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使身份高的人神圣化、举行庄严仪式的方法。即应该考虑殷族是具有文身习俗的固有民族。不用说这些在考虑殷族的本源与其文化来源及与其他种族的关系等方面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视点。一般来讲，中原文化中不存在文身，文身被认为是吴越等东南沿海民族之物。但是如果文身存在于曾经统一中原、其支配遍及中原整个国土的殷王朝文化之中的话，能为殷王朝文化的来源与其性格方面提供新的视点。

在古代接壤中原的地域、具有文身习俗的种族中，为人所知的是东方的夷族和南方的蛮族。《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疏：“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东方之夷，在此主要指吴越吧。吴人是指周的太伯仲雍的后裔，传说上与周同姓，其习俗完全是东夷的。我认为仲雍或者是中容的伪变。

---

①董作宾解释卜文远比殷代以前已经存在，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字构造时，对追溯到远在殷以前而有疑问。关于此问题借其他机会详述。

《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之国,也许与吴的开国传说中所见的仲雍有关系。中容为舜的后裔,殷仍然是舜的后裔,应把两者合在一起考虑。众所周知,吴的文身习俗也在《左传》、《史记》中能够看到。

(子贡)对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羸裸身以为饰,岂礼也乎,有由然也。”《左传·哀公七年》

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史记·吴太伯世家》

越被认为是禹的后裔,而且是夏后少康的庶子的后裔,也与吴相同有文身的习俗。《战国策·赵策二》:“祝发文身,错臂左衽,林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大鲇皮之冠秫缝,太吴之国也。”

现列举文献中所表现的数例:

宋人资章甫冠名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庄子·逍遥游》

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墨子·公孟篇》

夫刻肌肤,镵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人)为之以求荣也。《淮南子·泰族训》

越王勾践,劗(攒)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仪礼之法之容。《淮南子·齐俗训》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粤地……其君禹后……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汉书·地理志》

越方外之地，断发文身之民也。《汉书·严助传》

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汉书·扬雄传·校猎赋》

彼越……剪发文身，烂然成章……。《说苑·奉使篇》

越文身剪发，范蠡大夫种出焉。《说苑·善说篇》

对于吴越等东南夷族，南、西南的诸夷族也有文身的习俗，有苗、黎、僰、蛮、獞诸族。

文面始于有苗，书伊训篇，臣下不匡其刑墨，孔子曰，凿其额，涅以墨也，吕刑篇，苗民爰始淫作劓刵椓黥，孔子曰，三面之主，顽凶其民，始为截人耳鼻，椓阴黥面。《资治通鉴·纲目》

黎俗，男女周岁，即文其身，自云，不然，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①明·顾岕《海槎余录》

绣面乃其吉礼，女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涅为极细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纹编其余地，谓之绣面。《广东通志》卷八

女将嫁，面上刺纹样，涅以靛蓝色，其花或直或曲，各随其俗，盖夫家以花样与之，照样刺面上，以为记，以示有配夫而不二也。清·张庆长《黎岐纪闻》

---

①关于黎族的文身参照 H.Stübel 的《海南岛民族志》(清水三男译)，畝傍书房 1943 年11 月。

僰族男子尚文身雕题，当学僧之初，即由其爬龙，于胸背额际，腕臂脐膝之间，以针刺种种形式，若鹿若象，若塔若花卉，亦有刺符咒格言及几何图案者，然后涅以丹青，贵族尚赤，平民以墨，否然者，妇女群非笑之，以故无老幼，无不身首彰者。[①]李拂一《车里》第九八页

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南市，……绣面蛮，出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传之。唐·樊绰《蛮书》

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明·桑悦《记獞俗》、《广西通志》卷一二三所载

另外记载文身习俗的还有以下文献：

雕题国、北朐国，皆在爩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郭璞注云："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山海经·海内南经》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多，于在民人，被劗发文身，以像鳞虫。《淮南子·原道训》

余始祖闻氏，家丁健儿五百余口，悉刺为花拳绣腿，以龙凤蛇虫，别其贵贱之分，……余幼时犹及见，会城住房客孙禄者，父子兄弟，各于两臂背足，刺为花卉葫芦鸟兽之形。明·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文身"条

西、西北、北方的诸侯一般没有文身的习俗。但是《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有种人的文身："种人，皆刻画其中，象龙文，衣著

①与此几乎意思相同之文，见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所引《西南风土记》(《民族学研究专集》第1集)。

尾。"《唐书·回鹘传》中所载的《黠戛斯传》也有以下记述:"男少女多,以环贯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鲸其手,女已嫁,鲸项。"传说与沿海民族有同样的习俗。

上述了我国(日本——译者注)古代也有文身习俗,现参照中国主要文献,调查了有关日本列岛的记述,如下:

倭……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后汉书·东夷传》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倭者,自云太伯之后,俗皆文身。《梁书·诸夷传》

男女多鲸臂,鲸面文身,没水捕鱼。《隋书·倭国传》、《北史·倭国》略同

琉球国……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隋书·琉求国传》,《北史·琉求国传》《太平寰宇记》,记载几乎相同

虾夷,东夷之中,有日高见国,其国人,男女并椎结文身,为人勇悍,是曰揔虾夷。《日本书纪·景行纪二十七年》

文身国,在倭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者贵,小文者贱。《南史·东夷传·文身国》

马韩,……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后汉书·东夷传》

弁辰辰韩,……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后汉书·东夷传》

弁辰,……今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台湾有文身之俗，但不于面，而于手臂背等处。[1]林惠祥编《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派宛族"条

男女皆鲸面为饰，故又称鲸面番，男子自额至额之中央作直纹，女子自口经两颊至两耳，作横而斜上之阔纹，使口似有锐突之势，汉人称之为乌鸦嘴。同上书，"太么族"条

关于太平洋沿海民族之间分布的文身，虽然概括这些文身的适当文献极少[2]，但是上述 Carl Schüster 的论文中引用的种族达五十种以上，涉及太平洋两岸及太平洋诸岛的全部，我认为中国东南部及我国(日本——译者注)列岛的南北广泛存在的文身习俗，在古代也相关连。我已经明确了殷人有文身习俗，至少是具有其充分知识的种族，但是殷人在有这样文身的种族中占有怎样的地位、或者具有怎样的关系还不明确。殷人的居住地自古就在河南之地，还是从其他地方转移到中原的，还是未知。另外还有下面的问题：关于周边的文身族，像吴越那样的东南夷族或者像獠族那样的西南夷族，与哪方面亲近，还是他们本来是否同种？卫聚贤有以下论述：吴称虞，是把鱼作为图腾的文身族，越把钺作为族名，吴是王吴，越是卜辞中所见的戉，都是列名于殷代的祖先神。[3]陈志良也采用了江浙两省是古代吴越之地、殷代文化发源于江苏的奄族文化的孔

①我国(日本——译者注)的临时台湾旧贯调查会的《蕃族调查报告书》，详述有关各蕃族文身的习俗，《新亚细亚杂志》1 卷 5 期、6 期也有报告。

②Carl Schüster 的上述论文中列出参考文献达一百十几种，但在参考上不方便。在我国(日本——译者注)关于太平洋、东南亚的民族杂志也有多数出版。

③卫聚贤：《吴越释名》，《说文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8 月。

令谷的学说。[1]在此之前,蒋玄佁举出殷朝广泛使用贝货的事实,主张殷族是吴越族。[2]此三氏的学说定论殷族属于东南夷系统,像卫氏所说的殷族的先世吴与夒,是否与吴越的族名同源当然不能定论。举出贝货一例来论述民族来源也应该说有些草率吧。但是,殷族比起南夷、西南夷,与东南夷有更亲近的关系,例如殷人生杀羌、南两族[3]作为异族的牺牲,而没有生杀吴人、越人的例子,能够推测殷朝与东南夷之间有何密切关系[4],根据这些进行推测,因此三氏主张的东南夷说,即使各有过于武断之处,也应该说是有启发性的推论。特别是从上述考察的文身习俗与文献所看到的文身习俗分布的关系来推测的话,殷族也属于广泛太平洋沿海文身族之一,可认为殷族与包括吴越的东南沿海诸族有相当密切的近缘关系。

在卜辞中没有证明殷与吴越交流的确实的辞例。但是殷朝末年及于帝乙期,对于人方尝试前后达数月之久的远征,其足迹深入遍及山东、安徽之地。或者认为与此大远征有关的地名中记载称作上𩛥的地名较多,从殷都至上𩛥大约花费40日的行程。[5]还有在同一片上可看到上𩛥与虞两地名的卜辞[6],虞也许与者减钟所

---

①陈志良:《始祖诞生与图腾主义》下,《说文月刊》第2卷第3期,1940年6月。

②蒋玄佁:《中国古代贝货之由来与吴越民族之关系》,《说文月刊》第1卷第4期,1939年5月。

③见拙稿《殷代之殉葬与奴隶制》,《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2号,1951年2月,《白川静著作集》第4卷所收。

④拙稿《周初殷人之活动》,《古代学》第1卷第1号,1952年1月;《西周期东南地域的政治与文学》,《立命馆文学》第96号,1953年5月。

⑤郭沫若:《卜辞通纂》,第595页。

⑥《龟甲兽骨文字》二、十五、十六;《卜辞通纂》,第602页。

见的工觑有关系。有上虞是吴的会稽的上虞的学说。[1]如果这些卜片上所见的是吴的地名的话,殷末殷王亲自来此地逗留许久而安抚其地的事实,应该引人注目。殷末以外没有殷王亲自赴此地的遗迹。

从文身的习俗,宝贝的流通,从武丁大龟等南方海域带来的文物、南金象革,其他南方特有的物产,或者殷朝灭亡后东南夷、淮夷对周顽强固执的抵抗,对于《史记》中记述吴越的疑问,殷宋后裔与中原诸族之间的不调和关系等,可以推测在殷人文化的背景中此文身习俗表示的那样,与沿海文化有关系。但是我像卫氏等那样,把殷与吴越断定为同族,感到十分踌躇。殷与东南夷诸族本来交流甚深,殷从山东兴起进入河南,又打入与其北端较近的安阳、对西北强悍的部族进行长达三年之久的攻战等,并积极执行此政策,把太行西方的狄种也掌握在其势力之下,经营河内[2]沃野的土地,并且窥视西方,这样殷族的活动范围,与长久避在长江下游、至春秋后期才抬头的吴越,仍然有不同之处。在殷朝与吴越之间,尚且称为淮夷、东夷、南夷的诸族,还有南国𠬝子及熊盈之邦等,我不认为两者存在接近的状态。我认为其文化的程度已经不同、习俗也不同。例如,即使文身的习俗相同,剪发的风格也不同,殷已是衣冠之邦。文身中从爽、奭的字样看到的文身,与在尸体上施加庄严的装饰,完全是礼仪性的。即使殷人是有沿海文身习俗的种族,他们也会更早进入中原,吸收诸族文化,形成独自的文化而发展起来。特别是其青铜器文化和文字的发明,给东亚之

①郭沫若:《卜辞通纂》,第5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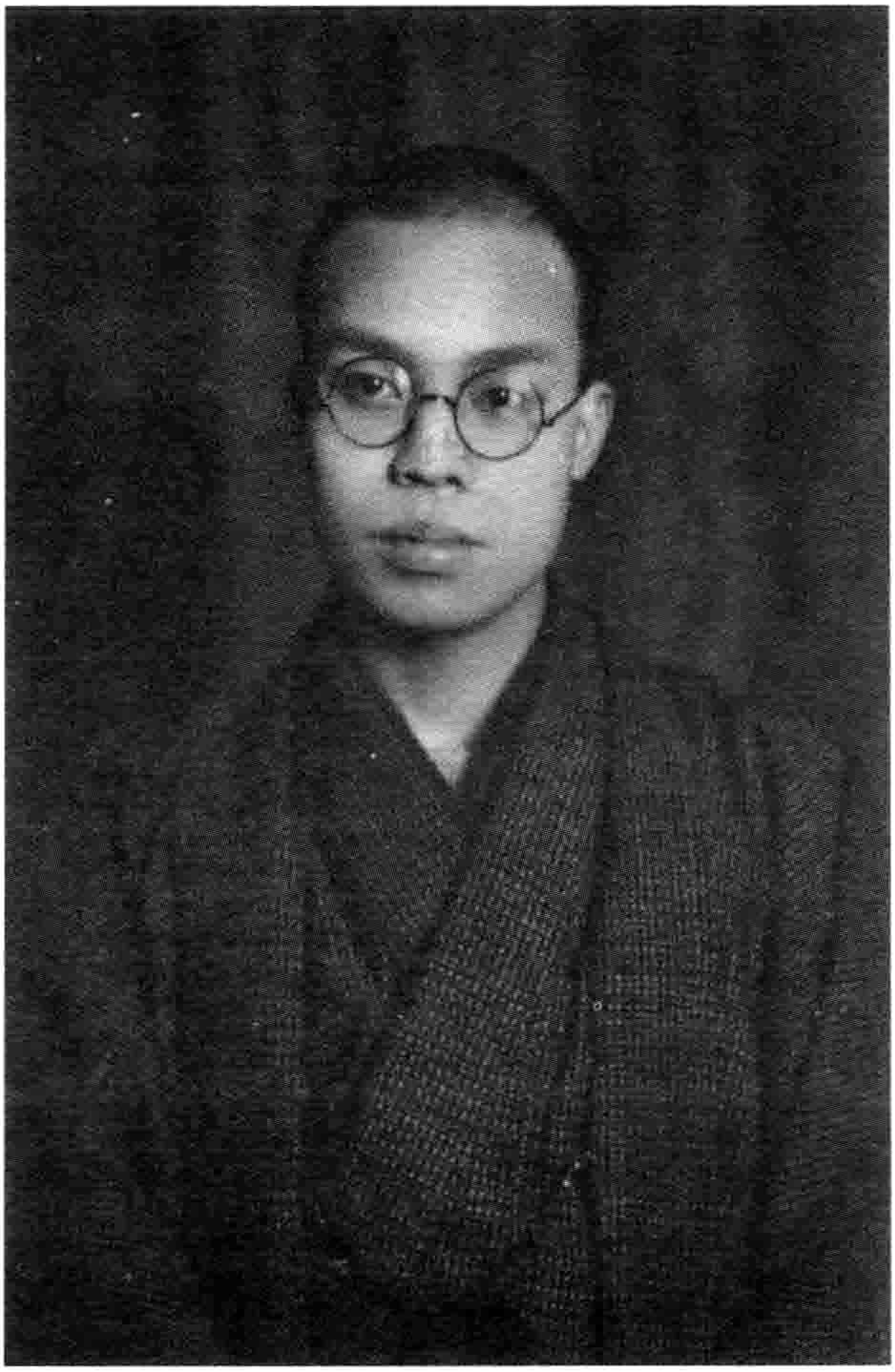
②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方。——译者注。

地带来了最初的文明。尤其在文字构造上留下的其社会和生活的状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此通过文、奭等文字资料,试论了其文化的一个方面。我想通过文字的构成考察殷朝文身习俗,并为殷代文化的来源提供一个观点。

释史*

白川静

*本文来源于《白川静著作集·别卷·甲骨金文学论丛·上》,平凡社,2008年6月。



1928年，18岁时在大阪，书生时代。

一

关于中国古代官制占重要地位史官的起源，像周代官制多数从殷代起源的事实上来考虑那样，还是有必要追溯到殷代来考察的。本篇从殷周的社会史发展的关系把握“史”的起源和其官制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以考察其起源的形态为目的。

考虑“史”的起源首先有必要看“史”字的初义。关于“史”字，以前有两种代表性的学说。一是看作以“史”字从“中”的缄札簿书之类；一是看作以“中”在仪礼大射等所见到的筹算之器之类。前者是从掌管记录之官而来的，后者解释为从射礼的筹算而产生的。但是除了以上两种学说以外，我认为“史”是掌管祭祀的祝告，“史”的起源是在祭祀上祝告的仪礼、祝辞的掌管。先略述以前诸说，再论述我的个人见解。

关于“史”字（小篆：史）字形，《说文》三下：“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是所见到的最古的记述。卜辞、金文“持中”的“中”不从凵，卜辞、金文中所见㕜、𠭘字形与《说文》的篆字相同，从凵形。而且在造字之初以“持中”抽象的概念来构成此字是难以想象的。

卜辞、金文中“史”字所从的都是载书之形的𠙵，不是左中右的“中”字形。[1]清代吴大澂：“𡗓，记事者也，象手执简之形，许氏说从又持中，中正也，按古文中作𠁩，无作𠁧者。”[2]指出许慎所说不合字形。江永把“中”解释为官府之簿书，如下所述：

> 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3]

吴大澂所说的简是一简之义，江永所说的簿书是众简之名，所以江说有胜过吴说之处。以罗振玉[4]为首，治学卜文者多从江永之说，而王国维深入探讨江氏所说簿书为何物问题，把此解释为盛筹筭之器。因王氏之说甚丰富，现引用说明“中”字的部分：

---

①顾实把中和𠁧都作为是一个字形的变迁（《释中史》，《说文诂林》“中”字条所引），加藤常贤博士认为其说正确，“史”字从又中声。中相当于《论语·尧曰》：“允执其中”、《尚书·舜典》：“受终于文祖”，“中”、“终”，都是数之假借，用筹之义。其说无论从形、声、义的哪一点上来说我都难以肯定。关于文字的起源，广泛探讨与其构成要素相关联的文字，应该进行科学的证实，在论证之前不应该任意建立伪变、转音等学说。对于如此难解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也深深自戒。加藤博士之说，参照《汉字之起原》（八）第53页以下。

②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第三。

③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秋官》，《皇清经解》卷二四八。

④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卷中，第19页。

《周礼·大史职》:"凡射事,饰中、舍筭。"《大射仪》:"司射命释获者设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又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职》所云"饰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乡射记》云:"鹿中髤,前足跪,凿背容八筭,释获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于郊则闾中,于竟则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时中制皆作兽形。有首有足,凿背容八筭,亦与中字形不类。余疑中作兽形者,乃周末弥文之制,其初当如中形,而于中之上横凿空以立筭,达于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于他器者也。[1]

如上所述,王国维把"中"视为《射仪》中所记载的盛筭之器,认为与《仪礼》中所说"中"器制的字形不相符,因此把兽形的筭器作为周末弥文的制度。还有,放入"中"器的筭,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的长短四种,简筴和筭的制度相同,举出筭和筴的通用例。尤其在《逸周书·尝麦解》记述了大祖尝麦之礼。

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筴执筴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

①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

以“中”与筴相从之例，“中”是盛筭之器，也是盛筴之器，《周礼·天府》的“治中”、《小司寇》的“狱讼之中”、《国语·楚语》的“鬼中”等所看到的“中”，都是同一物。而且王氏论证如下：“史”之义不视为持筭之义，而是从持筴之义而来，从周代诸史之职追溯到殷周，并涉及到金文诸例、作册尹氏之官都根据“史”。

在我国（日本——译者注），内藤湖南博士早就发表过“史”字的“中”为盛筭之器的学说[1]，几乎与王说巧合，是根据他的硕学，完全是同出一辙。但是内藤与王说之间有些不同。关于这一点，内藤博士作了以下解释：王氏最初把“史”字之“中”字解释为盛简策之器，这与中国古代武事优先于文事的风尚不符，例如从《攈古录金文》的“史”字铭六十五器中，十八器是武器之铭，盛筭才是“中”的原义，盛简策是派生的用途，是其转义的用法。[2]

在结论上我的想法与王氏简札之器学说相近。但是，王氏以“史”作为掌书之官，“史”、“事”本是一字，卿史（卿事、卿士）、御史（御事）本来都是官职之名，把此解释为“王室执政之官”、“天子诸侯之执政”。于是王氏言：“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史”的初义为执政者。[3]我认为“史”的本义是祭祀中祝告之义，“史”、“事”是同源字，但其间有一些不同的使用例，在此提出“史”字的祭祀起源说，并想试作论证。

通观卜辞“史”字用例，[illegible]与[illegible]作为通用文字能够肯定，但是可知两者之间在使用上各自有倾向性的区别。例如，“大乙之史”、“祖

①内藤湖南博士：《关于支那史之起源》，《研几小录》所收，1928年。其说早在1914年的讲义中发表，1915年12月也做了讲演。

②内藤博士：《支那史学史》，第7页。

③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

丁之史"等在先王的名下使用"史"字,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史字,另外,称"又史"时,除了不确切的一例之外,其他所有都作史字。对于"又史"有"亡史"、"不史"之语,这也几乎都是史字。对此多数使用事字的属于 "由王事"(是否进行王事)、"大事"(大事、重大的祭祀)、"北事"(北使、北方的祭祀者)、"西事"(西方的祭祀者)、"事人"(祭祀的使者)等诸例,这些偶尔也有使用史字的,但是似乎原则上有使用事字的倾向。但是"御史""御事"的例中,史、事各半使用,无论哪个都是难以决定的。如上述的史、事二字在使用例上稍有倾向性差别的事实,之后即使二字的通用形成一般化,我认为在初义上也表现了二字之间存在的差异。现以史字系列试加以探讨。

……河史,王受又　库·五六

[illegible]岳史,又雨　南北·明·四四

上甲史,其兄父丁[illegible]　南北·明·五一五

大乙史,其祉大丁　京津·三九八二·又、粹·一六九

大乙史,王其乡　甲·二〇三八

弜乡于之,若,大乙史,王乡于[illegible]　粹·一四二

且丁史,至=……　京津·四〇一八

戊戌卜,且丁史,其祉妣辛妣癸,王……　宁沪·一·一九一

王宔……史……父己　后·上·六·一

口丑卜,小丁史,又丁……　甲·六〇八

郭沫若在粹一四二、一六九两片中只举出"大乙事"的释文,没加任何解说。对于"其御又史,王受又"粹·五四四,记述了:"又史,可读为有事,又读为右史,未知孰是。"对"史"、"事"两解的取舍

没有决定。"……卜，彡酒，又史"后·下·四二·七；"丁亥史，其酒告"续·二·六·三；"其御，又史，王受又"粹·五四四；"㚇岳史，又雨"南北·明·四四，如上所述，史与彡酒、酒告、御、㚇等祭仪一起出现，明确可知史是祭祀用语，但是还不知是怎样的祭祀行为。我在以下所述中，认为史是有关祝告之字，向祖神先王供奉祝祷之辞而进行告祭之意。

史字中的ㅂ，有两种字形，一种下底部是平板形状的ㅂ，另一种是下底部向中央鼓起之形的ㅂ。从契刻方便上来说，平板直线比较容易刻，就算有时形成简易的形状，字形ㅂ的下底部鼓起的形状接近原形吧。卜辞中，大体上口字形中由是否有隆起之形能分成两个系列。盘形的作成没有隆起的ㅂ形，在皿形的特别是高杯形状的𠙵形中隆起部分更加显著。从此ㅂ形最普通的文字有曹、告、㫃、吉等诸字。告、曰等字的ㅂ形，一般解释为口耳之口①，其解释难解的部分较多。文字一般从神事(祭神仪式——译者注)发展而来的情况来考虑，我认为此ㅂ形的文字可能表示了其他的意思。

ㅂ像曹字形所示那样，是放简策的容器。《说文》五上，"曹(小篆：𣍘)，告也，从曰从册，册亦声"，比起"楚革切"，"册亦声"是妥当的。卜文的"曰"在《说文》五上作㫚，以㫚作为"词也，从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之意，但是卜文只作ㅂ前·七·一九·一，不作乙从口出之形。我以为ㅂ如果像开口出气之形的话，应该作甘说文甘字，含之象，在ㅂ上添加一画应该说有可疑之处。所以如果曹是在简策容器上加册之形，应该把㫚看作是打开简策容器上面之形，能够解释为开示(打开而

①例如"曰"，《说文》(五上)："从口乙声，亦象口气出也。""告"，《说文》(二上)："从口从牛。"诸家大体上从《说文》之说。

出示——译者注)简策之语之意。[①]卜辞的“勿曹”前·一·四四·七、“勿禮”林·二·六·一八都是动词,还有“册祝”甲·七四三之语,都与《说文》的曹告之义一致。大概在古代,神圣之言不能直接听取,把此言上奏时加上简策而致其意,神意也对其简策祝告、或者通过奉使者来传达。“来各(來格)”的“各(曹)”也本来是称对册祝神意的来格垂示。其神圣性转移到王者时也采用同样的表现。卜文“王固曰”、金文“王若曰”的“曰”之原义大概如此吧。圣者之言像以间接的形式传达的那样,祭祀神灵、进行祝告时也还需要特殊的形式。例如“告”字,我认为可能是传达古代祭祀时上奏神灵的形式。“告 (小篆告)”,《说文》二上:“牛触人,角箸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其臆说已经在段《注》中论述。但是段氏也还确信“从口从牛”的解释,作牛声,“从口牛声”的“牛声”为入声之玉,得“告”之音[②]。近代的孙海波、杨

①曰的字形金文中有如下所示诸形,我认为是表示打开容器盖子的一端,以视容器中祝祷之辞的意思。因此“曰”的字形是阅读容器中册书,表示阅读之字。《尚书·金縢篇》:“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还有:“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见书、启书正是打开凵中之书的意思,曰是其祝册之文所说的意思。这是“王固曰”、“王若曰”的初义。尚且,接上文《尚书·金縢篇》:“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由此可知“史”掌管这些书的事实。

曰的字形:

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二上):“如许说,则告即楅衡也。于牛之角寓人之口,为会意。然牛与人口,非一体。牛口为文,未见告义,且字形中无木。则告义,未显。且如所云,是未尝用口。是告,可不用口也。何以为一切告字见义哉!愚谓此许因童牛之告易只大畜、六四之爻辞,而曲为之说,非字意。故木部楅下,不与此为转注。此字当入口部,从口牛声,牛可入声读玉也。《广韵》:告上曰告,发下曰诰。古沃切,三部。音转古到切。”因段氏时未得见契文,告作“从牛”,契文的上部明显是树枝之形。

树达等所述也从此说。[1]我认为"告"字的卜文作 诸形，上部不是牛之形，"从牛"或"牛声"的解释不妥当。上部都是表示树杈，声（磬 ）、南（ ）、殸（ ）、壴（ ）、彭（ 、 ）诸字的上部与"告"字上部的树杈之形相同。从此诸字都是祭祀所用的乐器方面来说，还是悬挂在树上之象形。但是其上部不只是树枝，大概是与神圣的礼仪有关之物，可能是与我国（日本——译者注）榊树（杨桐）所具有的意义相同吧。换言之，"告"是表示把放入祝册的容器悬挂在神圣的树枝上，能够解释为把祝册高高悬挂，以此来向神灵奉告之意。大概像祝告、策命、盟誓等那样，进行向神祈祷发誓的行为之后，以其书加上牺牲的仪式是禮（礼）。《孟子》告子下："癸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就是此例。

调查经典，例如《左传·襄公九年》，晋郑发誓时，作载书奉告神明，明确了不能再次改变。

还有，《仪礼·聘礼》上说："史读书展币。宰执书告备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书，授上介。公揖入。官载其币舍于朝。上介视载者，受所书以行。"

这也是其礼。策命多数在宫庙大殿中举行也是在祖灵前发誓明证之意。

《颂鼎》上说："王在周康卲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弘右颂入

[1]孙海波《中国文字学》（下编第 83 页）多处引用段《注》，如下文："甲骨文，有作 者，正角箸横木之形，与告字下说解相合，盖此本牛字下注文，后人误系告下者，甚显明也。"也就是说，把"告"上部之形解释为"牛"。杨树达把"告"作为牛的鸣叫声，举出嗥、吠、鸣、嘷诸例，把"告"作为牛声没有任何实证，我想这也是根据《说文》的解释。参照杨氏《积微居小学述林》第二卷第 57 页《释告》一文。

门,立中廷,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拜䭫首,受命册,佩以出,返纳瑾璋。”

如上所述,册命时受命者也亲自佩册书。以此来说,向神祝册时把其祝册之辞以某种形式供神,我以为这样的礼应该存在。

卜辞中的告祭,主要是关于外寇等异族神所带来的灾祸及先公祖神所降咎祸、疾病等,把此祝告于先公诸神的祭祀。[①]其祝告之后,我认为大概是把记载祝告辞的书册系在神树的树枝上,把此供在神前[②],这是“告”字的本义。“告”不是从口耳之口的字,𠙵与曹、曰诸字相同,把祝册放入容器之形。关于“事”在下文中记述,其𠙵中加物的字形还有𡍮望𣪘、𡍮申鼎,也表示把其挂在树枝上之形。

有𠙵之形的有𠧟字,这被称为五祀周祭的祖祭之一。五祀的意思是按照世次[③]以干支顺序祭奠先王的五种祭祀,从开始到终了大约需要三十六旬,以井然的体系进行。最初有祀统一旬,可以说是前祭(最初的祭祀活动——译者注),接着彡祭十一旬、翌祭十一旬按照干支顺序、世次顺序进行,结束后,祭、𠧟、𠳵接连不断井井有条地进行,需要十三旬,全过程合起来要三十六旬。帝乙、帝辛期称为“隹王五祀”等的祭祀,因为此五祀轮完一回的期间大约相当于一年,所以“祀”成为相当于年岁的一期之名。[④]

①“癸巳卜夅贞,告土方于上甲,四月。”梨·六八,“贞,于大甲,告𢀛方出。”后·上·二九·四,“福于祖乙,告王咼。”乙·三一九八等,其例甚多。

②告祭与史祭的密切关系可从告史连文的例子得知。“庚甲卜贞,雀亡𡆥,南土咼,告史。”“辛酉卜贞,雀亡𡆥,南土咼,告史。”甲·二九〇二“告史”二字都是相似的祭仪,有祝告之意。

③世次,王族世代的系统。

④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三,《祀与年》;岛邦男:《祭祀卜辞之研究》第一编第一章。

（一览表）

月	旬	祭	翌	劦
帝乙三祀 十二月	癸未甲申	祭上甲		
	癸巳甲午		翌上甲	
四祀 正月	癸卯甲辰	祭大甲		劦上甲
	癸丑甲寅	祭小甲	翌大甲	
	癸亥甲子		翌小甲	劦大甲
二月	癸酉甲戌	祭戋甲		劦小甲
	癸未甲申	祭羌甲	翌戋甲	
	癸巳甲午	祭象甲	翌羌甲	劦戋甲
三月	癸卯甲辰		翌象甲	劦羌甲
	癸丑甲寅	祭祖甲		劦象甲
	癸亥甲子		翌祖甲	
四月	癸酉甲戌			劦祖甲

从五祀之名，可以看出把其祭仪的状态如实地表现出来。即“彡”是从彭声的彭彭所得，大概是鼓乐而使神享乐之意。“翌”是《周礼·地官·舞师》中所言羽舞、《左传·隐公五年》中所言六羽，以舞姿祭祀祖灵。“祭”如《说文》一上所述，可以看作是以肉祭祀祖灵之意。

关于祟，董作宾只不过是以𠙹表示才之声，以《说文》三下的𩛥："设饪也，从丮从食，才声，读若载"来作解释，即使𠙹是才声，从董氏以外的例子也能肯定，此𠙹也不止限于声符。卜文中所见的祟诸形，□前·四·一·三、□明·三一二二、□明·四一九、□甲·二六〇二、□前·一·二二·六、□粹·四六九、□粹·四六六、□前·一·四·四，多从𠙹形，董氏只是把此看作声符，未解明其形义。董氏还把□的H看作是两手之形□的讹变。于省吾也同样把此字释为𩛥，H的有无都不成问题。[①]卜文的时代没有□讹变为H的例子，H形不会没有意义地被加上。我认为H形可能是桌子的侧形，或者与□(帝)的H相同，支撑两侧的架木。于是解释为H上面的𠙹是向神奉告祝辞，也就是说把载书装进容器，把此放在H上的祝辞。换言之，就是把祭祀的祝册装进𠙹形的容器内，把此放在台上H上面，以此奉告神灵。

如上所述，□字的诸形，祭祀祖神诸王，作为把放入祝告的容器加在台上的形式有以下：把祝辞装进𠙹之中捧持于台旁边的，把祝辞系在长树枝上、并把其奉持于台侧的，还有“取木绵垂于榊叶”神乐歌所言那样，像游丝那样的东西缠绕在长杆子上的等，把当时祝告的祭仪如实地表现出来。我认为只把𠙹作声，把H释为繁文，不能充分理解此字诸形的构造。当然如上所述，𠙹是载书之义，本来有载之音，载书的祝册贯穿于容器之上，即是表示载书的文字。[②]因𠙹字

---

①于省吾在《双剑誃殷契骈枝》正编第44页《释𩛥》中把𠙹看作□的初文，与才同字，但在卜辞中未有两形相混。

②与𠙹音系相近的有“菑”字，“菑，插也。”《汉书·张安世传》注，有插立之意。还应该参照以下引文：“事，立也。”《礼记·郊特牲》郑注；“倳，犹立也，东齐人，物立地中为倳。”《周礼·大宰》疏；“北方人，插物地中为倳。”《文选·思玄赋》注所引《汉书》韦昭注等。

单独也有载之意,从《说文》的解释来看,䰜即祟,应该说𠙹亦声。尚且,五祀的最后的𦎫字也从𠙵,我认为此𠙵也是装进祝册的容器之形,作为五祀最后的祭祀,把最初的工𡨦以来的祝𥏼之辞都装进此容器吧。可以考虑的是,如此五祀的祭祀顺序,前祭的册告之后、以称作鼓乐、舞容、侑薦、祝告、祝𥏼的次序进行。

与𠙹近似的字有"在"。卜文作才,金文作▼。卜文的才因契刻方便所以成为与▽相近之形,金文的字形接近原形,原本与𠙹相同从𠙵之字。董作宾把才看作卜辞"亡𢦔"的𢦔(灾)的省文,积土壅塞河川之义,加藤博士也视此为不易之说汉字之起原(八)六四,从字形上来说,才是本来之字,𢦔是才的孳乳字。我以为才是把载书竖挂在十字形树上之形,土地的修禊占有相当于《国语》中的所谓"标结"[①]之语,𢦔是其形声或者亦声字。災(灾)的本字作𡿧或者𡿦,是水的横流、溢流的样子。因此,才(在)是立挂上祝告的木桩子,是表示修禊占有的古代性土地的占有形态之语,卜辞"王才某"的"在"的原初之义也存在于此。也就是说,才、▼也应该是从以𠙵为基本字形的载书之义而产生的。

卜问或者祭祀的结果,多以吉、不吉之语来表示。吉的字形是表示什么,还未明确。吉合乎神意之语是毫无疑问的,与"告"是双声之语。《周礼·春官·大祝》的六祝之辞"三曰吉祝",郑司农注"吉祝,祈福祥也"。《周礼·大宗伯》中有"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其注"故书,吉或为告"也是如此。我以为对于"告"为祝告之意,吉是表示神意的承认许诺之语。神灵对于祝告进行意思表示时,附体于巫祝进行神托、言"若诺"时,对祝册进行一些神意降下的象征性仪

①表示领有,禁止入内,立木桩子,围上标识的绳子——译者注。

礼,我认为那是对于𠙵的(各)或"吉"。《尚书·立政》:"其克诘吉尔戎兵"的释文引用马融、有"诘,实也"。《释名》有"吉,实也"的训读,《孔传》训诂为"治"正确。"吉"的字形是卜文、金文中祝告的上面覆盖兵器之象,即作、、、,故产生诘实之意。这是密封其祝册盖藏之形。根据《尚书·金縢篇》,周克殷之后,武王疾病陷入危笃时,周公植璧秉圭,向祖王祝册之后,占卜得吉,把其祝册收藏于金縢柜中。我认为把祝册收藏于此柜中是表示"吉"字形的初义。重新把祝册收藏于金縢柜中是周代弥文之制,原来是把祝册装入祝告的𠙵就那样封起来,上面放上圣器并盖藏称为吉。占卜之后庋藏龟版,有时在刻字上面涂朱受洁斋宝藏,祝告之辞如合乎神意,把此装入𠙵中盖藏而保持吉祥。"古"也可看作是同义之字①。

从上述的曾、曰、告、、在、吉等字的解释来说,可知史是把有祝告之辞的简册装入容器、捧持其容器的字形。有把此用双手供奉的林·二·一六·一八的字形,也有把中放在台上捧持之形的摭佚续·四五的字形。如此可知史祭与告祭是甚相似的祭仪。

关于告祭有以下例子:

癸巳卜,㱿贞,告土方于上甲 四月 絜·六八 粹·一一〇七

癸卯卜,㱿贞,王命三百射,弗告十示,……王𡆥 乙·四六一五

①"古",《说文》(三上):"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也。"其说甚疑。孙海波认为:"似非十口,所从未详也。"(见《中国文字学》下编第84页)加藤常贤博士另外提出像胄形之说(见《汉字之起原》(五)第59页)。古字的金文与吉字相同,在𠙵上面放兵器干,表示密封载书之意。因许久坚固闭藏的祝册之类称为古,古往之意是其转义。祝嘏的嘏也从古。我以为古、吉、告诸字都是双声,其义也是相关连的。

癸巳卜，㱿贞，子渔疾目，福告于父乙　续·一·二八·六，等

续·一·二八·六

如上之例，告祭明确表明了祝告的情况、对象等，而史祭时这些并未表明。其理由是，告是面临祸殃的特殊祭祀，与此相对，史祭是比较一般的祭祀。上述史祭之例，只有向山岳燎祀祈雨的一例，是记述史祭的目的之例。

史祭如此，与在紧迫情况下进行的告祭不同，不如说具有月次性祭祀的特性，因此有甚至连祭祀对象也不表示的情况。卜辞中称为"又史""㞢史"的就如此，多数是所谓多子族卜辞。

辛巳卜，我贞，我又史，今十月　前·八·三·三

辰巳，子卜贞，今我又史　前·八·三·七

□无卜，䢅贞，至□，我又史　前·八·三·八

庚□卜，我贞，今日我又史　库·六九八

戊辰卜，王贞，旻囚囷㞢𡆥　粹·六〇一

……㞷来辛未，又史　乙·一〇一一

癸巳卜，𠦪贞，今四月……癸巳卜，𠦪贞，五月又𡆥，我……　乙·一〇一四

壬辰贞，史。癸巳卜贞，今六月又史，㞷七月又史　乙·一四七四

丁亥卜，𠦪贞，庚，我又史　乙·一七八七

辛未卜贞，㞢史，今日亡□　乙·四〇六四

乙巳卜，彴贞，今五月，我㞢史。乙巳卜，彴贞，辛，我又史。乙巳卜，彴贞，六月，我又史　乙·三三五〇

这些卜辞大体上属于第一期，贞字作𠕁。从记述月、日占卜来说，史祭是没有决定特定之日的吧。但是史祭大体上每月进行一次，可从这些卜片中察知。从贞卜者是被王、子及王室内朝之人所专属的来说，可推测史祭本来具有王室同族的内祭的性质。《左传》、《礼记》等所见"有事"[①]，大概与此"又史""又𡆥"有关系。史祭在

---

①"有事"本来是祭祀之意。《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大庙。"《春秋·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礼记·杂记下》："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至，可以有事于祖。"《礼器》："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判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以上可知，这都是把"祭事"称为"有事"之例。古代动兵时也首先进行祭祀，然后调动兵马，兵事也称有事。《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就是如此。《尔雅·释天》："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也是此意。卜辞所见"又史"或《礼器》中的"先有事"的"有事"，也许进行外祭之前首先进行内祭。"又史"就是所谓只见于多子族卜辞，我认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解释吧。

二期以后的卜辞中几乎看不到，是因为二期以后的卜辞内容与一期发生显著变化。与此相关联[①],特别是王室内朝的卜辞,所谓王族卜辞、多子卜辞[②]在二期以后消失,与此相应。

对于“又史”,相反还发现若干贞卜“亡史”“不史”之例。

……卜,宁叀不史　拾掇·一·四三六　宁沪·一·四九八

己亥卜,𬽨〈贞〉,亡史,今来乙　四月……　乙·一五三七

甲戌卜贞,亡史。辛未卜贞,㞢史,今日亡□　乙·四〇六四

这些大概是与上述的“又史”、“㞢史”的肯定句占卜的否定句占卜。从“史”字之上直接使用“不”、“亡”等字来看,此“史”字作为动词使用几乎是确凿无疑的。

如上所述,“史”作为祭祀之名,作为执行祭祀之意的动词,“史”的祭祀行为可认为是有祝告之意。 金·七四〇最明确地表示了“史”字的原义与祭祀有关联。还有在《殷墟书契前编》八·四·三中有:戊子……令……史…… 的一片,是子卜贞形式的一类,此“史”也是史祭吧。 卜文的字形与“欠”的字形相近,可看作开口说话之形,表示以闻(向天子进言)之形。在此史祝表示读其祝祷之辞之形吧。在此 字与“兄”的关联上有应该注意之处。“兄”字是把祝告的𠙵顶在上面之形。《说文》八下“兄,长也,从儿从口”,似乎解释为年长、使令别人之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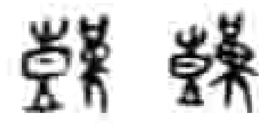
①参照董作宾《殷历谱》上编卷一,《殷历鸟瞰》,第一章二、《论殷代礼制之新旧两派》,见《小屯乙编自序》。董作宾的新旧隆替的想法,特别是把第四期看作旧派复活的学说甚有问题,但是祖甲以后的卜辞内容的变化有应该注目之处。

②贝塚茂树、伊藤道治:《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23册,1953年3月。

意思。还有上部的ㅂ看作头部的说法①、口是㐬之音、成人之意的说法②等。因“兄”是从示的“祝”字，我认为“兄”的上部的ㅂ仍然是表示祝告之辞之意。调查武丁期的子辈的卜辞，可知其两三人从事多数的祭祀的例子居多③。我认为他们是子辈中的年长者。祭事是年长者进行的，进行祝告之人即称为兄，侍奉于神前时为祝。“兑”的卜文表示其祝祷之“兄”的上面神气隐约降临的形象，表现了陶醉境地之意吧。 是加上袖子装饰之形，似乎表现祈祷时的舞姿。

与“兄”相似的字有堇。视为熯、暵的初文，太阳照射的意思。

堇的字形　甲骨文 　金文

艱的字形　甲骨文 　金文

庚戌卜贞，帝其降堇　前·三·二四·四

如此例，堇是上帝降下灾祸之意。其字还作下面加火之形。是女巫把祝告的ㅂ戴在头上，手交叉胸前被绑之形，下面加上火是烧女巫之象。“暵”之时巫祝（巫师）供奉祝册诉愁哀告，敲鼓以示天，有时有给巫祝加上捆成把儿的劈柴，焚烧女巫的习俗。④因此可知

①王筠：《说文释例》卷一八。

②见加藤常贤博士《汉字之起原》（六）第51页。

③拙稿《殷之王族与政治之形态》，《古代学》第三卷第一号，1954年3月，《白川静著作集》第四卷所收。

④《左传·僖公廿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藏文仲曰，……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又滋甚。”《礼记·檀弓下》：“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可见有熯时焚烧巫尪习俗的记述。这样的习俗不只是在中国古代，原始及未开化社会中也是极普遍的。James George Frazer（英国研究神话的专家）《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汇集了多数这样灾祸转移的仪礼。

兄、祝、莫诸字中包含的𠙵之形,都是装入祝册的容器之形。

如前所述,考察了卜辞所见"史"字用法,并略述了"史"字形及相关联字形,因此"史"字本来是表示祝告的祭祀行为的文字,我认为证实了史字所从的𠙵、甴全都表示是装入祝册的容器之形。并且通过全部相关联的文字,几乎不能发现筹算和其他直接与武事相关的事实。在筹算中探求"史"字初义之说,并不适合于全部相关文字的字形,在这一点来看,是不充分的学说。关于上述相关学说的诸字字形及形声等应该论述之处甚多。现考察"史"字原义作为直接的目的,所以在此不再加以论述。"史"字是拿装入祝册容器的𠙵之形,是我的想法。关于从"史"字滋生的"使"、"事"等字,并且是否能够无矛盾地解释,作为下一个的课题。

二

史与使有时有通用的例子,"癸巳卜史贞,旬亡囚,六月","癸巳卜使贞,旬亡囚,六月"粹·四三六,在一片中可以看到两个字,我认为这是贞人史名的两种写法。关于"使人""御使""甴王使"也有时有使用史字的例子。但是如上所述,从使用例来看,两字之间自然有区别,使字多数包含远方出使的意思。现关于其字形来说,使是持有叉头的长杆之形,史字只是在宗庙里捧持挂在神木上的祝册容器之形,而从使可看出包含远出都外而出使之意。首先试举"使人"之例。

乙酉卜,贞,使人于河,沈三羊,𠕋三牛,三月 粹·三六

乙酉卜贞,丁亥使人于河 粹·四六

其大出。贞,勿使人于岳 铁·二三·一

使人于岳 粹·三一

王于遲，史人于美，于之及伐望，王受又　摭佚·续·一四一　拾掇·二·七八

贞，史人于𡧊　天壤·四二·甲

贞，史人于我　戬·二六·八　南北·辅·二八

贞，勿史人于甾」王从沚戠　林·二·四·八

癸巳卜，㱿贞，史人于甾，其㞢……　佚存·四一

史人于戠　乙·五四一

王史人于沚，若　乙·一三五五

贞，勿史人于陮，不若　乙·一九〇五

贞，史人于妻　乙·四五五〇

……㱿贞，妇好史人于眉　簠·典·一一四

粹·三六

郭沫若上列粹·三一的一片注："使人于岳，当是以人为牲。"把"史人"解释为用人牲。但是"史人"的例子未必只是河、岳的祭祀。史大概是"使"的初文，根据这些辞例，"史人"不只限于河、岳、朿、我、𠂤、沚、戠、陮、妻等，有势力的近缘诸氏族也视为其对象，"使"大概是向那些氏族之地派遣特别任命的使者。朿以下等氏族是卜辞中频繁出现的殷朝雄族之名，单以此例来说，遵奉王之特命作为使者被派遣之意，河、岳之类难以考虑是政治性行为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诸氏族及上面列举的"河史""岳史"，也同样只能解释为远赴其地进行祭事。我以为在当时政治也还是以祭祀的形式进行的，如此派遣祭祀的使者、接受其共同祭祀，大概是服从其政治性的统治与秩序。因此"史人"一是在河岳那样的自然神之圣地，派遣使者执行王朝祭祀；二是在有势力的氏族的灵庙，派遣使者执行其祭事之意。

史祭特别盛大时，称为"大史"。史祭与叓祭虽相同，"大史"大概使用史。"大史"在文献多数所见的是"大事"。①

贞，其大史于西于下乙，匄，五…… 续·一·四六·四佚存·一〇

乙丑卜，出贞，大史□酒先酒，其出𠬝于□，卅牛 七月

①大事之语多用于祭祀之意。《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就是在大庙进行禘祭，在此合祭僖公之意。《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大事敛用昏……殷人……大事敛用日中，……周人……大事敛用日出。"《礼记·表记》："昔三代明王，皆事于天地之神明。……不敢以其私亵事于上帝。……大事有时日。……外事用刚日(甲丙戊庚壬)，内事用柔日(乙丁己辛癸)。"也都是祭祀之意。《左传·定公元年》："大事奸义，必有大咎。"及哀公十三年，吴与晋争会盟的先后而未能一致，"日旰矣，大事未就"的"大事"都是有关会盟的仪礼。《周礼》中"大事"之语频繁出现，除了《冬官·考工记》以外，涉及到其他五官，用于祭祀、军事、行政各方面，特别是《秋官·大行人》："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与卜辞的"史人""大史"意思相似。

续·一·四六·四

林·二·一一·一六

前·四·三四·一　缀合编·三八

辛亥卜，牵贞，收众人，立大史于西奠，玬，□月　林·二·一一·一六

这些卜辞中所见的“大史”相当于文献中的“大事”，史作动词称祭事。那是根据“贞，叀史”拾掇·一·三七二、“贞，不其史”乙·七〇八二、“王固曰，吉，其史”乙·七九五六等，伴随“其”的动词之例能够确认。派遣人到地方进行大型祭祀，是作为祭事和政治的政府最重要的政治性活动。这种活动也被称为“立史”①。

①齐《国差罎》：“国差立事岁，咸丁亥。”《子禾子釜》：“□□立事岁，稷月丙午。”《陈纯釜》：“墜犹立事岁，鳌月戊寅。”《陈璋壶》：“隹王五年，奠□、墜旻，再立事岁，孟冬戊辰。”等记载，其他列国之器没有此例。杨树达解立为涖：“涖事犹如涖政。”（《积微居金文说》卷一，第41页）咸、稷月等从王国维之说，解为月名。齐《陈逆毁》也有“冰月丁亥”之语。称作“立事岁”的纪年法，所谓大事纪年法，以特定的大事为其纪年，我解释此语为承接卜辞的“立史”系统之语。齐器、其他器文也有这样记载：“隹王五月，辰在戊寅。”叔夷钟，“隹王五月初吉丁亥”黔镈。稷月、冰月、咸等特殊称呼大概与神事有关之名。只有涖政、执政之意，难以说明采取这样大事纪年形式的理由。立事与此特殊的月名并记，与其他纪年法明确区别应该引起注目。因此在立事的“事”中，祭祀之意仍然深深地残留，立事大概是司祭大事之意。

乙未卜，立史，又从，我又从。贞，勿立史于南。贞，不其告明·二三二三 缀合编 一〇八

乙未贞，立史，南又从， 又从，□ 拾掇·二·六二

“立史”之辞中所见“又从”之语，大概是通过祭祀使者的派遣占卜祭事的成否。像这样奉王命向四方出使的祭祀官，奉持装入向神祝告的祝册或载书的容器，出使远方。之后的金文中其遗意仍然传下来，金文中史字上加偃斿(风幡)的字形居多。有表示⊌中有物之形的字，由此可知使者奉持祝册出使远方的情形。“立事”之语在西周金文中几乎未能看到。至春秋时期的齐器，可见“立事岁”的用法。大概殷朝的古语久传于东方之地。

字形： 小子𩰫𣪘 毛公鼎 史宜父鼎

通过祭祀的统治，同时意味着政治性的统治的当时，史既是祭祀又是政治，还含有军事性的意义。王与诸侯诸族的往来，除了朝聘入觐以外，派遣称为“朕史”、“我史”的王室特定身份的使者。我认为与“王史”一起，对于地方、远隔之地的政治性规矩，几乎都是以这种形态进行。

贞，行出王史。行出 后·下·二五·一二 续·五·三一·三 库·一六七九

乙酉贞，王其令羽，以从𢼸白□，出王史 南北·明·四七二 缀合编·三二七

己酉贞，火甴王事，司。己酉贞，王其令火…… 拾掇·一·四三一 宁·一·四九六

贞，召甴王事 续·五·二九·一六

丙午卜，㱿贞，召弗其甴王事 续·三·二六·三

丙午卜，㱿贞，召弗其甴王事。贞，甴召王事 续·三·二七·一

己卯卜，亢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周，甴王事 五月 续·五·二·二

□酉卜，犬其甴王事，□ 续·六·二二·一三

乙未卜，出贞，米甴王事，卜囚 十二月 文录·六二二

甲戌卜，㱿贞，易米取，甴王事 甲·三三三七

戊辰卜，牵贞，长亡米，甴王事。贞，长其㞢囚，其甴王事 乙·二九〇七

壬寅卜，牵贞，吕甴王事 乙·三一六八

庚申卜，㱿贞，陕弗其甴王事 乙·三八二二

□□卜，㱿贞，我甴王事。贞，我弗其甴王事 乙·四九五三

贞，毕甴王事。贞，毕弗其甴王事 乙·四九五三

续·五·二·二

文录·六二二

己酉卜，牵贞，收众人，乎从受，由王事 五月。甲子卜，㞢贞，令受垦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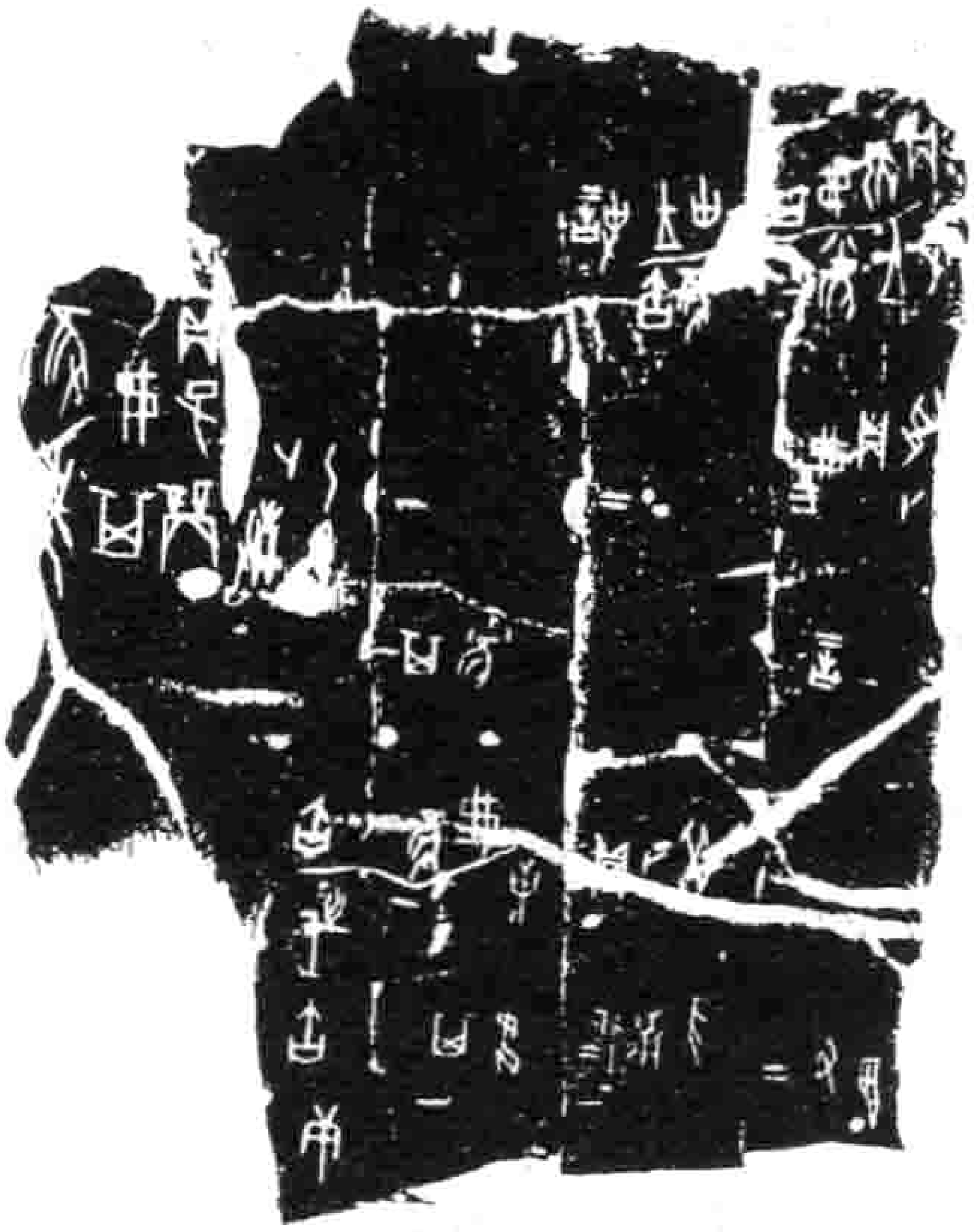
于□方，由王事 前·七·三·二

甲戌卜，王，余令角帚，由朕事 粹·一二四四 佚存·一五

作为这些卜辞例中所见的"由王事"的对象，是以䣙伯、火、召、犬侯、周、长、陕、毕、受等多数的方伯诸侯为首，是𠬝、𠂤、我、角妇等王族亲缘之族。从召国出现了后来的召公，从周国出现了周公，都是周初的圣职者。"由王事"本来是作为王室祭祀所进行的，派遣祭祀使者命诸方诸族奉行祭祀，因此有确立祭事和政治性的统治之意。但是有时提供众人命"垦田"(大概是之后的圣、垦田之意)，从设置土(社神)上说，大概这也仍含有祭事和政治性的意义。事是尊奉祝告，本来是史祭之意，因为事有祭祀使者的派遣就是命令王事之意，加上了祭事和政治性的意义。关于河、岳这样的自然神，本来有担任其祭祀的古族，但是由于王使的派遣，其祭祀权归属于王朝。"由王事"显示了作为神圣王朝的古代王朝完成了其祭事和政治性的统一。

粹·一二四四

我认为，王使的派遣未必是定期举行的，在特定的情况下，承认有必要在其地执行王室的祭祀时而进行的。上面列举的卜辞中，如"乙未卜，出贞，𠬝由王事，不囚死



乙·六七〇二(部分)

十二月”、“戊辰卜,牵贞,长亡囚,㞢王[illegible]”等那样,从“不囚”“亡囚”“㞢囚”的关联上说,这是对于某些事件、或不安的征兆而进行的。

可以考虑,这时从王室派遣祭祀使者,是王室承认有必要修禊祝告或重新盟誓等时、对其不安的征兆派遣祭祀使者。对于包含这种政治性意图的祭祀者的派遣,其对象的诸方诸族表现怎样的态度,或者贞卜派遣祭祀使者意图的成否,这大概是“㞢王[illegible]”卜问的意图。我认为,是否接受王室的祭祀,是诸方诸族对于殷室的祭事和政治性统治的承认与拒绝、决定政治性从属的应允与否的意见表示,因此像这样频繁地进行“㞢王[illegible]”贞卜。

祭祀在古代具有左右现实的诅咒效果,所以祭祀使者进行的祭祀行为对于诸方诸族有极大利害关系之处。

贞，我史，弗其𢦏方。贞，方弗𢦏我史　乙·二三四七

贞，方其𢦏我史。贞，方弗𢦏我史　乙·七七六四

两辞各为对贞，并出现在一片之中。即使这是有意识地尝试卜辞中常见的句法变化[1]，总而言之，从王室派遣的祭祀使者在进行其祭祀性仪礼时，存在给祭祀使者或者诸方诸族带来灾祸的忧虑。我认为“方”大概是东方九夷之一的方夷之国[2]。与此相似的卜辞有：

癸亥卜，㱿贞，我史𢦏缶。癸亥卜，㱿贞，我史弗其𢦏缶　乙·六七〇二　又、乙·七七九五

“缶”[3]是与殷之一族的雀相攻伐的国族之名，此辞是殷的祭祀使者的派遣对缶给以打击为目的而进行祭祀的事实。

对于“𢦏我史”，卜辞中还有称为“保我史”乙·一一七一的。这种情况的“保”明确是对“我使”表示某种态度之语。

保字的字形：甲骨文 　金文

上面列举的“保”字，第一字是卜文，以下是金文的字形。关于此字形，左右手一上一下，是记载殷王子之名时的笔法，可知“保”

①例如“甲申卜，御帚鼠妣己，牛牝牡”、“御妣己帚鼠一牛一羊”、“一牛御帚鼠妣己”（前·一·三三·七），三辞都改变了语法，可见似乎是有意识的尝试。

②杨树达：《释方》，《积微居甲文说》卷下。

③有“庚申卜，王贞，雀弗只缶。”（乙·六七〇二）、“□□卜，㱿贞，缶其𢦏雀。”（铁·一·二）等例。

之对象的子是像王族那样的显贵之子。试举出用此字形的卜辞例，有如下诸例：

保于母辛家，□酒　前·一·三〇·七

乙丑卜，穷贞，㞢⺈保　甲·三五一〇

贞，雀㞢保　林·一·三·三

贞，望乘㞢保，在取　库·一五九三

贞，其告壴于大乙，六牛，叀保祝　佚存·二三三

“母辛家”的家是家庙，保的仪礼在其庙所举行，祭仪也使用酒等。“㞢⺈”也是祭仪。令人注目的是保与那些祭仪一起进行。[①]雀是王族之一，望乘大概也是殷的近缘之族。大征伐时为侦察敌情等雀必定被任命。“在取”大概是在外地，特别是接受“㞢保”的仪礼。片末向大乙祈告壴时，进行保祝，可知保是为其安全的仪礼。

“保”字形是背婴儿之形，其下摆附上襁褓。此襁褓作为出生仪礼，为守卫生子之灵，或者是为授予氏族之灵之物，相当于我国（日本——译者注）的真床袭衾。真床袭衾是为授予天皇之灵的灵衣。于是，可知“保”是表示作为出生仪礼的受灵情形之字。关于“王史”的仪礼，特别是有表示受灵仪礼的“保”字用例，可知“王史”不只是祭祀使者，也包含这样灵的示威之意。作为这类之物还有“中干朕史”库·三六五，“干”是写作方形的楯之形，大概是捍护之意，还与“保

①周初召公被称为大保，金文的《作册大方鼎》、《尚书》的《召诰》、《顾命》等可见。卜辞中也有“西史召”之名，明确了召公之家是巫祝又是司祭者。另外，参照拙稿《周初对殷政策与殷之余裔》（《立命馆文学》七八、八二号，1951年9月、1952年3月）；《关于西周期东南地域之政治与文学》《立命馆文学》九六号，1953年5月。

王事”意思相近。

关于“𠙴王事”，还没有通训的解释。孙诒让早就根据“𠙴固曰”铁·二二二·二的𠙴与金文冑字上部的字形类似，𠙴作为由，是同音的繇之意，把“𠙴固曰”视为“繇固曰”之意。[①]叶玉森也承认孙诒让之说，卜辞的“𠙴王事”的𠙴是小臣或贞人之名，“𠙴固曰”与“王固曰”只不过是表示固者之语，金文冑字的上部像冑形、冑鍪之形，明显是不同之字。[②]郭沫若解释“小臣𠙴”菁·一卜通·七三五中的𠙴字为：“𠙴当是目不视之意，疑是古字，中画笔误，过于延长，古读为瞽[③]。”把“𠙴王事”卜通·四八七、七二六解释为：“古王事，殆勤劳王事之意。”尚且视与《诗经》中的“王事靡盬”同语，记述：“诗亦屡言王事靡盬，古必盬之初字。”甲骨文字研究·释寇二页释𠙴为古之说已在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存疑》[④]中所见，至今选此解释者居多。

郭沫若关于“𠙴王事”所引的“王事靡盬”之语，在诗篇中作为成语频繁使用，《诗经》的五篇中所见十二处，举出其例如下：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唐风·鸨羽》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小雅·四牡》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

①孙诒让：《契文举例》卷下，第34页。

②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卷四，第56页。唐兰、叶玉森都记述同旨之说，见《天壤阁甲骨文存》第49页。

③关于此片训读，参照平凡社《书道全集》第一卷，白川释文第161页。

④参照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存疑》，第12页、第62页。

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小雅·采薇》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悲，征夫遑止。《小雅·杕杜》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我忧父母。《小雅·北山》

关于"靡盬"，鸨羽之传："盬，不巧致也"，四牡之传："盬，不坚固。"因盬有不精制的盐[1]之义，所以"靡盬"是坚固严密之意，即在王事方面贤劳之意。北山之诗，是国家多事之际，叙述一部分人燕燕偃息，只有一部分人操劳的样子。其第二章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悲惨劳苦、畏罪、持续从事王事的状态，相当于"王事靡盬"的事实。还有以下记述：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葬灵王，郑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与其莫往，弱不犹愈乎，《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东西南北，谁敢宁处。坚事晋楚，以蕃王室也。王事无旷，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在灵王之葬，郑国之上卿应该参加其葬礼时，引用"王事靡盬"的诗句，此语用于应该效劳于王室的祭祀之意。上述举出诗篇的用例多是遵从征役之例。似乎在征役之间王事也对山野进行了祭祀。其他诗篇中关于"王事"，有《小雅·出车》"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小雅·北山》"四牡彭彭，王事傍傍"之句，仍然都是有关军事的。

以上诗篇之例，全是《唐风》及周之《小雅》之诗，殷之后的邶国之诗也有言"王事"之句。

---

①《周礼·天官·盐人》注。

《邶风·北门》：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此首诗中关于王事，都言政务上的负担。郑玄注“政”为“有赋税之事”，政、征税古为通用字。[1]此诗是咏殷之后的邶人在周的苛刻的赋税下挣扎之事。适是当[2]，敦是迫、薄[3]之意，是金文中所见“敦伐”之“敦”的意思。

于是，综述《诗经》、《左传》所见王事内容，有军事、赋役、祭祀三方面，这三方面形成王事的具体内容。这些诗篇的时代已经远离殷周之际，王事的内容在军事、政治方面显著增多了。但是在殷周之际，在王朝的统治方面尚且宗教性质浓厚，指祭祀本身的居多。上述的“𠙵王事”卜辞例中，包含𡆥、不𡆥之语居多，另外“立事”是莅临祭祀之意，从“事”本来是祭祀意思之语也可以理解。如上所述，有祭事转移到政治性方向的例子：“克𠙵王令”续·三·二八·七，引人注目。

卜辞“𠙵王事”的𠙵，是否可以理解为与诗篇的“王事靡盬”的王事同义，不能像郭沫若那样简单地论断。𠙵如上所述，与“𢦏”的上部

①《周礼·天官·小宰》：“八成……一曰，听政役，以比居。”郑玄注：“谓，政谓赋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从征。”

②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卷一，第6页。

③释文引《韩诗》所云“敦，迫也”之说。

之形相同，与曰、古、吉、告、曹、兄等诸字有关联之处。“叓”像手持甴之形，所以甴与叓是同系之字。王引之把“靡盬”的“盬”释为《周礼·盐人》中苦盐之苦，推出息之义[1]，到底是否是适当的解释还是疑问。是否能把其字的解释就照原样移到卜文“甴王叓”中，也是问题。

董作宾把甴作为从十从口之字，释为叶，作为協之意[2]，他把協的本字视为劦，其中有矛盾。关于甴，于省吾以载之义来解释，释为行之意，我认为是极其适当的解释。[3]以甴为要素的卜文、金文的字居多，那些字大概有载书、载行之意。从之后的字形说，有才、𢦏声的系列字从属于甴。也就是包含尊奉祝册、载书而载行之意，那些都是承认甴之声义的文字。

“甴王叓”应训读为“载王事”，我想通过以上所述大致已经明确，旁证此字的例子，在金文中也能发现。像于省吾也已经指出的那样[4]，《师询毁》：“王曰，师询，哀才，今日天疾畏降丧，秉德不克妻，古亡承于先生，向女彶，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䜴乃事，隹王身厚䪷。”“䜴乃事”是“载乃事”之意。关于此师询，那时得到周王极多的赐与，作为列祖乙伯与同益姬之宝毁而作此器，与称师某的师职多数出自殷系同样，师询似乎也是殷系之人。另外，铭文之首：

> 王若曰：“师询，丕显文武，孚受天令，亦则殷民。乃圣祖考，克差右先生，乍厥爪牙，用夹召厥辟，奠大命。”

---

①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王事靡盬”一条。

②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四，第6页。

③于省吾：《双剑誃殷栔骈枝》正编，第44页；又，同书续编第39页。

④于省吾：《双剑誃殷栔骈枝》续编，第40页。

可知师询之祖在周创业之际协助周，之后作为历代的师职在周做官[①]。“载乃事”的语法，是照原样承接“甾王事”的殷代的例句，对于习用卜辞“甾王事”之语的殷人后裔，在西周后期如此的器皿中，转用这样的成语应该特别引人注目。

师询𣪘是西周后期之器皿，这样的用语之例在更早时期也能看到。即师虎𣪘，大概是懿王时期之物[②]，其器铭如下：

师虎𣪘

①师询是殷人的后裔，从此铭文的内容也可得知，从父祖拥有乙伯这样的干名也可以推断出来。关于西周以后的殷人之器，参照拙稿《周初殷人之活动》（《古代学》第1卷第1号，1952年1月）、《小臣考》（《立命馆文学》116、117号，1955年1月、2月，著作集第四卷所收）。

②拙著《金文通释》卷二，第104页。

王乎内史吴曰:“册命虎”,王若曰:“虎截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啻官嗣左右戏繁荆。”

郭沫若把截训读为语词的載(载),还把“事”解释为事仕,似乎训读为:“即先王既乃仕命于祖考”两周金文辞文系考释七三页,其语法与大盂鼎的“在珷王,嗣玟乍邦”相同,应训读为“截于先王”。此器的末尾也有“用乍朕剌考日庚隮毁”,庙号使用干名,可知师虎是殷人的后裔。比师询毁稍后,有卯毁。其文如下:

燹白乎命卯曰,𢦏乃先祖考,死嗣燹公室,昔乃祖,亦既命,乃父死嗣莽人,……今余隹命女,死嗣莽宫莽人,女毋敢不善。

当时管理宫妾臣工的多数是殷人的职务①,所以我推测卯也是殷人的后裔。此𢦏与上述的截同字,郭沫若释为𢦏,仍是视作词语的載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八五页,此部分也应训读为与上述同样的“𢦏乃先祖考”。截、𢦏都是从㞢而得声的文字,字的十、才的部分相当于㞢的省略部分。最初是祝告之书意思的㞢,作为咒符加上戈成为𢦏。祝告之书的㞢,之后成为像神社的护符那样加在器物上的咒符,作为圣化的方法成为像“存”、“在”的“才”那样被使用。

①师猷毁:“余,命女死嗣我家,并嗣我西隔东隔,仆馭百工牧臣妾。”末尾“用作朕文考乙仲𩰫毁。”伊毁:“王乎命尹封,册命伊,并官嗣康宫王臣妾百工。”此伊是史懋壶所见的伊伯,其下面似乎有史懋那样的殷人。此伊伯大概是周系的人物,率王宫的臣妾、百工的不一定是殷人,卯作为燹伯之臣直接统治莽宫的莽人,这可以看作相当于伊伯与史懋的关系。可是这不是此问题的决定性的重要之处。卜辞“㞢王事”之语,在当时周人之间即使以“𢦏某事”之形被使用,丝毫也没有不自然。

围绕“凷王叓”的解释，论点涉及许多方面，通过上述，总之“凷王叓”的凷是在装入祝册容器的𠙵加上“丨”即他物，也就是明确了载书之义。因此凷为载行之意，可知“凷王叓”应读为“是否𠙵(载：进行)王事”。但是此凷像一部分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与《诗经》中“王事靡盬”之语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在《诗经》、《左传》所见的“王事”内容的军事、赋役、祭祀等之中，卜辞的“王叓”内容是把王使、祭祀使者作为第一义的。在卜辞“叓人”例中，有河、岳等的祭祀，还有伴随𡆥、不𡆥、不死那样的占繇之语的，大概此例本来具有祭祀性质浓厚之意。也可以说内祭的史祭成为向外扩大的祭祀。在“凷王叓”中可看出，其后能理解为“收众人”、“𡉚田”[①]等赋役的内容，祭事和政治性的统治意义更强了。经籍所见的“王事”，是从“凷王叓”展开而来的，这本来是从祭祀使者叓展开而来的。叓的本义既是“使”，又是“事”。文中叓字照原样使用是因为想保留叓的本义。如果讲述其区别的话，“叓人”是使人，“立叓”是莅临祭祀，“凷王叓”是“是否凷(载：进行)王事”。殷的政治统治像在古代社会中普遍见到的那样，以宗教性的形态来推动，可以看出，不久此𠙵、史、叓字的历史是表示其后的向政治性、行政性展开的过程。

三

史本来是把祝告载书之辞装入𠙵之中、捧持此器之形，祝史就是其本义。以《左传》为首，《国语》、《礼记》多处所见的祝史，是成为后世与伛巫之类同样看待的卑官，本来涉及到祭祀、军事、赋役等

---

①参照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七二六片，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四，第6页等。“𡉚田”大概相当于《说文》十三下“圣，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的“圣”字。

多方面，占有祭事和政治上的关键。卜辞中称为“上甲史”的，尚存本来的执行祭祀的意思。但是，此祝史走出王室的宗庙，捧持祝告载书出使于其他之地时，多数被称为叓即“使”。卜辞中称为“叓人”、“大叓”、“立叓”是表示，作为𠙵的插木使用叉头较大的树杈，有时加上偃游[①]、缠上游丝之类，捧持祝告载书出使于其他之地。使事的内容是通过祭祀仪礼达到政治、军事的目的，所以叓字又成为表现祭事和政治性的使命、使事内容之语，王命的内容不久被称为王事。史、使、事本来认为是同源，那是祭祀祝告之意的史之初义、伴随着作为政治性行为的性格逐渐演化而成的结果。于是，执行这样的史事的人，不久被称为作为官职的史，随着官制性的发展成为诸种史官。而且，在两周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史官的地位发生极其显著的变动[②]，这样的史官的源流，发源于远古的殷朝。

在殷朝，从“叓人”、“立叓”、“㞢王叓”的卜辞例所考虑的那样，按照需要由王室向地方的方国、诸族派遣使者，进行其祭事和政治性的使令，似乎也在有些地方设置史官承担此祭事。

丁巳卜，穷贞，令今丙肜□食，乃命西叓三月　甲·二一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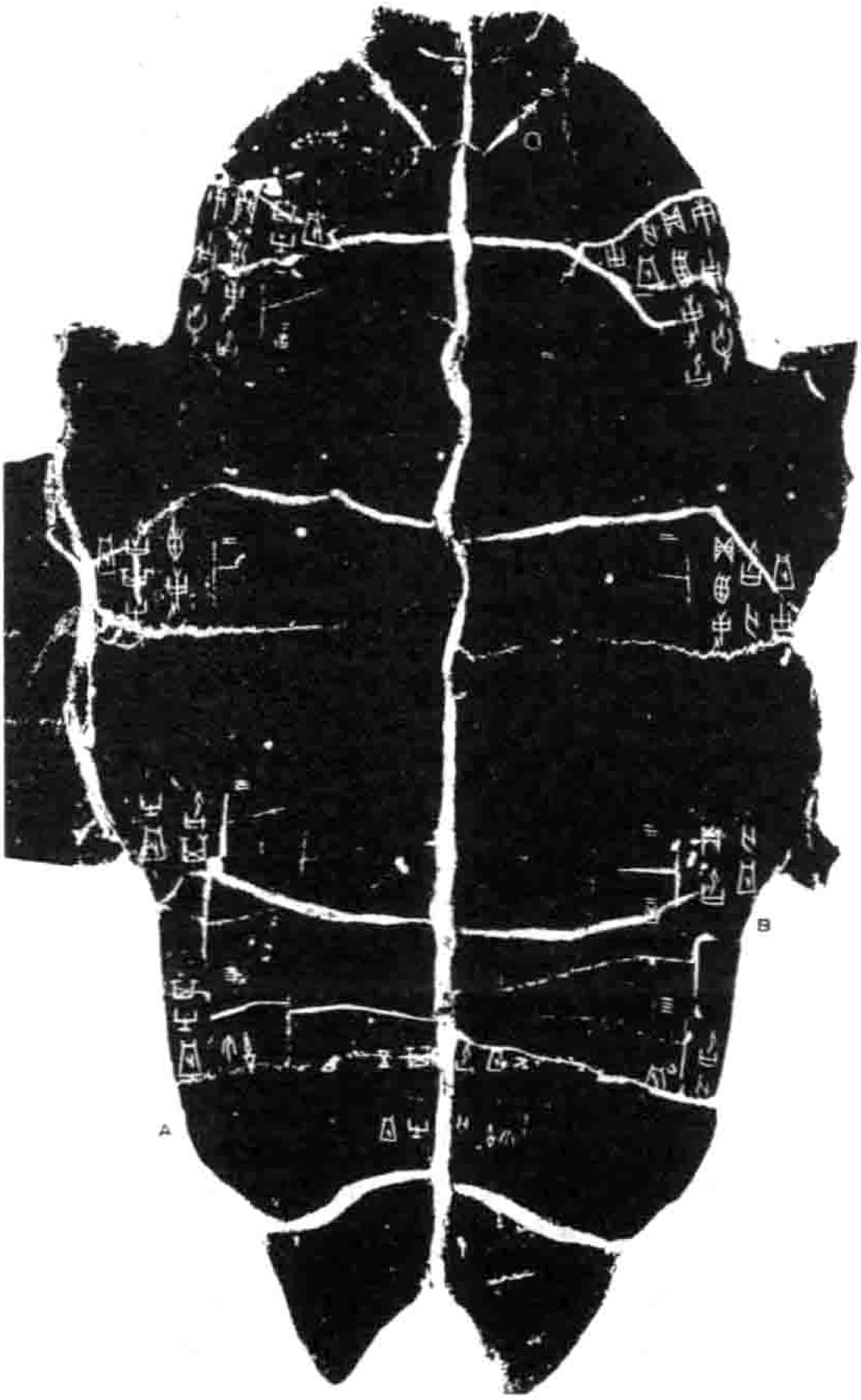
---

①在旗杆的上部加上风幡。——译者注。

②祝史的地位在春秋期极其低下。举出《左传》一例。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嚚，以辞宾。”此条的下文中，有晏子论述祝史的长文，作为晏子故事作了相当大的修饰，充分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祝史的状态。关于春秋期“史”系诸官想另作论述。文献有：《国语·周语上》“史献书”，《礼记·曲礼上》“史载笔”，《穆天子传》卷六“内史执策”，《国语·鲁语上》“故工史书世”。关于祭祀，《左传》中“祝史”之例居多，卜筮中《易·巽卦》有“史巫纷若”之语。

庚子卜，夆贞，西史召亡𡆥，由。庚子卜，夆贞，西史召，其㞢𡆥」贞，西史召亡𡆥，由。西史召，其㞢𡆥。贞，召亡𡆥。召其㞢𡆥。

乙·四五〇六+四五三六 缀合·二五七



乙编缀合·二五七 A=乙·四五〇六+B=四五三六

贞，在北史，山获羌。贞，在北史，亡其获羌　乙·六四〇〇

癸巳卜，其呼北御史卫　甲·一六三六

此“西史”“北史”“北御史”，大概可认为是作为在特定地区的祭事执行者从事常任之职。在管见的卜辞中，只见北史、西史之名，而不见东史、南史之例，东方除了夷人的一部分，殷之威势可视为几乎涉及临海之处。在南方缺乏侵犯性的强族，并且可看作东南夷诸夷与殷室的关系，至殷末的大破裂为止[①]，是友好的关系，所以没有设置常住使官的必要性。北史北称为卫，西史被称为召。卫大概是后来的卫之地，包括当时殷都安阳之地，邻接西北一带之地。从殷都安阳的位置来说，其地区大体上可视为殷朝的直辖地之处，不是派遣使者的边远地区，此北史的名称、任官等，或者在是殷朝迁徙到安阳前所进行的，也许迁都到安阳之后也沿袭了其制度[②]。尤其在此方面，以潞安地区的长狄[③]为首的其他狄种也居多，从此地在西北位置的𢀛方等向殷进行频繁地侵犯，为保卫殷都此地作为前卫处于重要地带，所以也可考虑此地特别使使官常住的情况。西史召的旨一般释为旨，我认为应释为召。与后期的卜辞、周代的金文记载的鍋字同字，鍋只不过是召的繁文。其地区大体是从伊洛的上流经过召陵及于偃城一带，可以考虑是河南西部的北部、中央部一带。周初召公辅佐周公，被任命治理东方。在经营洛阳之际，《尚书·顾命篇》记载的作王即位

---

①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三《帝辛日谱》。

②此意思是，西史召与其说从安阳，不如说从商、亳之地向西更适合。北史、西史大概是安阳迁徙之前的制度。

③见拙稿《殷代之殉葬与奴隶制》，《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二号，1954年1月。著作集第四卷所收，第464页。

司仪的召公，大概是当时此族的代表者。[①]召本来是殷的臣民，特别是在祭事、军事方面协助于殷，称为大保，其器铭多次称为圣号。[②]这是因为召占有宗教上特殊的地位，在殷朝作为殷的西史统治西方的祭事和政治，殷周革命之后，还对于周室占有祭事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协助其东方的经营，号令庶殷。

殷王室的天下经营，是从其政治势力的关系在北方与西方设置主力，南方也还有南夷[③]接壤，因为拥有不容轻视的力量，也有时派出使官采取对策。上述“立史”之项举出的“贞，勿立史于南。贞，不其告。”明·二三二三缀合编·一〇八就是此例。

北史又称为北御史，我认为御史又是当时的官职名称。其辞例完好的极少，关于当时的御史得到充分的知识和见识是不容易的，大概能够推知御史原来是祭仪之名，还是官职之名。

乎御史 乙·三四二二

乎隹御史 乙·四六二九·反

贞，乎□，入御史 董·人·八三

在丝，叀岳御史 摭佚·续·一九

乙卯卜，𠂤……御史 铁·一八三·四 佚存·五〇二 铁·二五〇·一

“乎御史”的乎是卜辞金文中习见之语、“呼”之初文。金文中多

①参照拙稿《西周时期东南地域的政治与文学》（《立命馆文学》96号，1953年5月）、《周初殷人之活动》（《古代学》第1卷第1号，1953年9月）、《周初对殷政策与殷之余裔（上、下）》（《立命馆文学》79、82号，1951年9月、1952年3月）等。

②例如在《作册大方鼎》把召公奭称为“皇天尹大保”。

③见拙稿《释南》，《甲骨学》第3号，1954年10月。

把此字用于呼内史，作册[1]使册命[2]之意，卜辞中𦥑甲·三三三八、奠女子乙·四七三七、众人甲·三五三八、射甲·七三九、𦥑乙·三一七四等呼诸族诸臣，命祭事时使用。“其乎取美御史”南北·上海·一〇〇，似乎是美的御史之意，“𠛱御史”乙·八八三五，𠛱似乎是地名。也有像“𠛱亡□”乙·二二六二的辞例。根据上述之例，有在御史上面加以地名的名称，像北御史卫、西史召那样，加在其族名之下的，或者像“美御史”、“𠛱御史”那样，有冠以地名族名的。

前·六·三五·六

“御史……乎𢦏”前·六·三五·六是在“乎”之下记载命令行为、事项等，像乎取、乎从、乎伐、乎归、乎𠂤携、乎田那样，“乎”的下一字大概是动词。因此𢦏也应该看作动词，此字是祝或者咒那样，大概表示咒祝行为之字。关于史与祝的关系，本篇《释史·一》中，从文字学角度举出若干形义相似之字加以说明，这一片更加明确了御史与咒祝的关系。此字还作𢦏续·五·一九·一五之形，是同一字。经典中祝史连称的例子较多。[3]对于乎称“入御史”簠·人·八三的是，从卜辞中占卜“王入”的辞例[4]之多来推测，大概占卜返回其京城的吉凶。我

①作册是祭祀官的名称之一。——译者注。

②册命是指天子下辞令赐予诸侯爵位、封土等。——译者注。

③参照前面注释。

④“翌甲辰，王入。”乙·七二〇、“丙午卜，穷贞，王入，若。”乙·五四六七等辞例居多。

认为王者、王族、圣职者的出入是根据俨然的占卜接受修禊的[1]。

御史的御，本来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祭祀的禦祀，对于自然神、祖灵降临的灾祸，为防御阻止的祭祀[2]。一是繇辞中丝御的御，是与繇辞的“丝用”为相对之语，训读为“用”（动词）的语法[3]。御史的御之义如是前者的话，“御史”二字都为祭祀之意，如果是后者的话，大概是进行史祭、进行祝告之意。现通观卜辞御字的用法，繇辞的兹御以外，其他有此意的例子不太多，几乎是禦祀的禦之义。另外御收续·一·二八·八、御𡳿续·一·三五·一、酒御续·二·二三·九、又御南北·辅·五八、𡳿御簠·帝·八〇、彡大御南北·明·四三二等，与其他祭仪连用的较多，御史本来是祭祀之名的解释为好。因为壱祸多是由祖灵所带来，对其祖灵进行禦祀祝告居多[4]，执行御史的祭祀之人，可以认为不久御史以至成为职名。《尚书》中多见御事之名[5]，《诗经》中毫无所见之处。《周礼》及秦汉以后还有御史之名，秦汉以后成为显官之一。我认为《尚书》的御事，相当于后来的御史，但是远古的殷朝称

①贞卜王之往的有乙·七二一、乙·三四四五、乙·四五四四，贞卜出的有乙·三五六一，贞卜步的有乙·四八〇八，贞卜行的有乙·九四七等。

②关于禦祀，参照拙稿《殷之王族与政治形态》（《古代学》第 3 卷 1 号，1954 年 3 月，《著作集》第四卷所收，第 484 页）。

③“丝用”与“丝御”语法相似，“丝御”，像“壬子卜贞，王田于斿，往来亡巛，丝御，获鹿十一”。前·二·二·六·七那样，多用于田猎往来之际，“丝用”，像“甲戌卜贞，武祖乙宗丁，其牢，丝用”。前·一·一〇·三那样，多用于牢牲。“丝御”之前多置有像“王固曰，吉”林·二·一九·一、“王固曰，弘吉。”前·二·三四·六那样的用语。此御似乎与御祀的御之用义不同。

④参照拙稿《殷之王族与政治形态》（《著作集》第四卷，第 484 页）。

⑤于《泰誓》、《牧誓》、《大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顾命》、《文侯之命》诸篇可见。

乙·七七九七

为御史，所以秦汉以后复原了古称。

“北史”“西史”“御史”与“三史”之名在卜辞中所见也引人注目。管见之处仅有一例，大概还是殷朝官制之一。

己未卜，古贞，我三史，史人　乙·七七九七

“三史”大概相当于《尚书》的三事、《诗经》所见的三有事、三事大夫等。《尚书·大禹谟》有“六府三事”之语。《大禹谟》是伪古文，并

且此三事不是官职之意。同样古文系的《周书·周官》有:“王曰,呜呼,三事既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万邦惟无斁。”此三事似乎是承接《周书·立政》中的三事。《立政》属于今文,篇中多以三之名数而成文。叙述其三事之文:

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庐烝,三亳阪尹。

在此所见准、夫、牧是指上文的“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的三事,事的古文𠭥之形讹误为“夫”。[①]此三事从古可考虑为殷官,已经在《立政》中也可见:

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此三宅是“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的三宅,上文的“兹乃三宅,无义(邪)民[②]”的三宅就不用说了。统一为三事下列举的庶官,根据其说,三事掌管之处涉及六官的全部。本来《立政》篇是古意丰富的一

①《左传·成公二年》作为周之官有三吏之名,大概此三吏也是三事。其职事属于行人之官,相当于使人的接待。晋向周室奉献齐之捷时,王作为非礼不受,可见:“王,委三吏,礼之,侯伯克敌,大夫告庆如礼,卿之礼降一等。王宴巩伯,私贿之,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籍,记录)。”

②从王念孙之说。参照《经义述闻》卷四“义民”之条。

篇，与《周书·五诰》诸篇相比包含一些新的要素，所以不一定显示周初官制。在这一点上，《诗经》所见的三有事、三事大夫，是当时实际歌唱的作品，应视为西周后期三事的职制。

>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小雅·十月之交》
>
> 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莫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小雅·雨无正》

《十月之交》第四章：

>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此官名在西周金文中都可见，但是“卿士”作“卿事”，“趣马”作“走马”，除此之外其他都相同[①]。明确了所谓三有事与此诸官是不同之物，从卿士的皇父选任三有事来说，应视此三事是服从卿士的总监督。因此，《毛传》把三有事视为三卿未必妥当。又根据《诗经·小雅·雨无正》，三事大夫是在朝廷宿夜之臣，与朝夕执行大采小采之礼的邦君诸侯有区别。我认为皇父在设立其他都邑“向（地名）”之际，为经营其都邑而任命的是三有事，三有事、三事大夫等是直

①卿事寮《令彝》、嗣土《免簠》、宰师《汤父鼎》、善夫《大段》、内史《燮段》、走马《大鼎》、师氏《师遽段》。

接担当政务的行政官,似乎是特定地区的官职。而且,这从周初金文来看会更加明确。

周初金文称作三事的有令彝和小盂鼎。小盂鼎之文泐损甚多,有难以看出文意之处,令彝也以难解著称,总之根据这些器文能够确认周初三事之名的存在。

>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徃同卿事寮,隹十月月吉初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徃命舍三事命,眔卿事寮眔者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庆,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乃命曰,今我唯命女二人亢眔夨,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乍册命,敢扬明公

令彝

尹𠬝休，用作父丁宝𪻇彝，敢追明公赏𢆶父丁，用光父丁。鸟形册图像。令彝

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明，王格周庙。……宾，侍邦宾𪻇其旅服，东向，……大采，三□入服酒，王格庙，祝，…… 雩若翌乙酉，三事大夫入服酒，王格庙，祼，王邦宾，侍，王命，赏盂…… 小盂鼎

令彝所见"尹三事四方"、"舍三事命"之语，未必说明称作三事官制的存在，"三事命"是在周的新军事性都邑成周施行的事实，与上述的《十月之交》的向邑的三有事之任命相关连，殖民地性的其他都邑的经营，能够显示出是以三事、三有事的行政机构形式而进行的。于是，这样都邑以外之地是以"四方命"来治理的。

另外关于小盂鼎的"三左三右多君"，郭沫若在《大系》关于"三左三右"解释为：《曲礼下》的天官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的六官，大宰、大宗、大士在王之右，大史、大祝、大卜在王之左，可见称为三左三右。[①]因此六官之名不见于殷周文献，尚有难以相信之处。我倒是认为，这是古代兵制的"左右戏繁荆"师虎𣪘、"西隔东隔" 师𫊣𣪘，班𣪘中所谓"左比"、"右比"，相当于后期金文中所见的"左右虎臣"。"多君"相当于令彝中的"里君诸侯"。小盂鼎叙述从事军事之人，征伐鬼方立战功之事，王至周庙受此而祝告，作为王之邦宾向他们行祼[②]而犒劳其功。接着三事之人进入周都，同样饮酒、被授予同样之礼，因为他们也服从战役取得了功劳。郭沫

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37页。

②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

若以“入服酒”充当饮至策勋之礼，因为他们本来是首都之外的人，所以赐予“入服酒”之礼。

以上述《诗经》、《尚书》、金文之例来考虑三事之官，可知他们是作为当地的执政官，担当涉及政事、军事之人。我认为殷的所谓北史、西史及各地御史之官是三事之官的起源，按照其鞅掌政务的分担，之后分为称作准、事、牧诸官，总称为三事。三事本来是派遣到地方的王的使者，王事的鞅掌者可以考虑是当地的执政官。

乙未卜，㞢贞，我三史，史人

大概是占卜在这样的三事的派遣地派出使者。

卜辞中还有“卿史”之语：

辛未，王卜，在[illegible]，宿隹[illegible]，其令卿史 后·上·一二·一+前·二·二三·一缀合 卜通·六一五

在此所见的“卿史”，罗振玉解释为与金文所见的卿事相同，如下所述：

卿事亦见乙未敦。文曰：乙未卿事，锡小子臣𨟻贝二百，与卜辞同，毛公鼎及番生敦，亦皆有卿事。士古皆训事，卿事即卿士也。《诗·商颂》：“予降卿士”。《大雅》：“百辟卿士。”《笺》：“卿士，卿之有事也。又《小雅》：“皇父卿士。”《笺》云：“朋党于朝，皇父之为端首，兼擅群职。”故但目以卿士云，诗之卿士，即卿事。《周官》六官之长，皆曰卿，而郑君谓卿士兼擅群职，是卿士

即冢宰矣,《周官》虽无卿士之名,而屡见于《诗》及周初金文,是《周官》实沿殷制矣。[1]

王国维也在《释史》中论述卿事、卿士之名与卿史相同[2],郭沫若也继承罗振玉、王国维的学说,举出《诗经》之例:"今案,令其卿史;犹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卿事、卿事寮之名多处见于西周初期金文,能够容易推测其官名起源于殷朝。从上述卜辞来看未必确定为官名,尚且应有疑问之处。也就是此"卿史"二字也都有动词的用法,作为动词训读也不是不可能的。

卜辞中有:

大乙史,王其卿　甲·二〇三八

进行大乙的史祭之际,占卜王在其后是否可进行飨礼。

还有卜辞:

丁未卜,允贞,其又史。丁未卜,允贞,御于小乙奭妣庚,其宾卿　甲·二七九九

这一片虽难以弄清前后两辞之间的关系,但能同时看到史祭与飨礼。关于这两片,特别是根据前一片,可知进行祝告的史祭之后再进行飨礼,如果史祭的执行者称为史的话,飨礼的执行者有可能称为卿。像"御史"两字本来都是从祭名而来的那样,"卿史"、"卿史"的

---

①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下,第63页。

②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第4页。

两字也都是从祭祀仪礼而产生的，我认为史祭与飨礼的结合而成常法，其执行者不久以至被称为卿史、卿事。

最后关于大史寮进一言。罗振玉关于殷制中的大史作如下所述：

> 《周礼·春官》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亦掌大祭祀。卜辞中因卜祭而有大史之名，是殷之大史，职掌与周略同，《周官》实沿殷制矣。卜辞称大史寮，周之毛公鼎、番生敦，亦均有此语。[1]

罗振玉所说的大史，大概如上所述“贞，其大史于西于下乙”续·一·四六·四佚存·一〇，以大史充当官名，这不是官名。罗氏所称的大史寮，大概是指下面的一片：

> 刜令……其唯大史寮令。王初……寮……□……敀 前·五·三九·八

罗氏把卜辞的刻辞分截为上下两段，把下段的八字从左行读，我认为此训读方法正确。其他还有“弜改，其唯小臣□令，王弗每”前·四·二七·二之例，由此可知“大史寮令”四字可连读。可考虑此片“王”字的字形是祖甲期的，大概当时大史寮的官职已经成立。我在本文中引用的卜辞几乎大部分都是属于第一期的，其他也有少数第二期的，大概殷朝迁徙安阳之后，四方的经营颇有进展，官制也逐渐完备。寮是从燓祭之形的字，周的金文中可见大史寮、卿事寮、寮人、敌寮、百寮之名。[2]燓祭多是对先公诸神、自然神等所进行的，

---

①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下，第 63 页。

②大史寮《番生殷》、卿事《寮令彝》、敌寮《叔夷钟》、寮人《令殷》、百寮《牧殷》。

卿、史之名已从祭祀仪礼中产生来考虑的话,可推测把寮用为官名也是同样的关系。此寮字用为大史寮、卿事寮是应该特别注目的。如此,关于此项考察的殷朝的“史”系统诸官,西史、北史、御史、御事、三事、卿事、大史诸职,决不是处理簿册的书记官,也不是使用筹算的射(官名)的箭数,都是祭祀之官,可知“史”是由祭祀到祭事和政治、逐渐涉及到政治、军事之要职。

对于地方殷室的支配形态,最初是间接地接受王室的祭祀使者、奉行其祭祀,即通过祭祀权而进行的。其政治性的支配,包含在支配者的祭祀体系中,关于采取祭祀共同体性的形态,不只是中国的古代国家,一般是古代国家政治支配扩大的形态。也就是以神话及由神话所建立秩序之祭祀的合并形态而进行的①。作为统一者的性格在殷的神话中已经显著地表现出来②。于是作为结合王室与地方、维持其支配的方法,祭祀的使者往来于两者之间。“史”字的初文□,本来是奉祝告之形,□是祭仪之名,其后成为执行者之名。史赴地方时,系着祝告之器𠙵的树木上附加偃游(□、□)③。他们是王的使者,所以被称为王使,随着祭事和政治性支配的进展,政治性、军事性意义逐渐加强。王使不只是为执行祭祀的使者,王使传达的使令视为王事。王事的鞅掌者按照其地域称为西史、北史,卜辞可

①我国(日本)《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吸收出云系神话是很好的例子。尚且希腊有同样情况,松村武雄博士的《关于古代希腊的宗教葛藤》(培风馆,1942年12月)中有详细记述。

②见拙稿《殷之神话》(《说林》第4辑,1949年7月)、《殷之世系》(《说林》第5辑,1949年8月)。

③旅、斿字都从㫃(□),□的上部是其初形。《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即使是后世的制度,关于史、士的行旅,旌旗之用的记述可作参考。

见西史召、北史卫之名。从这样的祭事和政治性的支配形式，产生像御史、御事、三事、三有事那样的职制。

如此，从以祭祀为中心的统治，向政治性、行政性的统治发展。那是表现在古代国家从其神权政治性形态逐渐使统治秩序推进组织化，完成政治形态的过程中。能够解释为“史”的历史，即由“史”至“使”“事”展开的历史，是照原样如实地表现古代国家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于是殷王朝在卜辞时代的初期，一面保有神权政治性形态，一面已经达到政治性统治的阶段。如上所述的“史”系统的官制发展如实地表现了其情况。

四

殷周的青铜器署 字铭的甚多，内藤博士在《擴古录金文》中指出署 字的涉及 65 器。而且在 65 器中，从兵器及于 18 器来看，“史”字的本义原是与武事有关，想探求“中”是放入筹筭（算）器皿的实证。①但是可以考虑当时的青铜戈等与其作为利器的实战之器，不如作为仪器、明器之意的居多，另外不问职掌如何，当时的人们拥有氏族生活必要的各种彝器。②于是单从这一点就得出此结论，尚有许多不安。主管殷朝军事之人为史官的证据，不能找到其他根据。即使在卜辞中，军事中多子、多子族、师某、望乘、多射、多

①内藤博士：《支那史学史》，弘文堂，1949 年 5 月，第 7 页。

②拙稿《殷之基础社会》，《立命馆大学创立 50 周年纪念论文集》，1951 年 2 月，《白川静著作集》第四卷所收。例如鼎（贞松堂·二·一六）、觯（贞松堂·九·二三）、卣（长安·一·二一）、壶（啸堂·上·四一）等铭记弓形一字的彝器有多数，这大概表示掌管武事的一族，属于戈、戟、勾兵的反而很少见到。关于铭记“史”的金文在下文中举出其中一部分。

马等，为军事编排的居多。[1]称为沚𢦏爯册也多是从军旅的，但是没有史官執掌其事的记录。而且铭文中也有称史某的，也可以看到与祝册、朝廷礼仪有关的例子。因此金文中所见的“史”之职掌，应该加以探讨、归纳。

金文中称为史或史某的，属于殷人或殷系的居多。例如：

史 父丁 史父丁卣 西清·甲·一〇

史 父辛 史父辛爵 攈古·一之二·二四

史 父癸 史父癸觶 贞松·九·二三

史 祖乙 史祖乙觶 贞松·图·中·三

史造作父癸宝䵼彝 史造鼎 西清·三·二三

史喜作朕文考翟祭，厥日唯乙 史喜鼎 文录·一·三五

史𧻚作祖丁宝䵼彝，两册图象 史 卣 攈古·一之二·七一

史工父作父癸䵼彝 史工父尊 奇觚·五·八，……

可知署史器的父祖名中使用干支名的居多。这些诸器，从其形制、字迹上来看，可得知确实为殷代容器之处居多，能够确认殷人以史作为族名居多的事实。

西周金文中称史某的也居多。即使“史”之名起源于殷朝，也不能判断西周金文中的史某全都是殷系的遗裔，也许史某中有周系之族。例如御事即使原来是殷制的官名，《尚书·召诰》：“王先服殷

①其中一部分在拙稿《殷之王族与政治之形态》中论述（《古代学》第3卷1号，1954年3月，《白川静著作集》第四卷所收）。关于殷朝的军事组织，在本论丛三集的《释师》中论述。

之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殷周也都有御事之官。但是，从金文中有被认为是殷人后裔的史某甚多的情况来看，在此通过探讨被认为是其殷系的史某之器的铭文，想作为窥视他们传承职掌的资料。尤其在殷代卜辞中，可知“史”字初义为史祭，各地奉使王室祝告载书而进行祭祀的使者，发展到由祭祀涉及政治行政等王事的实施。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加上伴随着殷王朝灭亡的东方诸侯情况变化的重要条件，在史的职掌上发生的变化。现省略关于由史分化的诸官情况，举出认为殷系的史某之器数例，考察当时史之职掌，想追溯并考虑与“史”之原义的关系。

（一）史兽

尹令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咸献工，尹賞史兽勋，易豖鼎一、爵一，对扬皇尹不显休，用乍父庚永宝障彝[①] 史兽鼎

此器最初旧藏于杭州的驺安处，之后到庐江的刘氏手中。关于此器文，称为尹或皇尹的大概是作册大方鼎所见的皇天尹大保。其铭文是：“公束铸武王成王异禩鼎。隹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之宣休，用作祖丁宝障彝，鸟形册图象。”根据此铭文，皇天尹大保是公朿，即周初辅佐周室，侍奉成康二王的召公奭。受其召公之命，在成周立工[②]并献此，可以解释为召公从事

①《贞松堂》（三·二九）、《缀遗斋》（四·五）、善斋（礼器·二·七九）、《周金文存》（二·补）、《文录》（一·三〇）、《小校经阁》（三·一八）。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与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书道全集》第一卷分别记载有拓片著录，本文就不一一注释了。

②持称工的咒具，神事时侍奉王。——译者注。

成周的营造。关于洛邑的营造，《尚书·召诰》记载：

> 惟二月史迁说："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既望，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召公奭先周公相宅预定地。越

史兽鼎

> 若来三月，惟丙午朏三日，越三日戊申五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七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十一日，位成。若翌日乙卯十二日，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十四日，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午十五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二十一日，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弊，乃复入，锡周公。

把庶殷即殷的诸族转移到此地，进行新邑的营造。根据《尚书·

洛诰》,完工时王在此声明殷之礼,其十二月戊辰在新邑进行烝祭、祭岁(祭祀名),命作册奉祝册。根据《汉书·律历志》,十二月戊辰相当于晦朔。《召诰》、《洛诰》首尾相应,应该自成一篇,因此董作宾考虑,把此年的三月之后加上闰月,《召诰》的二月、三月的干支和《洛诰》的十二月戊辰晦朔的干支能够相接续,此器文所见的“立工于成周”,“献工于尹”,是营造洛邑之意,如果“十又一月癸未”与《召诰》、《洛诰》同样相当于成王七年,其日正是成王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干支上没有矛盾之处。[①]总之,史兽大概是洛邑经营之际被迁的庶殷之一,工也就是相当于指挥工人修建。《洛诰》中,王告周公曰:“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如果士、师、工表示当时的编制区分的话,史兽大概是那时建基仪礼的执行者。于是对其功劳,营造的总负责人皇尹授予豕鼎一、爵一。豕鼎之名在铭文中所见是罕见之例。赐予鼎、爵,大概是因为史兽之家本来进行了祭祀仪礼。殷器、周初之器记载,对殷人或者属于殷系人的赐予之物中以贝朋[②]居多。[③]在此器中,赐予这样的礼器是因为史兽的献工与周初的重要仪礼有关。

(二)史兒

王令中,先省难或贯行,埶庢才□,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女史小大邦……,中省自方,复造□邦,才噩㠯餗,……用乍父乙宝彝　中甗,大系考释·一九页

①董氏:《殷历谱·上编》卷四《殷之年代》,《殷周之际年历考》,第25-26页。

②指一连串的贝。——译者注。

③拙稿《小臣考》三,《立命馆文学》116、117号,1955年1月、2月,《白川静著作集》第四卷所收,第540页。

这是所谓安州六器[①]之一的甗铭。虽然是长文，因是宋代的摹写记录，不明之处居多。“中”是周初随从东南夷征讨的武将之一，见于中方鼎一·二、中觯大系考释·一六页以下，其名还见于师旅鼎大系考释·二六页。中器全都供奉父乙[②]，所以明确了其家是殷人的后裔。此器所见的“史兒”（人名），因为首先在征役之前视察南国，对于担任前进基地的“中”（人名），侍奉王命，奉告任命和赏赐，所以“史兒”作为王的使者赴此地。当然也是担当军旅之际祭仪的执行。关于史兒，是否是殷人还不明确，从“中”已经是殷人来看，可以推测向“中”的使者史兒也是殷人。

（三）史旟

隹王伐东夷，溓公令䨒眔史旟曰，㠯师厥（氏）眔有嗣追或，𢦏伐腺，䨒孚贝，䨒用乍餈公宝障鼎　鼎，大系考释·二八页

员从史旟伐会，员先内邑，员孚金，用作旅彝　员卣，大系考释·二八页

䨒鼎之铭所见师氏、有司，可认为是在成周设置的庶殷之官[③]，

①见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跋尾》三《安州所献六器铭》：“重和戊戌，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之。……凡方鼎三、圜鼎二、甗一，皆形制精妙，款识奇古。”

②《中方鼎》一：“中对王休令，𪔂父乙障。”《中觯》：“中䚄王休，用作父乙宝障彝。”

③录𢦏卣“叡，淮夷敢伐内国，女以其成周之师氏，戍于𠂤。”另外令鼎的“三事”是“三有事”，“明公朝至成周，𢓊命舍三事命”。关于成周的师氏，拙稿《小臣考》也有论及，在本论丛三集所收的《释师》中有详述。

寧与史旟大概都是殷系之族。溓公见于厚趠方鼎，令鼎也有溓仲之名，仲是王之仆駿也是近臣。王要伐东夷时，溓公就马上从征。在周初东南夷远征时几乎调动了殷朝的残存军事力量[①]。根据员卣，员跟从史旟伐郐，又根据员鼎大系考释·二九页，他是作父甲之鬻彝，用𦥑形的款识的殷多子族的后裔。考察这些情况时，史旟也是殷系之人，但是是否是殷的同族难以确定。卜辞中所见的北史卫、西史召，从认为各方面有重大的行政兵马权来说，可以考虑是史职本身被给予相当大的权威。史旟一例，表现了史官本身在军行中显示极其重要的地位。

(四)史矢

隹王大龠于宗周，徃𩜁莽京年，才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矢，殷于成周，𥊟百生豚，眔赏卣鬯贝，用乍癸宝障彝，臣辰两册𦥑 臣辰盉，大系考释·三二页　臣辰卣，书道·一·四九

此器传是1929年与令彝一起在洛阳出土的。[②]现可知道的臣辰关系的器物全部达三十多器[③]，大概是父乙的宝彝，还有父辛、父癸的各种数器。与此器同文的还有尊和卣，成为没有前例的一大器群。

---

①见拙稿《关于周初殷人之活动》，《古代学》第1卷第1号，1952年1月。

②郭沫若：《臣辰盉铭考释》，《丛考》二二七。

③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册，第44页。

关于龠，有《周礼·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的记载，与器铭“五月”的节候一致。郭沫若把“饔”解释为“馆”，但是不能采用大事

臣辰卣

纪年之意，还是应该释为享礼①。应该看作是在宗周禴，在饔京莽，在成周祼，在宗庙诸宫之地进行的一系列祭祀仪礼。郭沫若还把解释为《周礼》的殷覜之礼，与作册䰧卣大系考释·一〇页 书道·三九“隹明

---

④《吕方鼎》：“王，饔于大室，吕，祉侍于大室。王易于吕鬯三卣贝卅朋。”像郭沫若所言那样只有汇集在馆中之意的话，赏赐应该说过于隆盛。这必然像剌鼎：“唯五月，王在初，辰在丁卯，王啻（禘祭），用牡于大室，啻邵王，剌御，王易于剌贝三十朋。”那样，我认为是进行某些重大的祭祀仪礼。古代的仪礼中，有禴之后进行献享之礼的规定。

保殷于成周之年"的殷相同，鼴卣也与此器相同，赐与鬯、贝，不像"殷覜以除邦国之慝"《秋官·大行人》那样的行政性仪礼，我认为更具有祭祀仪礼的性质。其祭祀时，军官的士上和祭祀官的史寅，根据王命而从事，这可认为是国家性的仪礼。大命革新之后，在成周聚集殷的余民进行的大会同之礼，似乎与此适合。

在周初的金文中，铭文中举出作为行为者二人之名，作器者是其中一人，铭文末尾录上其名的有数例。令鼎中举出"令眔奋(令与奋)"，作器者是令，像上述寠鼎的"寠眔史旟"那样，与史旟受命行动、标记寠之赏赐与作器，像燮毁"燮眔内史(燮与内史)"那样，与内史被命事、赐与土地和人民，大概在此器中标记其名的燮是作器者。我以为这样并列记载的两人是共同从事其事功，或者也有包含同族关系的情况。彝器本来是宗庙的祭器，所以不接受异类，以此有奉告父祖之灵之意。因而可以考虑记载连名之彝器都是同族、同宗的，也就是可以考虑士上与史寅还都属于臣辰之族。

臣辰之家，在图像中包含两册，原来是以册祝为主之族。两册是牢闲的栅栏之形，本来是掌管牢牲之家，与其牢牲一起进行祝告，成为册祝之职，成为史官。从其史官之家出现了士职[1]，这可视为氏族是从部门的制约解放而分化的结果。西周金文中，士某之名至后期也有记载，在初期只见一例。把其父称父癸，还从文章末尾记录的图像来看，与此器从洛阳出土相对照，史寅也还是成周的庶殷之一，特别可考虑是繁盛之族之一。

①《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史、士并举，并且下文中记载的行旅中旌旗之制，成为解释史、士之职掌的参考。参照本稿第三节注释。

(五)史䛐

乙亥，王𢍉毕公，乃易史 贝十朋，古𢀜彝，其𢀜之朝夕监 史䛐毁，大系考释·四五页

从𢍉的字形来考虑，大概是与誓约相关的行为。毕公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有“文之昭也”，其名在《尚书·顾命》中也有所见。根据古文所写的《尚书·毕命》：

>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

毕公被给予管理成周的庶殷之职。现根据西周金文，献彝大系考释·四五页：“对朕辟休，乍朕文考光父乙，十枻不䜌，献身才毕公家，受天子休。”可知毕公的家臣中有殷人。因此史䛐也侍奉于毕公，毕公被王授予某些荣誉时，大概史䛐也被给予恩赏。贝十朋是极大的赏赐，可知史䛐的蒙受仪礼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殷人的赏赐，赐与贝朋的较多。

(六)史趞曹

> 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龏王才周新宫，王射于射庐，史趞曹易弓矢、虎庐、冑、干、殳，趞曹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乍宝鼎，用乡倗督 趞曹鼎，其二，大系考释·六九页

此器铭文，史趞曹相当于司射之任务。射庐与静𣪘大系考释·五五页　书道·六四　中的学宫、大池相同，大概是璧雝中设置的设施。在此进行的射仪中，史趞曹在侍奉。射箭、捕鱼可见于在麦尊大系考释·四

史颂𣪘

〇页、遹𣪕大系考释·五五页 书道·五九 等，作为辟雍之仪礼，我认为在共王时依然被视为重要的活动。关于射仪，《礼记·射义》说：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

这是后世儒家之说。射箭是祭祀之前作为祓禳[①]而进行的古代仪礼。祭祀之前所进行的射箭、捕鱼在上述的遹𣪕、静𣪕中有记载，遹、静都是殷人，我认为其仪礼是从殷之仪礼而产生的。史趞曹大概也是作为殷人的后裔，侍奉于仪礼。

(七)史颂

隹三年五月丁巳，王才宗周，令史颂省穌，瀍友里君百生，帅䚄盩于成周，休又成事，穌宾章·马四匹·吉金，用乍𩰫彝，颂其万年无疆，日遲天子覭令，子子孙孙，永宝用 史颂𣪕 大系考释·七一页 书道·六五

史颂其他还有颂鼎大系考释·七二页："令女官𤔲成周賮廿家，监𤔲新𢍜賮，用宫御。"

如上所述，因为蒙受册命，他在成周服事是确实的。贮大概是屯仓之类。

①祈神除灾之意。——译者注。

(八)史免

史免乍旅匡，从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史免簠大系考释·九〇页

免为嗣林免毁，也为嗣土免簠、嗣工免觯。

这大概都是同一人。据此，“史”已经不是一职世袭之官，史职的内容分化，以至其关联的职制多数派生出来。此器铭中，免随从王出征，与其祭祀仪礼有关。

(九)史懋

隹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莽京溼宫，寴令史懋路筭，咸，王乎伊白，易懋贝，懋拜䭫首，对王休，用乍父丁宝壶 史懋壶，大系考释·九一页

这里所说的路筭的筭，大概是《周礼·春官·大史职》中“凡射事饰中舍筭”的筭。王国维、内藤博士把史字从“中”解释为筹筭之器，但是我不能理解《攈古录金文》以来已经著录的此器铭被没他们引用的理由，如果“史”字与筹筭之器相关联的话，此路筭应该作为首先提及的问题。①但是，不是承认“史”字成立时首先作为放入筹筭

---

①因为路筭为何物还未弄清，是否把此确定为筹筭还是疑问。因为“史”是后世与史巫连称、掌管筮的，或者也许是筮之器具。西周初期的金文小盂鼎：“王□，□从。”郭沫若把此未解释之字释为筮。(见大系考释·第37页。)小盂鼎是西周初期之器，当时是否有易筮甚是疑问，所以作为王的赏赐之物是不合适的。

的容器有屮、持筹算之人称为“史”的学说。卜文中“史”字用法、之后由“史”字演化的史，即使、事的意义已经详说，至今没有把屮应解释为筹算之器的例子，所以其学说作为“史”字字源的说明难以采用。另外，“史”字的𠙵、屮不是“中”的音，大概是与中同样的才（在）、甾音。从𠙵的吏、史都是同系音来看，明确了以其字为“中”、视为筹算的学说难以成立。但是问题在于，至西周后期，表现了最初把史与筹算结合起来那样，命路算于史那样，成为《周礼》言大史“饰中舍算”的背景那样的事实。按照路算受到赏赐的史懋是像把其父称为父丁那样的殷人，多数遹、静等殷系之人从事于莽京的射箭仪礼的事实，这些应该特别引起注目。

西周后期官职世袭形式的金文盛行起来，出现作为册命者的史、内史、内史尹、作册、尹、尹氏、作命内史等诸官。作册、尹早见于卜辞、金文，其他都是在西周后期出现的官名。西周前期首先东南方的经营涉及成、康二代被强有力地展开，在中期的昭穆期涉及南方、北、西，好像进行相当广泛的经营。其结果，至后期西周的政治性统治涉及广泛的地域，因此以至其官制性秩序也相应协调。畿内的诸侯作为卿士居于王朝，地方的诸侯列族也都被构成在周的宗主权之下。就这样周的政治性统治建立在安定的官制性秩序之上所进行，于是根据世袭的谱代[①]关系的诸侯以王室为中心被形成，廷礼册命被定型化地进行。于是掌管廷礼册命的是上述的作册系的诸官，此作册系的诸官原本是从史系之职所产生的。史居于内廷，作为作册掌管其册命仪礼。

但是，这样册命关系的诸官不是到周朝才开始出现的。作册、

①谱系，指王朝一族。

尹之名已经在卜辞中可见，还在殷周金文的图像中，也有包含册、两册的多数图像、称为尹的铭识之类，这些早就作为与史相关的职掌而存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西周初、中期的金文中，可见册翻卣、作册睘卣、作册大方鼎、作册麦尊、作册吴方彝等之名，作册翻、作册大都有两册形图像。作册吴的父祖被称为青尹，可知作册是其家业。应该考虑这些都是殷人后裔的证据。[1]根据《尚书·周书》诸篇，当时的祝册是由史或者作册而进行的。“史乃祝册”金縢，“王命作册逸，祝册”洛诰，“作册逸，诰”洛诰，“大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顾命等都是其例。内史诸官是进入周朝后特别发展起来的，内祭的执行者“史”由祝册而成为册命之官，是极其自然的展开。

通过以上，试略述了关于册命形式以外的金文中所见的史某的官制性格，其职大致可划分为祭祀仪礼、军旅、使人三种。祭祀仪礼如本文一所述，“史”本来是主管者，卜辞中所见的“史”，原来是在祭祀中掌管祝告、载书的。军旅时史官随从的较多，也是因为史参与军礼的执行，其内容在本文二中已经看到。另外，史作为王使出使地方较多，从史、使、事的字形、字义的展开上来看能够容易理解，同时与作为古代王朝殷的政治统治的扩大相对应。史在军事、政治方面扩大其职掌。此问题在本文三中已有论述。由于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安定并持续，于是产生谱代性的关系，廷礼册命成为定型化，廷礼的司仪者就从史的系统中产生。此问题在本文四中已经略述。

春秋以后，所谓失去王官之制，政务繁多，总务的基层需要多

①关于作册与尹，还收入本论丛二集《作册考》中。

数文书。所以，培养多数识字者使他们担任记录，把他们都称为史。《周礼》中诸职之下设置各种史。例如《周礼·天官·宰夫》中关于掌管宫中实际业务者，有以下记载：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在一般的官职中"史"的分配只不过数名，叙述史官之正统的《春官·御史》记载有"其史百有二十人"，御史是侍史之意。"史"为文词书记之官。

"史"的起源在"饰中舍筭"中寻求学说的第一困难是，卜辞金文所见的"史"及史系统的文字都与伯仲的仲、中军的中完全不同。不从○而从𠙵之形，不具有"中"之声。史是山的音系之字，与"中"系之字完全没有关系。"史"是山系统之字，史、使、事在声义上也成为系列。

第二，盛筭的"中"、诉讼"中"的用法，卜辞、金文就不用说了，《诗经》、《尚书》也不见其例。作为盛筭之器的"中"，《周礼》、《仪礼》、《礼记》、《逸周书》中只见少数，诉讼的"中"在《周礼》只见一例。从上述来看，即使把问题限定于"中"字，把"中"字用于盛筭、诉讼也应理解为后世的用法。在射的祭祀中使用盛筭，是射完全仪礼化，在诸侯卿士的领域中设置乡射宾酬之礼之后才开始进行的，所谓虎中、鹿中等器在古器中不存在。不过耦射、竞射之礼早就开始进行："王大精农于諆田，饧，王射，有嗣眔师氏小子，卿射"令鼎。其他还有，静𣪘中关于大池的卿射，有鄂侯鼎："駿方鄂侯之名，卿王射"的例子，关于大池的卿射与令鼎的情况同样有场所性的修祓之意，鄂侯鼎的卿射是为明确宾主的诚心的仪礼性的射。

数筭不是竞争胜败性质的。所谓鹿中、兕中、皮树中、闾中、虎中之制[①],像王氏也已经解释的那样,与𠁩形完全不相似,王氏也只好把它作为周末的弥文制度。

在《仪礼·乡射礼》中记载,司射持中,箭每射中一次就加上一筭,《礼记·投壶》中司射的行为也与此相同。[②]以此来说,"中"是的中(射中)之意,表示射中数的容器,把其容器称为"中"。可以考虑"中"是从投壶使用的容器而产生,总之,𠁩是与𡕒字的形义没有任何关系的字。[③]

第三,王氏还论述,在"中"里盛的筭和简策的策,两者都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的长短四种,还论述筴和筭是通用的文字,盛筭的中和簿册的中同样。[④]但是筹筭的策其直径只有一分[⑤],几乎不能用为简策,只不过是数数儿。简策与此相反,其长简可以考虑写有墨书四十字[⑥],或者三十字[⑦],或者二十五字、二十二

①在《三礼图》(《四部丛刊·三编》本,卷八,第4页)中,举出其想象图。

②《礼记·投壶》:"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筭兴,请于宾曰,为人顺投,不释比投。"

③加藤博士认为"史"音是从"中"音的转音而来,还认为"中"与"终"同音、与"数"同义,见《汉字之起原》(八)第54页。但是从"中"是在计算射中射侯、壶的箭数之器的专名来看,我认为"中"音与的中(射中)或者"筹"音有关系。

④王国维:《简牍检署考》,《王忠慤公遗书》所收。

⑤《汉书·律历志上》:"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

⑥荀勗《穆天子传序》:"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得所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

⑦《仪礼·聘礼记》疏引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

字[1],我认为不论一行或者两行,与筹策的筭完全不同。简策从古在殷朝就有,由卜文中有册字或者作册之名可得知[2]。于是,“史”是捧持放入祝册的容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策的直径与筭的宽窄明显不同来看,问题在于把放入祝册的𠙵与盛筭之器的“中”视为同样即一元化,以至进行筹筭即虎中之类的乡射、投壶,大概是从遥远的周末时代开始的[3],我认为“中”是随着后世新仪礼而出现的。然而以追溯“中”比𠙵更早的解释来说明“史”字的起源,大概会前后颠倒。

第四,把“中”作为簿册之器的学说出自江永,《周礼》的“受中”、诉讼的“中”等的“中”之义,此“中”是诉讼的成,即判决之意,不是簿册或者簿册之器之名。《周礼·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的郑注:“中,谓罪正之所定。”《周礼·乡士》“士师受中”的郑注:“受中,谓受狱讼之成判决也。”“中”是判决、决定之意,是《尚书·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的“中”之意。中书是内中(后宫之

①《汉书·艺文志》《汉书·六艺略》《尚书》:“刘向以中古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七:“盖伏生写此二篇,酒诰率以若干字为一简,召诰率以若干字为一简,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

②冊字多见。作册之名见于乙·四六二九。

③根据《乡射礼》,合乐用周南三篇·召南三篇,奏驺虞(音乐之名——译者注)。合乐与乡饮酒礼·燕礼同样,在仪礼性质上,欠缺乡饮酒礼·燕礼的笙歌六篇、间歌一篇、歌二篇。《礼记·投壶》只奏狸首一篇,《大戴礼·投壶篇》举出《小雅》、《国风》等合并为二十六篇。像《国风》那样的民谣成为堂上之歌乐,是其民谣的社会性生命已经枯竭,产生古典化倾向时容易发生的,我认为这些仪礼的成立大概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初期。这种情况是在列国贵族社会的成立进入春秋时期、聘礼订盟等兴盛以后才开始的。

中——译者注)之书之义,《汉书·艺文志》称秘阁[1]的古文,与称中古文同样[2]。此“中”与“史”字没有任何相关,一看就明白。

第五,因为在古代社会武事优先于文事,出现捧持簿册的“史”以前,就存在筹算的“史”的主张,其意是,可以说在古代社会比起武事,神事更加优先。同样,采取“史”产生于武事学说之中,除了筹算以外,还有“史”作为畢(网)即鸟网的陈梦家之说[3],其说是从字的形、声、义及“史”字之后的发展、用法上来看,根本没有相合之处,在此不加以详细论述。筹算之说有胜于鸟网之说之处,但是说明“史”的武事起源,不在军之“大事”中寻求起源,而仅以筹算作为“史”之起源,是后世史系的诸官衰退,以把乡射、投壶的筹算作为职业成为卑官的“史”、来说明殷、周初通用职务“史”的起源,由此不能说明“史”系诸职的原委。

我认为内藤、王国维两位硕学各论述了“史”的起源,而且两者完全一致,“史”产生于持筹算之器的“中”,此学说几乎被世人认为是“史”字的初义。但是此学说最中心的乡射、投壶之礼,是《小雅》之诗兴起以来的衰周之礼,其礼中所用的乐律也传承至宋、晋之国[4],决不会是殷周以来的古礼。于是,在探讨卜辞、金文所见“史”的踪迹的过程中,我痛感对“史”的起源需要重新考虑。因此在此重新提出“史”的祭祀起源说,略述己见希望方家赐教。

---

①宫中的书库。——译者注。

②《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周易》:“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颜师古注:“中者天子之书也,书言中,以别于外耳。”即此“中”是府中、中外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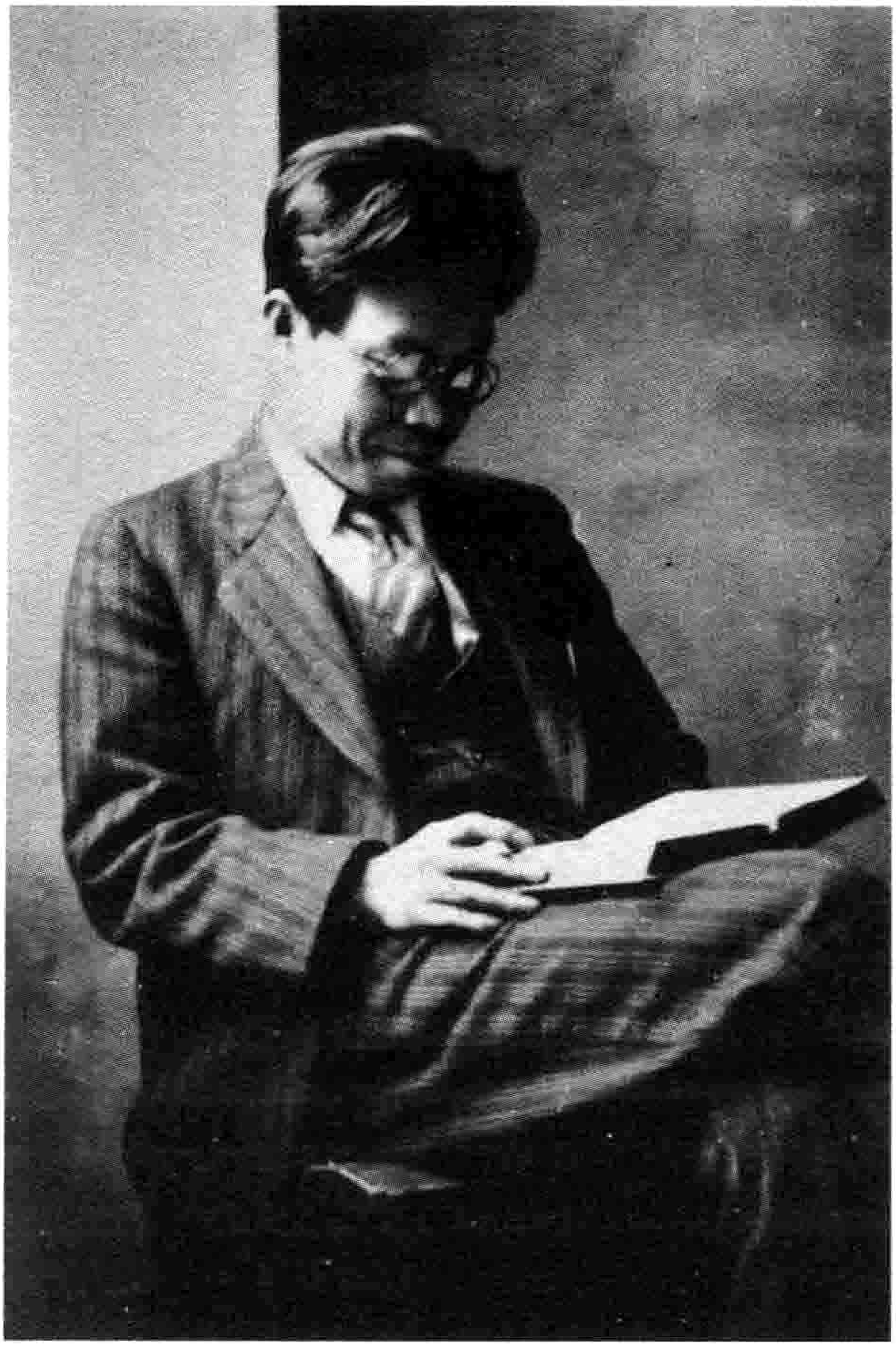
③陈梦家《史字新释》(《考古》第五期)略述其说:“史是田猎之具,象田网之形。丫与‘狩’的古文丫相近,[illegible]是其侧面形,[illegible]是其正面形。由狩猎而供其牲,不久为蒙受祭祀。”但是“史”与“单”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字,没有相关之处。

④王国维的《汉以后所传周乐考》(《观堂集林》卷二)有详细说明。

我的履历书*

白川静

* 本文来源于《白川静著作集·第 12 卷杂纂》，平凡社，2000 年 11 月。《日本经济新闻》于 1999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连载。



战后不久，在教师办公室。

东亚汉字文化精神

我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四月在福井市出生,不久就要迎来满九十岁的生日。一去九十年,一切如梦。但是这梦确实与现实相连。开始读各种书籍时,我被“东洋”之语所吸引,被冈仓天心[①]《东洋之思想》、前田利镰[②]《宗教的人间》、久松真一[③]《东洋的无》等所触发,但是我内心中的“东洋[④]”不是冈仓那样的包含印度思想,也不是前田、久松那样的倾注于禅。我想把最一般的生活中的“东洋”、“东洋”所拥有的美之意识、节度,结合生活加以考虑。这是生活中存在着真实的“东洋”的想法。

---

①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的思想家、文人、哲学家。启蒙了日本佛像等传统美术的出色之处,奠定了其保存的基础。——译者注。

②前田利镰(1898—1931):哲学家。著书有《临济·庄子》、《宗教的人间》等。——译者注。

③久松真一(1889—1980):哲学家、佛教学家。著书有《东洋的无》、《绝对主体道》等。——译者注。

④此处东洋以及后文东洋精神,指东亚汉字文化精神。

“东洋”的想法，例如在我国[1]的《万叶集》与中国古代歌谣《诗经》中可以看到，也就是对于自然的“东洋”性的看法、在自然中人们的生活态度。

“东洋”之语在中国没有。如果使用其语的话，那是蔑视日本人时才使用的语言。“东洋”之语是我国发明的。接触西洋科学技术的兰学[2]学者们，与西洋科学技术对立，以“东洋之精神”、“西洋之艺术”来表现。佐久间象山[3]、故乡的先觉者桥本左内[4]也使用此语。我认为“东洋”之语表现了他们对于东西两文化的深刻的洞察力。

冈仓、久松所说的“东洋”也许深奥，但是我认为从东洋之精神一般来看是特殊的、缺乏历史的实证性。应该进一步在历史性方面考虑其精神的成立及展开的迹象，这是我的想法。因此，我考虑中国古代文化与我国古代文化有共通的东亚的特殊性，想在此追求东洋的出发点。以此想法阅读了《诗经》与《万叶集》。这两者是拥有西洋古代中难以寻求的有民众性基础的生活者的诗篇、歌集。这样的文学西洋、印度也没有。

我以这样的心情开始读各种书籍时，大概是二十岁左右。但是，那时现实的东洋逐渐产生了龟裂。昭和五年(1930年)十一月，浜口雄幸首相被攻击，第二年军方屡次发动武装政变，9月发生满洲事变[5]，由此战祸渐渐蔓延。我想要追求的“东洋之精神”只不过是幻觉罢了。于是继续着没有尽头的毁坏之后，全国成为废墟，一

①指日本。——译者注。

②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译者注。

③佐久间象山(1811—1864)：兵学学者、思想家。精通西洋学。——译者注。

④桥本左内(1834—1859)：精通兰学、西洋医术。——译者注。

⑤即“九一八事变”。——译者注。

切都结束了。战争结束后东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国变成美国的基地,朝鲜半岛分成两部分,形成美国和苏联、中国对峙的构图。我国关于构图的改变没有任何发言权，以春秋时代的说法来说是附庸。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

但是,“东洋”曾经存在也是历史上严峻的事实。既然是历史上的事实,那必然有历史上恢复的机会吧。必要的是验证历史性的事实、进行证实。必须明确与欧洲、西亚不同的东亚文化的传统特征。

东亚最有特征的是共有汉字、汉字文化,同时各民族还发展了独自的文化的事实。应该说其中有共通的价值观。其价值观是产生“东洋”精神的母胎。

故乡福井

故乡是离开故乡的居住者对“出生地”的称呼。只有居住于异乡者才能使用此语。因此故乡之语常伴随着乡愁。

我出生于福井市的佐佳枝中町。沿着内城外的第四层的围墙的护城河畔的南北道路通称为大名町。过了护城河,有松平家的祭祀历代城主的佐佳枝迺社(神社)。面向大名桥道路的桥头有鸟居[①],其对面右侧的西服店就是我出生的家。

我家一半在道路上,另一半在护城河的河堤上,各面打有参差不齐的松木的桩子,在桩子上面用木板搭的地板,并施加板围墙,厨房等正是此部分,是仓库改造的正房附加店头那样的房子。从房子里望去,对面是护城河的石围墙;它们相连,大概有三四十间(一

①鸟居是神社入口的牌坊。——译者注。

间约 1.8 米)。石围墙上面有像堤那样的填土,其上面像小野竹乔[1]晚年所画的十几根老松树那样,瘦干疏枝轻飘飘的样子连成一排。下雪时其疏枝上覆盖着积雪,呈现出与古城相应的景观。

结城秀康[2]入城时一年的收入为 68 万石(俸禄额)。其后由于遭雷击烧毁,不被允许重建,城堡中央的高楼、角瞭望楼也没留下一个,只有城内护城河的莲池、里面相连的茂密的森林,保留下古城的迹象。如果提起我少年游玩的地方,只有过了桥的佐佳枝神社的广场。过年时的放爆竹节[3]、焚烧新春试笔的书法作品、再用其火烤年糕,是我的乐趣。

沿着神社境内的城内护城河有许多樱花, 开花时挂起纸罩蜡灯,有猜樱花树棵数的悬赏游戏等。节假日时摆着货摊、穿着浴衣游览。还出现了小房子,在里面有地狱极乐等西洋景。

夏天在护城河边游玩。因为不会游泳,坐在盆里,用木板来回划动,或者两手拿酱油桶拍脚,往返于对岸。到处游转,感觉到凉水的流动,到处有深掘到地下水的孔吧。

夏天是大陆性气候的炎热, 下午任何家、商店都开着门睡午觉。到了傍晚,在路上泼水、打开折凳、点上蚊香,玩儿日本象棋等。

冬天雪下得很厚,半夜雪静静地下个不停。我早上起来后,就马上打扫路上的积雪。因为太阳出来后,房子经不起雪的重量。下大雪时,胡同两面的房子都向下耙雪,胡同和房顶差不多高,被雪中的电线绊过脚。

我上的顺化小学离得比较近,回家后马上帮助家务。因为母亲

---

①小野竹乔(1889—1979):日本画家。——译者注。

②结城秀康(1574—1607):福井藩的初代藩主。——译者注。

③1 月 15 日焚烧过年时装饰的门松、稻草绳、护身符等。——译者注。

也在店里工作。我有过几次远出是在暑假的“早起会”时。离家两公里左右的足羽山山脚有藤岛神社，在那儿集合，在山顶的继体天皇①的石像下迎接日出，做体操后回家。宫司②是小学的老师，一边吹草笛，一边做向导。山脚下有桥本左内的旧宅、江户幕府末期的“和歌”诗人橘曙览③的古迹。桥本左内年少时领导藩论，藩主惊叹清贫的橘曙览的逸闻等盛传于世。

我家里几乎没买过书。长兄从朋友那里借来杂志，我读了立川文库的各种文章。我经常被母亲提醒，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眼睛会变坏。家里也没有电灯，店里开煤气灯。在煤气灯的白炽罩内点火、打扫煤油灯的灯罩，是我的工作。几乎没有朋友之间的来往，小学毕业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家。

佐佐木老师

我兄弟四人，哥哥叫一郎，弟弟叫治二，名字中都有数字，又是两个字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只是一个“静”字。母系都是一字名，据说这是由母亲的愿望而起的名字。母亲家读书人多，母亲也给我读过她儿时记住的《论语》中的两三句。但是小学毕业后不久就离开家的我，没有听过父母讲很多事，之后也没有一起生活过。

但是走上社会后，不知什么时候想起母亲。母亲为什么拘泥于我的名字呢？当时上幼儿园是特权，只有我才被送上幼儿园。小学一毕业，只有长兄才能上的寻常高等科，让我上了一个学期。于是，

①继体天皇(?—531)：日本第26代天皇。——译者注。

②神社的最高神官。——译者注。

③橘曙览(1812—1868)：江户时代的诗人。——译者注。

那年的年底为了工作,我投靠住在大阪的姐姐,离开了家乡。父亲送了我。父亲是少言寡语的人,在途中的滋贺县的米原市一带给我买了一瓶牛奶。

小学的回忆几乎没有:也没和谁玩儿过,一下课就回家。最初桂清老师是班主任。大正十年(1921年)高桥是清当首相时,老师改姓为高桥,于是笑着说:“我总是和总理大臣同姓。”后来渡边、池田男老师担任班主任。

跟同班同学几乎没有来往。之后,因为讲演访问福井时,拜访了本町的邮局局长岩永末雄,听到一些情况。听说教我们体操的浅川老师后来当了校长,以浅川老师为中心举行了同学会。浅川老师已经过了九十岁还很精神。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我离开故乡四年后的深秋,因病回家休养过。回大阪时,同学们聚在一起为我开了送别会。在佐佐木茂的家里、岩永末雄、吉田太郎等二十多人参加了聚会。当时已将近年末。

我想当时在家乡待了将近两个月。我家的前面有经营小旧货店的叫佐佐木的家,家里的主人是县厅的官员,是相当有知识的一心钻研学问的人,听说没有发迹。我回家时已经搬到郊外附近。我到大阪后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所以去拜访了。

在家徒四壁的简朴住宅里,书帙堆在一角。我借了朱子的《诗集传》,逗留期间准备抄写。《诗经》的日语译本已经读过了。朱子的文章完整,所以能够边抄写边理解。抄写到《小雅》的最后一篇,又回到了大阪。

佐佐木老师是博学多识之士。有一次,我问“犹鷦鹏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罗者犹视乎薮泽”的出处,老师答“那是司马相如的文章吧”,指出是《文选》的《难蜀父老文》的部分。佐佐木老师号文苑,离

开故乡的数年间，和老师的通信是我的一个精神支柱。那只是我和故乡相维系的羁绊。老师不用说作汉诗，还作万叶调的诗歌。老师年轻时所作的诗歌："花見つつ夕山もどり我妹子が待出の月に家着くらしも。"(夕阳下边赏花边下山，妹妹在等月亮出来，那时我能到家吧)像这样的诗歌做过几首。我为有古代武士风格的人写出这样出乎意料的诗歌而惊讶。但是比这更惊叹的是，橘曙览的万叶调的传统，以这样的形式在这里生存。

广濑德藏的事务所

来到大阪，当时由于第一次大战后的不景气，工作不容易找到。身体虚弱的我不能干体力劳动，想在事务性的地方工作，经人介绍，来到广濑德藏先生的事务所工作。我想在此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

广濑先生的事务所，有律师两人、做事务的两人，我还是少年，当看门的。广濑先生已经是府会议长、市参事会员，地方政界的重要人物。于是关于重要议案，关一市长常来直接说明，朝鲜总督下冈忠治那样的人物也来访过。

大概是如所预料的，我到事务所工作不久的第二年的大正十三年(1924年)新年刚过，帝国议会解散，广濑先生参加了竞选。我一天设定几处演说会场，依次把从东京派遣来的演讲者送到会场，安排广濑先生出场顺序、跟几位后援者一起工作。在家乡时除了往返于家和学校以外，几乎没有外出过的我，在众人中为联系而来回跑，真是不容易的工作。和清濑一郎先生在同一选举区，清濑先生身穿礼服、仪容端正的挨家访问的身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广濑先生在选举中首次当选，议会期间一直在东京的事务所。东京有其他院外团体的关照，我暂时成了闲散之身。我得到广濑先生的夫人的允许，借读了书库的书籍。

广濑先生是读书家，藏书丰富多彩。汉文典籍极多。以《国译汉文大成》80卷为首，汉诗集居多。当时的政治家有汉学修养的人居多，后来当了民政党总裁的若槻礼次郎先生经常寄来汉诗。广濑先生之后继续当选了议员、党总务、顾问，昭和八年(1933年)预算委员长在职时，突然去世。第二年出版了包括汉诗集的遗稿集，此书有克堂(若槻礼次郎)的序文、题诗。

我在昭和二年(1927年)离开广濑先生的身边，暂时回家乡养病。仅有三年半，其间在那里挑着读了《国译汉文大成》等其他书籍，还有夫人的《明星》、《昂》、《倦鸟》等。得到了很多阅读明治末期至大正期的文学、教养书籍的机会。有露伴、白村、新村出、南方熊楠等的书籍，读了田崎仁义先生的《王道天下之研究》、穗积陈重先生的《法律进化论》、《实名敬避俗之研究》等。

广濑先生寄给后援者的贺年片、盛夏问安的明信片是用自作汉诗的石版印刷制作的。广濑先生擅长书法，所写的汉诗读不懂的人不少，有很多想让解释汉诗的来访者。我就成为解释其汉诗的来访者的对象。明信片寄出之前，有必要预先查阅读法和解释。我想也需要有作诗的知识，我还练习了排列平仄。

广濑先生之处有各种捐赠的书籍。其中有《古事记标注》的作者敷田年治的晚年的歌集。虽是薄薄的小册子，比橘曙览的诗歌更加奔放自由。之后也想找来看，但是没有找到。

《诗经》和《万叶集》的不可思议的协奏，在我心中开始产生。背诵的《楚辞》中的《离骚》也充满古代文学的浪漫情调。但是身体需要休

养。离开广濑先生回家乡疗养时,从文苑先生那里借来了《诗集传》,试着抄写也是其余韵吧。我下定决心,当了中学老师后再阅读书籍。

京阪商业

我想过一生读书的生活。要想一生读书,当中学老师最适合。当国语汉文科的教师,教学也容易,也能继续读相关的书籍。但是取得资格,首先需要取得中学毕业的资格。从广濑先生那儿上的成器商业学校的夜校,由于长期缺席已经被开除校籍。复学手续也很困难,被编入同样夜间商业学校的京阪商业学校(现大阪府立守口高中)的第二本科,继续学业。

因为京阪商业学校在郊外,需要很多交通费,当时我的收入不能负担。于是给班主任子安雄二郎老师写了信,请求谅解不能经常到学校。老师担任汉文课,号牛山。《孟子》中有"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之句。牛山是光光的秃山。老师是完全的秃头。子安老师经常在教室吟诗、朗诵诗文。有时候也举起扇子、表演吟唱自作诗。

我缺席时,有时作汉诗寄去,子安老师修改后有寄回来,还附上自作诗。书信中还有"请与君为忘年之交"之语。子安老师在建校以来就任教,看来已经将近七十岁,我毕业时二十岁,差不多是孙子辈的年龄。毕业时我赠送两三位同学一首诗:"同劳薪水亦前缘,屈指从游已几年,分手春风勿相恨,囊中正数百诗篇。"还在毕业纪念册上作为将来的志愿写下了"东洋精神史",关于将来的生活态度写下了陶渊明的诗句:"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此诗句是表现着包含陶渊明思慕父亲世外超然的愉悦风雅的生涯而写下的。

当时的我以“何为东洋的生活方式”为主题。想接近佛教，订阅了高楠顺次郎主办的《现代佛教》，其中读了前田利镰的文章，读了他的书。读冈仓、久松的书籍也是那个时候。

我在读被认为最富东洋风韵的夏目漱石①的《草枕》时，想起曾经在广濑先生那里读的《Aylwin 物语》。②于是查阅夏目漱石初期的文章，得知夏目漱石介绍此物语的长篇文章。这本书当时在英国成为畅销书，包含东洋性神秘主义的作品。我认为《草枕》大概是其脱胎之物。这本书还被称为低首徘徊趣味的东洋的风雅之一。

冈仓的东洋偏向印度，前田、久松的东洋偏向禅，漱石的东洋偏向风雅。兰学者们尊重西洋现实利益的文明，于此对立的东洋精神是更加单纯、与自然和谐，泛亚洲性的。更限制范围地说，“东洋”是东亚性的、在共有汉字文化的文化圈中构成的，共同的精神性的风土。

具体说来，东洋的古代文学、古代思想中，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体验，陶渊明的“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两句诗，是“东洋”的一种极致的表现吧。我的观点是把焦点面向东亚的古代，即古典古代。我特别注目于《诗经》和《万叶集》。

立命馆入学

想取得中学教师的资格，大阪没有文科系的夜校。听说京都的立命馆有夜校的专科，决定去京都。也因广濑先生的关系，到了白

①夏目漱石(1867—1916)：小说家。——译者注。

②《Aylwin 物语》：英文原名《Aylwin》，日文翻译：户川秋骨。原书作者是：Theodore Watts Dunton。——译者注。

畠正雄先生的事务所工作。水上勉[①]先生的《雁之寺》的开头说："岸本南岳[②]在丸太町东洞院的一角的围着黑木板围墙的扁平的住宅的里面的房间死去，是在昭和八年(1933年)的秋天。"从东洞院向下走几家的西侧就是白畠先生的事务所，我在昭和八年(1933年)入学立命馆的夜校专科。当时的水上勉先生比我小两岁，他也曾有过校籍。到(立命馆的夜校专科)广小路的学校走着去要七八分钟，宽广的御苑的旁边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早就把《诗经》和《万叶集》作为第一阶段的读书目标，所以关于《万叶集》首先有必要学习我国短歌的历史概况。因此，购买了昭和六年(1931年)改造社出版的《短歌讲座》12卷，整个读了一遍。有关《万叶集》的书籍用心读了几册。关于《万叶集》的读法，"阿罗罗木"[③]和折口信夫先生有相当大的差距。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唾弃不止的大伴家持[④]的诗歌，指出其新鲜的抒情的小泉苳三先生[⑤]的家持论。

春の野に霞みたなびきうら悲しこの夕かげに鶯鳴くも(春天野原薄雾叆叇，无名惆怅。夕阳微明中莺鸣。)《万叶集》十九·四二九〇

除此之外，还有："わが宿のいささ群竹吹く風の音のかそけきこの夕べかも"(我家小竹林风吹，竹叶声响，夕阳中隐

①水上勉(1919—2004)：小说家。——译者注。
②岸本南岳(?—1933)：日本画画家。——译者注。
③日本代表性的"阿罗罗木会"的短歌的杂志。——译者注。
④大伴家持(718?—785)：《万叶集》的有代表性的"和歌"诗人之一。——译者注。
⑤小泉苳三(1894—1956)："和歌"诗人、教育家。——译者注。

隐约约。)

“うらうらに照れる春日に雲雀あがり心悲しもひとりし思へば”(晴朗明媚小阳春,云雀飞舞。独悲伤陷入沉思。)

这是小泉苳三先生论文中推荐的所谓“春怨三绝”,我认为这是第一次被推荐的。

昭和八年(1933),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学费后,我上了立命馆。立命馆还没有发给申请国语科教师资格证书的资格,以前在昭和初年(1926年)、昭和四年(1929年)失败两次,昭和九年(1934年)再次尝试,如果失败就决定停办国语科。

审查颁发申请国语科教师资格证书的条件是,那一年度的最高学年的全体学生接受文部省的直接考试,并且都取得合格分数。我已经失败过两次,所以委托文部省推荐适当的指导教授,被推荐了在长野女专过去一直取得成绩第一位的小泉苳三教授,在参加考试的前一年赴任了。

小泉教授,是《短歌讲座》中写《家持论》的小泉苳三先生。小泉先生自己是通过检定考试获得高中教员资格的自学力行者。其指导方法是,把以前检定考试题集发给参加考试的全体学生,达到合格分数为止必须一直进行钻研,非常严格。

小泉先生还是出色的“和歌”诗人,创办了以前的朝鲜的“ポトナム”(potonamu)[①]杂志,现在还在京都进行新的活动。关于小泉老师的这些情况,我入学以后马上就知道了。他邀请优秀的学生到杂志社参加活动,我也是其中一员。小泉先生是明治余韵的浪漫派诗

①短歌会的名称,白杨的意思。——译者注。

人。若山牧水[1]所言："そうですか歌"[2]那样的生活诗歌，标榜应该志向于崭新的抒情、现实性的新抒情主义。这与我以前读过的《家持论》的主张相同。

我在诗歌上很笨拙。我认为在极小的特定形式中概括内容要有特殊的才能。因此对吟诗不太热心，那时倒爱好汉文典籍。

模模糊糊地理解到，学习中国古典一定要熟知清朝的考据学。因此开始抄写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诗经》部分。不是简单地能够读懂，所以边抄写边想。以前也在日记的空白处抄写过汉诗汉文，这是我的学习方法、记忆方法。

教员资格证书考试

学校为了得到教员资格证书申请的资格，需要数名合格者。毕业生中至今的合格者只有仓桥勇藏先生一人。共有四人被指名参加考试，其中三人是毕业生，我当时还是二年级的学生。毕业生可以免除预备考试，但我要参加预备考试。

检定考试规定大概的出题范围。包括《万叶集》前十卷、《古今和歌集》全卷、《源氏物语》从桐壶到须磨、明石和宇治十帖、"镜物"[3]。《大镜》等的出题范围有关于文中会话的人物关系，所以有必要了解记述的内容。我当然没有那样的准备。

到考试只有半年的时间。对于住在雇主家工作的人来说，不会有那么多自由时间，承蒙雇主的好意，好容易才整个看了一遍。预备考

①若山牧水(1885—1928)："和歌"诗人。——译者注。

②"是这样吗歌"：比喻简明的和歌。

③镜物：指《大镜》、《今镜》、《水镜》、《增镜》等四种历史书籍。——译者注。

试在京都师范学校的教室进行。考生二十名左右，合格者只有二人。

到东京是四人聚齐一起去的。笔试通过后，进行口试。等合格与否的公布还有四五天。我和后来的文理科大学(现广岛大学)教授白木直也同住一个旅馆。和法华经信徒的白木直也一起住在了法华俱乐部，他一早出去念经。旅馆当天早上为我们带上烤鱼的盒饭送行。

笔试结束后，我的口试在最后一天。考官是久松潜一、次田润二人。这是一场简单而像指导式的口试。

被学校指名的四人全部合格了。这比得上东京都总合格人数，是破格的成绩。另外两人法桥理知、冈本彦一，都是小泉的门生。考试成绩也取得了以前男子学校没有先例的，给文部省的印象也极好。这样决定了立命馆文学科的存在，小泉先生已经制定由文学科晋级到文学学部(文学系)的方针。

夜校专科的学生大多数是师范学校出身的小学老师，想取得资格、转入中学的人居多，年龄也上下不齐。我们班也有超过六十的老人，像我这样的还算年轻。

三森定男是浜田青陵博士门下的高足，博学多才，已经是绳文土器研究方面为人所知的学者，说是为了谋生取得资格而来的。我有时候去他的下鸭[①]的家玩，房里狭窄，横放着堆积土器片的箱子，常常辩论家会集，像梁山泊那样热闹。辩论家有角田文卫、中村清兄、藤冈谦二郎那样的京都学派的人物。三森定男最终还是没有成为考古学者，而是赴北海道担任了经济学讲座的教授。

本校的加藤盛一教授调到广岛文理科大学，所以想学汉文、想

①下鸭是京都市左京区的地名。——译者注。

考立命馆文学系的学生，都考到了广岛文理科大学。白木直也作为助手赴任，之后当了系教授。我也去志愿升学者的学习会帮了忙。在白木直也之前也有让我去做广岛文理科大学助手之事，我不想离开京都。读各种书没有比京都再好的地方了。

附近有汇文堂，有如此之多汉文典籍的书店，除了东京以外很难找到吧。我去学校的途中，有时间的话就顺路到这儿，尽情地看书。价格昂贵不能买的书很多，有价钱合适的随时购买一两册。购买吴大澂的《字说》、《说文古籀补》等是在一年级的时候。这儿好像是我的研究室。店主有时倒茶接待我这样贫穷的客人。

中学教师

我进夜校专科以前，抄写了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中的《诗经》的各条，一点一点地读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因为我认为那是学习清代考据学的途径之一。

但是从吴大澂的《字说》来看，我认为《说文解字》难说一定是千古不灭之书，王念孙的"声同义近"的假借通用学说也不能说一定是万能的。于是在一年级的加藤盛一老师的课程考试时，我引用吴大澂的《字说》写过答案。

加藤老师问过我，以何途径得到这样的知识。加藤老师一到广岛赴任，就想叫我去大概有这个原因吧。收到加藤老师从广岛的几次来信。可是我想，在私立学校学习的人还是私立学校好。

当时我还没有作为学者生活的心态。我的精神状态是，可能的话，一边在中学工作，一边继续读喜欢的书。我班里入学时应该有将近一百三十名，毕业时只有三十二三名，都是独立生存，勉勉强

强地生活而坚持学业的人。

昭和十年(1935年),我三年级时的暑假,突然收到本校的常务理事仓桥勇藏寄来的中学教员就职的通知。当时我还是在学学生,又和白川先生的事务所签了约定,所以希望等到毕业再去工作,但是从九月的学期开始就有必要补充空额。

虽然我下半学期缺席,但是得到特殊照顾,按照专科毕业生对待。学校又跟雇主解释情况得到谅解。本来我就希望到私立中学教书。初次任职的工资是每月65日元,听说因为在学被减掉5日元。尽管如此,当时的一般职业是35日元,这是将近两倍的工资。我第一次穿西装、皮鞋。

一赴任,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担任的课程一周白天24节课、晚上6节课,教国语、汉文、商业作文等涉及七八个科目。晚上一周也要出去三天。但是教课内容不太难,所以总算能够度过。学生都天真烂漫,像兄弟一样。

老教员中有心术不正的,嘲笑新任教员。举行新任教员欢迎会兼联欢会,我被邀请在壁龛附近的上座。壁龛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作品技法高明,一看就有难读的字。老国语教师说:"如果能读这个书法的话,就呈上我的饭菜。"我问:"真的可以吗?"

那是初唐王勃《滕王阁序》的四六骈俪文的名作,我把全文背诵下来。那位老前辈再也没有嘲笑过我。

就任当时,中川小十郎总长兼校长,有时集合全校同学训话,我被命为速记。我并没有速记术的经验,因为习惯一些草书,几乎能够提交将近速记形式的笔记。我的旁边有一位同样用英文记笔记的人,我想是叫Doctor(博士)大竹的人,这个人不久就调到别处。我想,中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

川原寿市先生是我的畏友。他执笔《仪礼释考》16卷，刊行约一万页，怀才不遇而死去。还有研究《枕草子》而成名的田中重太郎。几年后分别，都是难以忘怀的人。

文学部创设

文学系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作为法文学系开设。昭和九年(1934年)一月为决定专科部的存废，接受了文部省的直接考查。在此之前小泉老师已经坚信专科部能够继续存在，并且为将来晋升法文学系做准备，发行了机关杂志《立命馆文学》。中川校长在卷首题了发刊之辞，汇集了十位专家的论文，达250页的大册子。专科部二年级的三森定男也执了笔。

晋升的时机不轻易来临，加上时局紧迫，由于军部的无方针造成战局扩大，没有收束的方法，万事的统一调整在进展。文学系的新设等也是出乎意料的。可是中川校长不是增设新系，而是由于法文学系的组织变更，实现了文学系的创立。

法文学系也设置汉文学科，但学生较少，我在中学就职也被指定为在校生。课也没怎么上。我上中田勇次郎老师的专题研究讨论课，读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观堂集林》是我曾经抄写在笔记本上的书籍。我的最终学历是立命馆大学法文学系汉文学科毕业。

专科部文学系的继续存在、晋升为文学系几乎都借助于小泉老师的努力。但是其实现不用说是需要中川校长强有力的后盾。我想中川校长对文学系晋升极其热心是因为中川校长本身有文人气质、深爱文学吧。

中川校长曾经给文学系的论文集撰过一篇稿子。文章回顾了

早年和天田愚庵[1]比邻而居时，住在伏见桃山时，和愚庵的交流，此文是发挥了文人蓑笠亭主人[2]面目那样的雅健之文。中川校长认为天田的真正价值是具有滴水禅师[3]直接传授的禅的风格，天田愚庵被视为“一代之禅杰”，其风趣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篇稿子是长达 80 页的大作。

我在中学就职的第二年，大概是中川校长开始执笔愚庵之传时，我第一次被招待拜访中川校长的白云庄。小泉老师编辑的《美妙选集》上下卷这一近 1300 页的巨著，正好是由大学出版部付梓之时。小泉老师把此书赠送于我，在上卷扉页的背面题上“白川静先生惠存　昭和十一年(1936 年)十月九日”，并有签名和印章。应该说是勇健的笔迹。小泉老师那时把“言文一致”作为自己的首倡，其实践寄托于美妙斋[4]。他在高中时和夏目漱石同住一个宿舍，兴致勃勃地讲起一些逸闻。

小泉老师晚年，经常在花瓶上写诗挥毫，好像喜欢寒山诗。寒山诗中他特别喜好的是：

> 一为书剑客，二遇圣明君。
> 东守文不赏，西征武不勋。
> 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
> 今日既老矣，余生不足云。

---

①天田愚庵(1854—1904)：禅僧。——译者注。

②蓑笠亭主人：是指中川小十郎校长(1866—1944)。——译者注。

③由理滴水(1822—1899)：禅僧。——译者注。

④美妙斋：小泉苳三先生自己起的雅号。——译者注。

那几个花瓶现在也应该作为学校之宝保存着。

小泉老师早年进了文部省，尽力于京都大学的创设，后来当了萨哈林岛的司政，又任台湾银行的行长。之后为贵族院议员、元老西园寺公[1]的秘书。中川老师的父亲就与西园寺家有关系。

设立文学系大概是小泉老师的梦想吧。但是专科部的一个学科有独立的机关杂志，法经二系只共有一个机关杂志，对此而感到不愉快的人也有。世上不知宏大志向的人居多。

战 败

愚蠢的战争。的确是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愚蠢的战争。奇袭是成功的惯例。而之后不完全攻陷对方则不能说是战略意义上的成功。

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没有任何理解的军部没有任何理念而一时心血来潮展开的战争。对于继续追求“东洋”理念的我来说，那是不堪目睹的自我毁坏性的行为。可是所有批判军部者都受到迫害、被杀。如果教战争史，应该首先教我国军部独裁的历史。

开战时，我担任中学的教务。在中学，有校长、教务比谁都早到学校的惯例，听早上开战新闻的有中学的羽栗贤孝校长、商业学校的今小路觉瑞校长，还有教务的我和谷口正一两人。羽栗校长听了新闻立刻叫起：“可不得了了。”历史学家的羽栗校长大概直觉到这意味着什么。与西本愿寺有关系的今小路先生失望地惊呆了。对于

①西园寺公(1849—1940)：政治家。——译者注。

战果的公布自大东亚战争以来已经听得十分厌烦了。没有攻战本土的方法，怎能胜利呢。我在听下一个新闻，只是一味地等着巴拿马运河的爆破，但那落空了。事情已经在此阶段结束。

战争中，我和商业学校的学生赴舞鹤，和预科学生赴爱知县的丰川。战局持续一段时间，不久，海上运输断绝，舞鹤没有学生工作的地方。只在烈日下继续拔草，学生当然会怒气爆发。舞鹤的工厂把罢工认为是国贼的行为，夏天到舞鹤的学生，快到年底也没让回家。家长担心的呼声蜂拥而至，正是我出差的时候。我和总务科交涉，总务科也说没有火车。

舞鹤已经是下大雪的时候。我和同行的实松邦男等穿上长统靴，走到下一站的松尾站，请求从福知山管辖区域发车。总务科说如果有火车就让学生回家。学生平安回来了，我担心会伤害纯真少年的心灵。

丰川的事件更加严重。在丰川不是作业人员的我们被禁止进入操作现场。这对于服从文部省命令而行动的我们来说，是明确的违规行为。小泉教授等被迫去打扫宿舍的厕所。

我和预科的荐田久规教授在一起，悲剧在我们不当班的时候发生了。舰载飞机的Grumman[①]一来，警报的同时，工厂的高官们逃出场外。愤怒的学生们想堵塞道路，学生集中的地方被扫射，出现很多牺牲者。我以前教的学生也有一人牺牲，一人几天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听说家人先确认他是否有双脚。

舞鹤也有像地下要塞那样的司令室，每发警报高官就躲避。学生们成为沉入海内捕章鱼的陶罐。在日本关西地区敌机从纪伊水

①美国战斗机的名称。——译者注。

道至若狭湾，在那里盘旋后转向目的地。躲避是惯例之一，那是每天都继续着的习惯活动。

不会胜利的战争结束了。中川校长大概知道这场战争的趋势。战败还没有成为现实，昭和十九年(1944年)秋天的十月七日，中川校长突然逝去。我在舞鹤接到讣闻。战败已定时，毫无办法的虚脱感袭击着我。“东洋”的面貌消失了。

民主化

中川校长逝去，作为后任校友石原宏一郎先生被推荐为校长，随着战败，石原宏一郎先生被定为A级战犯，学校难以对应。接着由此关系到学校存废的问题。但是得到末川博先生的私下同意，好像事态得到收拾。末川先生曾经在京大事件[①]时，和佐佐木惣一博士带领的三十几名一起被立命馆招聘过。受到文部省强烈反对的同时，中川校长也勇断地决定了此事。由于末川先生有“京大事件”的经历，判断末川先生具有大胆的行动能力，因此得到了美国占领军的同意。

战争期间的立命馆被看作是极其右翼的。维新时年轻的西园寺公作为山阴镇抚使赴任时，马路村的中川小平太一族，组织过笛鼓队随从，中川校长作为老师具有把传统充分发挥在教育上的心境。

中川校长不是气量小的人，他还有排斥文部省的强压、迎接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团体的反官僚之处，还招聘反对东条英机[②]的

①1933年京都帝国大学发生的思想镇压事件。

②东条英机(1884—1948)：第40代内阁总理大臣。——译者注。

方针、罢免京都师团长的石原莞尔[1]将军，举办国防学讲座等，是有反抗精神的人。但是从社会上来说，大概被认为是顽固的老一代。中川校长是出色的文人，特别是推崇笃学之士，这一点不被世人所知。

作为战后的处理，在日本关西地区，首先推测神宫皇学馆会被关闭，其次作为候补的是立命馆吧。于是让末川先生作为先导脱离危机，是大学内部的一致愿望。

伴随着校内民主化的进展，其组织逐渐强化，常常排除战前派。不顾中川校长的恩德与否，战前派那些人被当作残党对待。在职人员的任免也随时由教授会的投票决定，也有由于投票表决而没想到马上就被开除的人。

有时也有系主任在任期间被开除的。也有对那样的局势产生恐惧，立刻靠近民主派的人。国立学校毕业的人较多，本校毕业的人如果不投身于民主派，就往往被看作无能。

在那种情况下，开始了教员资格审查。在文学系中川校长最信赖的小泉苳三先生可以说成了牺牲品。这是为了整体的保全而有必要牺牲的想法。大学的方针是不听从立命馆大学之外人员的意见，以校长任命委员的组织形式来决定大概的动向。可疑的人物也能隐藏在衣袖的下面。

小泉先生率领ポトナム(potonamu)社的会员，作为"和歌"诗人也是闻名之士。他曾经视察前线，抒发战争的悲惨情怀，出版过诗歌集《山西前线》。卷末的一首："東亜の民族ここに闘へり再びかかる戰無からしめ"(于此地东亚民族，不应该再进行战争)。对这

---

①石原莞尔(1889—1949)：陆军军人。——译者注。

首诗，委员会说是“所谓支那事变是由于日本统一东南亚、东亚，不再作战的圣战之意”，以此作为小泉老师不合格者的理由。

这是否定战争的诗歌，就是中学生也能够简单地理解吧。我不能宽恕这样加以歪曲的决定。我携带复审要求书，会见中央的资格审查委员长牧野英一博士，提交了文件。

牧野博士作为“心之花”的同仁、作为“和歌”诗人也是名声极高之士。牧野博士好像对这样的决定感到吃惊。我坚信复审能够有好的结果。但是几个月之后的最后决定，报纸上登载了小泉先生不合格。没有任何报道，也没有通知本人。这就是战后的民主主义。

初期的三篇

我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月，提前大学毕业，同时成为预科教授，第二年转为专科部教授，转年又为文学系副教授。我本来的志向是当中学教师，愉快地过随心所欲地读各种书籍的生活。如果在文学系工作，不会允许那样的任性。而且和我同龄的、国立学校毕业的，都已经当了教授。

林屋辰三郎、奈良本辰也两位老师虽稍微比我年轻一些，却已经是活跃的崭露头角的史学家。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周围的人有轻视的观念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固然在这之前也不是终日无所事事，准备了若干资料，因为是在战争期间，以防万一，我的部分资料和小泉先生的短歌史稿保存在地下。战后，由于民主化的进展，必然会对做学问的人提出学术要求，于是我匆忙发表了三篇文章。

作为第一篇论文《卜辞之本质》，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一月发表于《立命馆文学》。卜辞作为王者的记录，后来记录帝王每天的

“起居注”的史料，论文是对把此两者视为同一性质的京都大学平冈武夫先生论文的批判。

卜骨加火烧灼后占卜、字迹上涂朱砂、后来加上犬之牺牲等郑重埋在坑中。通过这些行为，卜辞具有的意义是由于占卜产生王者的神圣化，具有直接参与神圣支配的机能，这是我的观点。

第二篇论文也发表在《立命馆文学》杂志的三月刊。题目为《关于训诂的思维形式》，论述反训问题。反训如“亂(乱)，治也”，是说一字中同时具有正反的相反两个意思的文字使用方法。中国的训诂学自古被视为问题，关于此问题，京都大学的小岛祐马博士把此现象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维的结果，进行了论证。

但是我的观点是，例证中的多数反训例几乎都是假借通用之义，或者只不过是能动和被动的语法关系。视为反训的铁证“亂(乱)，治也”，𤔔是表示把线解开、散乱之意，“亂”以骨制的刀片来整理的字形，亂读为“みだれる”(不平静)是自古的误用。

辩证的思维可以说是西洋哲学的思辨法，这样的想法不可能存在于古代训诂之中。几乎是与观念的游戏相近的辩论。

第三篇论文《殷之社会》是对贝冢茂树先生“殷代牧畜社会说”的反论。殷代的祭祀作为牺牲的牛羊之类多数为供品，这样供给多数牺牲无非是牧畜社会，这是贝冢先生的论点。但是甲骨文中“受年”、“受黍年”那样，占卜收获的较多，也有“南土”、“东土”等直接的经营地，也有像“藉田”那样的祭祀用的仪礼性农耕，毫无疑义殷代社会是安定的农耕社会。

牧畜社会的蓄养数相差悬殊。贝冢先生之后也采取农业社会说，这没有引起论争。当时无名的我的执笔名，被怀疑是什么人的笔名。

当时的本校毕业生，除了本校的机关杂志以外没有其他发表的途径。机关杂志对于研究者是生命线，但发行费却极其有限。我们得到毕业生的协助，发行了月刊《说林》作为发表之地，同时向末川校长请求机关杂志的月刊。其活动三年后终于有了结果。

古代学

我在为《说林》苦战时，角田文卫先生提出了设立古代学协会的计划，和梅田良忠先生、三森定男等参加了计划。角田先生是具有超群的规划能力之士，京都大学在学时就出版了《国分寺之研究》上下两册的巨著。当时为大阪市立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室的助手直木孝次郎担任文书工作。后来，直木成为代表我国古代史研究的专家。

由大阪商工会议所赞助制作了abc三等级的捐献簿，角田先生和我到各处收集捐助，财团的设立也按照预定进行。作为名誉董事长聘请了三笠宫殿下，殿下作为东方古代学研究专家，已经负有盛名。跟我关系亲近的有研究古代印度优波泥沙陀哲学的佐保田鹤治先生，研究朝鲜考古学的有光教一先生等，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古代学协会。梅田先生担任东欧方面，三森担任绳文土器方面，我担任中国古代学方面。那时我和台湾的屈万里先生、中国的杨树达先生通信联系，有时交换一些论文，但得到系统的著作居多。

屈万里先生曾经和孔德成先生访问我国，我也一起陪同去过静嘉堂文库。杨树达先生当时已是老先生，曾经到日本留学过，我想也读过我的论文。他向清朝最后的硕学俞樾求学，被看作是考据学的最后的大家。其积微居系列的诸书籍，成书后惠赠于我。另外，

当时胡厚宣先生还接连不断地寄来了甲骨学的资料，是在国内难以到手的珍贵资料。之后，胡厚宣先生来访日本，这些全都是接受杨树达的指示，两位已经熟知了我写的论文。

我把这些资料的介绍、解说寄给《古代学》投稿。《古代学》的第一卷第一号介绍了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括》，第四卷第一号作为《关于中国古代文字学》，介绍了杨树达先生的四种最近的著作。那期间，还试写了其他诸家的书评，我自己也发表了《关于周初的殷人活动》、《殷之王族与政治形态》等论文。杂志《古代学》是四六倍开[①]，另附英文别册的正式的学术杂志，得到国内外的好评价。这是我甲骨学研究上策划的一个阶段。

《古代学》以附录的形式，发行了小册子《古代文化》，我发表了《文字和古代文化》，通过文字资料解说殷代文化，连载了十次，但因为繁忙中断了。突然接到对甲骨学做出贡献的董作宾先生的讣闻，我写了《怀念董作宾》一文登在这本小册子上。这篇文章被翻译成华语《怀念董作宾教授》，登载于《中国文字》十八辑。

创立者之一的三森定男之后去了北海道，担任经济学的教授，刚才已经提到过。另外梅田良忠先生作为关西学院大学教授赴任，后来赴波兰，在当地逝世。他以前翻译过平凡社的《世界名作全集》中的十九世纪末被认为是波兰最长的历史小说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是少数精通东欧语言的学者之一。他为人心地善良，在日本卧病期间编辑了诗集《小孩子们》。

梅田良忠先生的夫人久代女士后来和在波兰活跃的美术史家工藤幸雄先生结婚，写了几本出色的随笔集。梅田先生的遗子在当

①四六倍开：188mm×254mm。——译者注。

地成长，后来作为前波兰大总统瓦文萨的合作者，非常活跃。当时与《古代学》相关的诸位所描绘的梦想宏伟而充满快乐。

论丛

初期的三篇文章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六年，我发表的文章大约有三十篇。我的研究中心几乎形成，好像也得到国内外的评价。我被教授会推荐，1954年当了教授。和国立大学毕业的英才相比，我晚了十年左右。但是如果说我大学毕业比别人晚十年，这样也合乎道理，我只有比别人多工作十年。

不过，研究发表的途径相当困难。那是因为在甲骨学、金文学领域，一般的铅字中没有的字很多，组版极其困难。我国比中国、台湾早一步，在1951年组建甲骨学会，经过水泽利忠的努力，发行了机关杂志《甲骨学》。本来是誊写版(油印)印刷。大概再过十年左右，台湾发行了《中国文字》。这是在董作宾先生的主导下，以严一萍为中心的努力下完成的。这也是把手写的稿子印刷出来的，后来成为打字、难字手写的形式。大陆又晚了二十年，至1979年发行了《古文字研究》。这也是手写稿子的印刷，缩小的部分难读之处居多。这种刊物在我国是最先发行的。

当时，制作特殊的铅字，因为从铅字的字模造起，所以费用较高，制作字数多的话，这些就有可能超过排版费。发表论文除了誊写版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我已经抄写了大约两万片卜辞，大型的另外摹写，再作整理。我想运用这些资料，在甲骨金文学领域探讨与殷周史相关的各种问题。这里有东亚、东洋的原体验。

发表的方法决定采取誊写。蜡纸自己写，然后有油印费、装订费就可以了。至今的论文已经收进《甲骨学》，今后的论文打算收进这个《论丛》。就这样在 1955 年发表了《甲骨金文学论丛》初集的《释史》、《释文》。

《释史》是论及“史”字成立过程的论文，批判王国维、内藤湖南博士的学说，确立内祭说。《释文》排除“文”作为冠饰等学说，确立文身（刺青）学说。二集收入《作册考》、三集收入《释师》、四集收入《载书关系字说》。《载书关系字说》是对《说文解字》从根本上进行批判，打算建立新的文字学方法和体系的论文。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至今被视为文字学的圣典，清代的考证学也没有作为我的批判对象。这时我有了从新的文字学的角度的字源字典的构思，在这之前，就希望有彻底地对《说文解字》的整体加以分析的机会。

通过《古代学》，吸收了中国古代学，在努力介绍中国情况时，受到京都大学贝冢研究班的邀请，参加了金文研究。使用至今关于殷周史的若干金文，不久想改写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我，担任了这个研究班撰写平凡社的《书道（书法）全集》第一卷的殷周期金文的一部分执笔。

那时，有了与来日进行资料调查的香港饶宗颐见面的机会。饶宗颐后来当了香港大学的教授，被推荐为法国科学院会员的著名人物。之后我的学生徐礼平回到香港，有时告诉我他的消息。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蜡版”的时代。但是这个专业只有使用“蜡版”，才能够开始进行研究。《论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我的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划时代产物。

外出讲课

《甲骨金文学论丛》是在当了教授后的第二年,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想开始探索东洋的古代学应有的状态。那时有了到其他大学讲课的机会:一个是大阪大学的木村英一博士说,研究生院有一名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学生,希望我去讲课;另一个是名古屋大学的宇都宫清吉教授的邀请,是年度的集中讲课。

当时名古屋大学是利用名古屋城内的兵营遗址而建,实在是荒凉之处,没有天主阁。停办学校的神宫皇学馆的图书都转移到这所大学,我讲课用的甲骨金文集的资料有多少还是疑问。因此我想集中讲课时,把必要的书籍尽量装进旅行包里。携带这些书出门,就是两个人拿起来也觉得很重。

宿舍也是兵营遗迹,还铺着原来的地板。浴室里安装着大澡盆,这也是兵营时代的痕迹吧。夜里,没有天花板的梁上、地板上老鼠跑来跑去,不能安睡,而且是大老鼠,显得很恐怖。因此稍微远点儿的像大学会馆那样的市内的建筑,只能晚上去住。学生们对我讲的内容极感兴趣,大概是还有些新鲜的东西吧。虽是概论性的内容,学生们好像对古代文字学特别感兴趣。

大阪大学搬迁到丰中的新校舍以后,从京都来往的路程变远了。道路也没有完全修复,刮大风、下大雨时,过池边可吃力了。

学生只有杉本宪司一人。只有一个学生的课不容易上,很容易就闲聊了。听课只有一人时,容易形成和听课人的对话决定讲课内容的场面。

到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后,没有听课学生,于是在大学的系里讲课。系里的课是文学史。这不是必修的科目,也跟课程表有关系,听

课的人总是少数。文学史的课，著者的传记、作品等在黑板上难写的较多，写在黑板上效率极低，所以我预先制作讲义，提前发给同学。他们拿着 A5 开的 120~130 页左右的誊写版的讲义，我一边说明一边讲解。

利用我去大阪大学上课的机会，希望我每月讲一次课，内容是关于金文方面。这是白鹤美术馆的中村纯一郎主任提出的，倡导者是古拓本的收藏家且是手拓名手的冈村蓉二郎先生。书法、篆刻的爱好者十人，最初在大阪南森町的冈村先生家中会集，后来得到陈添福的各种帮助，最后一切都由木村元三帮忙。

这个会从去大阪讲课时开始，讲课七年结束后，出版了《金文通释》52 辑，全部讲解完为止，从昭和三十年(1955 年)至昭和五十五年(1980 年)，大约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在坚持。因为到大阪讲课是星期四[①]，由此而起名樸(朴)社，是以朴学(古典之学)而宣称的意思。

樸社的讲课，也就是《金文通释》全卷、《说文新义》15 卷，是我倾注全部精力写成的。

樸 社

樸社开始时，先进行中国古典的一般讲解。后来，我早就有意识地试论两周(西周、东周)金文体系，制作讲义并印刷，打算涉及两周整体内容。于是，几乎讲到西周中期金文时，社友白鹤美术馆的中村纯一郎先生提出把这个讲义作为《白鹤美术馆志》印刷的建

---

①星期四：日语叫木曜 mokuyo。——译者注。

议，预算也已经准备好。

如果印刷配上图片，铭文也可以按照拓片收录起来。解说的内容也能结合资料具体详细地说明。当然与最初的讲义不同，得重新起稿，根据《白鹤美术馆志》进行讲课。

关于《白鹤美术馆志》的编辑，登载青铜器的第一页，按照中村纯一郎先生的期望，以郭沫若的《大系》为基础，收入《大丰鲇》，下面按顺序解说青铜器的器群。

通过加上青铜器皿的照片、拓片，登载的器群也更清楚了。收进《金文通释》的《白鹤美术馆志》，昭和三十七年(1964 年)八月发行了第一辑，昭和五十七年(1982 年)二月发行了第五十四辑正文篇，比本卷稍晚，昭和五十九年(1984 年)三月，发行包括正文的一字索引及诸表的“索引篇”，至此发行结束。“索引篇”辛苦了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的高岛敏夫。这样金文集加上一字索引，此书在国内外是唯一的。

讲“金文学”课的同时，开始进行《说文解字》的讲课。关于《说文》，开始也是制作誊写版印刷的讲义，各卷将近 200 页。准备到第五卷时，社友小野楠雄先生提出作为保存版想印刷的建议，他负担其费用。不过，誊写印刷时，甲骨文、金文和篆体字，我都能自由地手写，但是铅版印刷，必须全都要造字。做字的字模制作费较高，每卷的做字字数要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因此每完成一卷稿子要查做字的字数，为限制在字数以内，有必要改变行文。这样的安排在《金文通释》上也是如此。

小野楠雄先生是滩[1]的造酒者，与白鹤[2]的嘉纳家关系密切，是

---

①是神户市的地名。——译者注。

②白鹤是日本酒的名牌。——译者注。

极其文雅之人。他深深地倾倒于楠公[①],在其祠堂前建立五典书院,准备大量书籍以供市民阅览,举办市民讲座开阔市民视野,再版珍本书等,大力努力于知识教化。他发行了我的《说文新义》16卷,与笃学之士共同分享。

不过小野楠雄先生已是高龄,要求在自己还健康时完成此书。于是我把《白鹤美术馆志》作为季刊一年发行四册,《说文新义》也作为季刊一年发行四册,《白鹤美术馆志》一辑 80 页,一年 320 页,《说文新义》一卷 200 页,一年 800 页,合起来一年 1200 页的发行,一年强行完成。最后,幸而几乎按照计划进行,能够围绕小野老先生举行了完成发行的祝贺会。前后经过二十年和爱好学问诸位能够完成这样的事业,或许是其他任何人也不能享受的。

师古斋冈村蓉二郎先生的收藏拓本,生前转让给大阪天王寺的市立美术馆,几百件的师古斋旧藏拓本被保存着。结社以来四十五年,社友的多半已归于鬼籍。现在生存者中,有制作和泉久保惣记念美术馆的镜影等的手拓名家木村元三、文子夫妇,作为篆刻名家表现独自雅境的宗田周卿,还有我国代表性的书法家、在中国也有广泛知名度的今井凌雪各位兄长。

《诗经》的研究

昭和三十三年(1958 年)二月,立命馆大学作为文学系的博士课程,设立了东洋文学思想专业。之后研究生院的科长桥本循先生为办手续前往东京,东京大学的和田清、仓石武四郎两位教授作为

①楠公:楠正茂(1294?—1336),后醍醐天皇(第 96 代)的忠臣。——译者注。

审查委员来到学校。审查顺利通过，博士课程终于开设，不久我也将担任博士课程的讲座。我借此机会总结了以前作为研究对象的《诗经》研究。

《诗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歌谣集，而且真实地表现民众生活、贵族社会的祭祀歌谣，以及政治性、社会性现实的感情，是罕见的古代文学。与此相匹敌的，只有时期相当晚的具有同样古代生活情趣的《万叶集》。东方国家、印度等也有相当古老的歌谣，都是宗教性的歌谣，不是直接表现当时人的感情的。而且《诗经》和《万叶集》同属于东亚古代。这两者作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最好的研究资料。

为了比较研究，首先要彻底地研究《诗经》和《万叶集》的作品。可是《诗经》是作为中国的古典，被经学性的传统所束缚，正像我国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登载的歌谣那样，被加上极其不自然的后来的解释。法国统治越南的时候，从事东洋学研究的研究者之一的 Granet，尝试了西南诸族民谣的比较研究，关于不同着眼点的比较研究多少也有一些收获。但是他的研究甚至没被中国研究《诗经》的学者所重视。另外，作为新的古代研究领域还有甲骨文、金文学方面，但是其研究成果也没有受到重视。在此领域中最重要的民俗学，除了闻一多的前驱业绩以外，也没有别的值得参考的。

我在注意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发表了几篇关于诗篇的研究，我的研究大体上打算归纳为五部分，即通论篇、民俗篇、解释篇、研究史篇、译注篇。因此伴随着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的开设，硕士课程安排民俗篇、解释篇，博士课程安排通论篇。因为早就多少有些准备，所以首先完成通论篇、解释篇两篇。通论篇以 A5 开排版、

670页,解释篇为450页。解释篇是论述理解《诗经》诗篇的方法。

民俗篇没能完成,它把如何理解《诗经》的民俗的构思方法作为一个问题,总结了360页的《兴之研究》,将来准备把各篇论文加在一起结成集子。研究史篇除了先秦以外未完成,译注篇至晚年总算即将发行,《诗经国风》、《诗经雅颂》(1、2)三册收入平凡社的"东洋文库"中。

通论篇、解释篇出版时,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博士通过桥本先生转达了是否申请旧制学位的建议。我希望把吉川幸次郎老师推荐的通论篇作为主论文,把解释篇作为参考论文。但是通论篇篇幅较长,那时刚写完的《兴之研究》篇幅长短合适,所以把这篇作为主论文,其他作为参考论文。审查由小川环树、重泽俊郎二人参加。这两位老师担任研究生课程,所以提交博士论文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我终于完成了《甲骨金文学论丛》的第十集,又开始了改写铅字印刷的《金文通释》的稿子。

重要文化遗产审查委员

已经是常常往返于东京的人越来越多的时代了,我只往返于家和研究室,几乎没有其他外出,也没去旅行。不过从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以来,作为文化厅的重要文化遗产审查的临时委员,有机会一年到东京一次。

当临时委员的第一年,我因为有紧急任务不能出席,感到十分抱歉。每年春意正浓时都会召开会议,那年春天由于下了大雪,当天参会的委员好像到了不能回家的程度。日后委员们说我有先见

之明，我被大家嘲笑了，不过，开会的当天京都没有下雪。

文化厅主任文化遗产调查官保坂三郎先生，读了《白鹤美术馆志》的《金文通释》等，因为当时国内美术馆等收藏的古铜器中重要的被指定为文化遗产，他希望我能担任中国古铜器的委员审查。委员长是末永雅雄博士，委员中还有研究朝鲜考古学的有光教一先生。保坂三郎先生是著名的和镜[①]、经冢[②]等的研究专家，中国古铜器的造诣也极深。

我主要研究青铜器的铭文，在文化遗产的审查中，关于制作、样式、保存状况等需要科学性的调查，所以应该特别慎重。有时根据透光检查等，对青铜器上难认看出的修补之处，有必要进行调查。我以前和京都大学研究班的成员一起对京阪神的各美术馆、东京的书道博物馆、根津美术馆等的收藏品进行过目验调查，对被视为国内的珍品，有大致的见识。花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作为文化遗产应该指定的几乎都指定了，我的任务结束了。

在任中印象最深的是，听到发现高松冢古坟消息时的情景。当时正在开会，因为突然来电话，中途退席的末永先生会议结束后，马上催促两三名委员到另外的房间，有些兴奋的样子，讲了关于壁画古坟发现的最新消息。

从末永先生来东京之前就开始了古坟的调查，因为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末永先生必须匆忙回去。平时温和寡言的老先生，那时像青年一样有些面红耳赤地讲了话。梦想已久的事成了现实，激情充满了末永先生的心胸。末永先生闲谈时，讲了各种辛苦和意想

①日本式的镜。

②把经典埋葬地下的坟墓。

不到的喜悦,那时他总是像青年一样笑容满面,显得格外突出。

开大会时,有其他部会的著名专家出席。有我参加文检考试时的审查委员久松潜一老师,还有故乡的前辈、著名美术史家源丰宗老师。我去东京还有另外一项活动,就是拜访住在杉并的小野教孝老师的家。小野教孝老师画的《源氏物语》图册,是由久松潜一博士解说的。小野先生号为隆亩,还是日本文学家,是小泉苳三老师的挚友,我申请作为新制大学设置文学系时,在物资极少的战后不久,长期逗留于东京,得到了小野老师的照顾。因此每次去东京,我首先拜访小野老师。他把我的所有著作都收在自己的书库,称为"白川文库",激励着我。他已患眼病,虽然看不清我的姿态,但高兴地谈了好久怀旧的话题。现在小野老师的儿子雅文还继续保存着我的"文库"。

普及性书籍

时间过得真快,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我也将近花甲之年了。到退休还有五年,《说文新义》第4卷总算刚刚发行,全部完成还需要将近四年时间。为了让文字学问世,我首先想到写普及性书籍。

我至今的工作无论是论文、还是《金文通释》、《说文新义》之类,都不是面向一般读者的。学术性的文章,由于资料的关系,不可能一开始就以一般读者为对象来叙述。

可是学问的成果本来应该还原给一般读者。采取一些方法,能够还原给一般读者才有研究的意义。于是,基础研究达到某种程度后,我想写普及性书籍。写普及性书籍就是退休以后也可以,暂时定在花甲年龄前后。我首先想到应该抓住汉字的整体观念,于是写

了由岩波书店出版的“新书”[1]《汉字》。

岩波书店的田村义也先生以前就跟我说过写汉字概论书籍的事。我想以甲骨文、金文等作为资料，把字形的意思简单而有体系地进行说明。但是那时作为“新书”的方针，对图版和页数都有限制，想维持低价格。因此《汉字》一书，解说文字时需要参考的资料看不到，成了让读者难懂之书。不过尽管如此，记述的内容好像一般读者能够理解，被列为当时的畅销书。

这本《汉字》好像一般读者也能理解，但是，有人对这本书写了书评，说《汉字》这本书完全不能理解。这人是东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此书评是发行者岩波书店委托的《文学》杂志的投稿。岩波书店为何拜托这样无名的撰稿人，真是轻妄之举。这位先生，大概连甲骨文、金文及我写的多数论文似乎也不知道。

对此书评，根据岩波书店的要求，我的回答之文投稿于《文学》。那篇文章收录在我的《文字逍遥》中。像“居移气”所言那样，写书评的这位教授因为自己的地位而再三变得愚蠢。我把甲骨文、金文的资料做了笔记或摹写，全部进行了整理。通过手写确认自己的记忆，在头脑中进行再组织、整理。

后来，我使用大量的甲骨文、金文资料加上详细的解说，想尝试文字创立时代的再现，在平凡社的“东洋文库”写了《汉字的世界》两册。加上副标题《中国文化之原点》，这不只是阐明其字源，而且是弄清其文化起源的状况，这是我的想法的基础。文字把文字以前的原体验汇集在其形象之中，决不仅是符号。

---

①新书是指小型丛书版的书(成书尺寸:173mm×105mm,或规格相近的)。——译者注。

之后，我还在中公新书[1]写了《汉字百话》一书。昭和初年(1926年)之时，朝日新闻[2]连载了得赏作品、描写五十年后社会的未来小说《绿之札》[3]，文章的会话全部是用假名写的。我受到了打击，产生"汉字是否会灭亡"的畏惧。

当时我重新开始考虑"东洋"问题。所以在《汉字百话》中论述的范围较广，包括当时流行的符号学问题，并作为历史性问题，在讲谈社的"学术文库"上重新写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民俗》，这些内容都是以文字为中心构成的。

孔子传

写孔子是我早先的心愿。战败之时，我把《论语》和其他圣书放在手边，偶尔读过。对于"东洋"来说，不能缺少孔子。儒教为何产生，孔子怎样培养儒教的弟子，儒教也不拘泥教条主义，为何没有灭亡，那倒不如说，是由于儒教的批判者而使儒教高涨起来的吧。这样的主题我从战败时就一直考虑。由于写《孔子传》，才能证实这样的道理。

我在校内作为战前派经常处于被疏远的境地。我总是处于逆风之中，好像一直在逆风中振翅而飞。京都成为新势力的中心地，不久就要产生革命政权，已出现了"相信未来，生存于未来"的暗示性标语。大学门口的大石头上现在也刻着这个标语。

---

①中央公论社的"新书"。——译者注。

②"朝日新闻"是报社的名称。——译者注。

③绿色卡片(Green card)。——译者注。

在未来的梦也渐渐醒来之时，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将近年末，为了夺取大学的学生报发行权，代代木派[①]用胶皮管洒水进攻编辑室，武斗的结果是70多人受伤，不久全国的大学都起了纠纷。大约半年后，在立命馆大学全共斗派[②]可以说以被镇压的形式结束了。几年前在法国发生的文部大臣[③]引咎辞职的校内纠纷，好像就那样也在我国再现了。那年八月高桥和巳[④]发表了《自我解体》，记述了关于我的传闻。

高桥和巳是以前我拜托吉川幸次郎博士，邀请到我们专业来的人。他在学术上有杰出的才能，但是不能抑制想写小说的冲动，撰稿《邪宗门》时辞职了。他明确说过不再进入大学，但是以后到东京进了明治大学，校园纠纷的时候回到京都大学。京都各大学的两派[⑤]学生，因为各个团体巡回，会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我的传闻吧。

当时的大学几乎是闭塞状态，可是我不能不去学校，一直坚持每天到学校去。因为我家破旧，不能放大量书籍，主要是在研究室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生活习惯。任何人没有破坏我生活习惯的权利。

我当时在《金文通释》的季刊撰稿，此刊一年发行四期；同时还在改稿《说文新义》，这也同样是季刊，准备发行，处于不允许放纵一天的处境。参加纠纷的学生有不逞之徒，也有儒侠、墨侠之徒。他们中有人知道我每天的习惯，没有人想进行妨碍。

①代代木派是学生运动团体的一派。——译者注。
②全共斗派是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团体的一派。——译者注。
③国家教育委员会部长。——译者注。
④高桥和巳(1931—1971)：小说家、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译者注。
⑤两派是全共斗派和全学连派。——译者注。

纠纷结束后的骚扰还留着余韵，第二年的暑假，校园内的立式招牌还在狭窄之处林立。当时中央公论社发行的《历史和人物》的主编粕谷一希先生到我的研究室来访。我被受托撰稿《孔子传》。研究室的楼好像没有人，炎热的夏天我就穿着短衬裤①。粕谷先生把我错认为勤务员，打听我的房间在哪儿。我就是房间的主人。连空调也没有的混凝土的房间里，短衬裤和湿毛巾是我的消夏法。

校园仍然甚为喧嚣，吵闹得厉害时，我就听磁带里梅若六郎的歌曲。优美的节奏，稀释了噪音，有助于我思索。来客多时，我就躲避在研究室前面备用的狭窄的书库里写稿。年末写完稿子，我去了台湾，元旦的早上乘上木排到孔子庙参拜。

台湾之行

除了一年一次的东京之行以外，我没有出去旅行过。樸社的陈添福先生突然提出去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建议，樸社的几名社友决定出门。在昭和四十七年(1972 年)的年末，因新年比较清静，我就决定出发。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日本旧陆军基地所在地的台北机场在山脚下，下降时飞机摇晃得厉害。日程短暂，早上很早出发，过了中午就到了。

“行政院”的甘容武先生来迎接我们。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部的苏笃仁、器物处的张光远两位来迎接。我的《金文通释》已经写到列国期，我把带的几册关于故宫收藏的毛公鼎铭文的考释赠送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正要参观馆内时，被蒋复

①比裤衩稍长的日本式的裤子。——译者注。

璁院长邀请到院长室，说因为已经得到大臣的许可，希望看的器物全部放在别的房间可以参观。即使是博物院的研究员也不能自由地观看，他们商量后按顺序搬出。

以毛公鼎、散氏盘等大件器物为首，颂壶、作册大方鼎二器、宗周钟等依次被观看。器物室长也来寒暄，大家一起照了纪念合影。晚上在饭馆用餐，还有美国、德国曲艺师的表演，非常热闹。

第二天是元旦，九点到了故宫，又在别的房间观看了颂壶、陈侯午敦等。关于附耳形式器物的铸造法、陈侯午敦的铸铭文部分的铜色与整体颜色的不同等，我和张光远先生交换了意见。地下的操作室在尝试各种礼器的复原。晚餐由博物院的张、苏两位加上袁德星、高仁俊共四位，代表博物院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宴会。

因为新年街上也很清静，早上我参拜了孔子庙，游览了阳明山公园。山极高，下过一阵寒雨。这里原来是三井[①]的别墅，有很多日本的梅树、樱花树等。又回到故宫观看陈列品，转了书法的展室。有怀素的《自叙帖》、陆柬的《文赋》等，著名作品很多。

因为日程较短，也没有联系，所以没有和屈万里先生见面的时间。屈万里先生从那时起的七年后去世了。在九年后我参加了纪念"民国七十年""中央研究院"的国际汉学会议，那是在我写纪念屈万里的论文《再论蔑历》(投稿于《集刊》)之后的事。

从那以后张、袁、苏三位先后有机会来日本，重温了旧情。张先生在研究金文方面就不用说了，古典学问极深，关于石鼓文也有长篇的考证。他还擅长水墨画，会画夫人肖像。袁先生钻研文化史，出版了大型文化图录。苏先生精通日语，说得相当准确、漂亮。

①三井是日本的财阀之一。——译者注。

国际汉学会议于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在台北召开,小川环树博士也来参加了。我受到周法高先生的邀请在语言文字组发表了论文。当时参加者包括外国学者共273人,发表论文218篇,共收入了9册,成为大规模的文集。我以《古代文字学之方法》为题目,对《说文解字》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根据甲骨金文资料的新文字学方法。年轻的学者对此文表示理解的居多。

周法高先生精通文字、语法,编辑了《金文诂林补》,在书中收录了我的《说文新义》和《金文通释》中的一些字说,译成汉语。我的字说在8册的巨著中几乎占了一半。我的论文、书也有不少翻译成汉语发行,我想我的字说相当程度浸透于当地了吧。

字典三部书

我立志打算从六十岁开始执笔普及性书籍,写了岩波书店出版的《汉字》,并继续写了以《诗经》和《万叶集》的比较文学性研究为要点的中公新书的《诗经》。第二年由平凡社发行了东洋文库的《金文的世界》,试着大致描写了殷周社会史。《金文通释》和《说文新义》都还在继续发行当中。六十二岁时,由平凡社发行了东洋文库的《甲骨文的世界》,是照射古代殷王朝内部的尝试。那年秋天出版了上述的《孔子传》,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想汤岛的圣堂供奉的圣像①,与我的文章不相适合吧。

两三年之间,我完成了《说文新义》15卷和别卷,《金文通释》也进入"通论篇",继续试着写最后的收尾。作为普及性书籍,受托于

①圣像是指孔子像。——译者注。

中央公论社写了《中国神话》、《中国古代文学》,描写了中国古代精神历史的脊梁。《汉字之世界》被收入了平凡社的“东洋文库”,试分析中国的精神历史的出发点的文字表象世界。之后又为了从宽阔的视野考虑汉字问题包括记号学的意义,写了中公新书的《汉字百话》。原来打算花甲以后写普及性的书籍,这样提前大体上完成了。

对于早就热心到我研究室来访的小林博先生,再说上一句。他专修化学,是火药制造公司的董事。他对文字学很感兴趣,从关东的工厂回大阪的途中,顺路到京都我的研究室来,把我讲的《说文解字叙》的笔录,照原样油印出版过。他摘录了《说文新义》的字说部分,在木耳社出版了《古代汉字汇编》,并进行分类出版了《汉字类编》。两册书都是我起的书名,并加上了序文。之后他在英文译本的《新说文解字》加上副题“白川汉字学的字形解释字典”,制作了长达 15 卷的复印本,赠送给国会图书馆为首的英国、美国等代表性机关,打算补充修改后公开发行,但是没有完成志愿就去世了,享年九十五岁。

我打算退休后写三部字典。六十五岁我大学退休,之后的五年作为特任教授留在大学,再之后的三年辅导研究生,在七十三岁时才名副其实地自由了。我组织我专业的毕业生结成中国艺文研究会,决定发行机关杂志《学林》,以后的几年参加了其研究会。那时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三部字典。

第一部是作为字源字典的《字统》,第二部是验证文字训读在日语中固定下来的读法、兼古语辞典形式的《字训》,第三部是在前两册成果的基础上作为普及性书籍的《字通》。《字统》、《字训》各用两年,《字通》用六年,合起来计划用十年的时间。

《字统》、《字训》大概按照预定进行。关于字源的研究,我在《说

文新义》中已经完成，所以只要写内容的概要就够了。关于《字训》也事先汇集了国语的语源学说，准备了与汉字字源的对比及分类关系的笔记。可是在《字训》的校稿中，因为早就介意的白内障恶化，用放大镜校正都感到困难，住了将近一个月的医院，做了两眼的手术。视力恢复了，但是时常伴有疲劳感。尽管有些担心，《字训》的发行也完成了。

《字统》获得每日新闻社的出版文化特别奖，这是我的第一次受奖。推荐者是奈良辰也先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他写了《字统》的书评。

菊池宽奖

《字训》发行后的平成三年(1991 年)，获得菊池宽[①]奖。菊池宽奖至今是授予文学、艺术有关人士的奖，这次受奖是我意想不到的。感到不可思议的人也不少，其中我的老友冈本彦一寄来了“和歌”一首：

> 菊池宽与白川静之相配，想不出有何相通之处。

从文艺春秋社接到内定时，我一瞬间感到不知所措，不由得跟旁边的妻子打招呼说：“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办？”我作了十几首诗歌形式的文章，回答了冈本的疑问。

①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创设文艺春秋社。——译者注。

得到菊池宽奖内定电话，向妻子征求意见："如果是你的话，怎么办？"

"有一个奖也好啊，"妻子说。于是我也有了这样的想法。

接受勋章的有老演员笠智众①、象棋名将大山②，我也与他们同伙吧。

菊池宽是令人怀念之名，我年轻时喜爱其短篇。

菊池宽的文章好，如同日常穿的衣服没有装饰而有力。

许慎以后有解释汉字者，传于后世。

关于授奖理由，委员长阿川弘之③先生在授奖仪式上作了说明。那是《字统》的序文中我强调的追求文字使用的自由化的文章。

"汉字产生以来，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无原则地、彻底地全面改变过。"

这是我在《字统》开始写的文章。我认为我国的文章从大正至昭和初期最初作为国民性的文章自我形成的。我认为阻挡、歪曲其趋势的是军部的干涉。涉及生活所有方面，军部强行完全没有节度的抑制。文章失去典雅，是没有训读地枯竭地排列着汉字。于是，战后结果产生汉字废除论、国语性恶说等抬头，也有美国占领政策的要求，执行了现在的国语政策。

汉字被限制为1950字左右，将近一半没有训读。"おもう"只有"思"一个字，即使有"思想、念愿、追忆、怀古"等词语，但是"想、念、忆、怀"没有"おもう"的训读。这些词语如何说明、教给学生呢？

---

①笠智众(1904—1993)：著名电影演员。——译者注。

②大山康晴(1923—1992)：日本象棋名手。——译者注。

③阿川弘之(1920—　)：小说家、评论家。——译者注。

不教各个字的训读，如何来理解呢？不消化只是背诵就可以吗？无机性的记忆能形成知识吗？

只使用1950个常用汉字就感到满足，除此之外都认为是多余的教育，这样的想法使儿童规格化，而且学校的老师只教汉字的一字一画的写法，不教字形的说明。

《字统》和之后的《字训》，是作为对这样的国语政策进行根本性批判的尝试，我认为即使这样的政策的结果会产生对国语轻视的风潮，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菊池宽奖受奖时，我的三部书的最后一部《字通》正在执笔。《字通》计划用六年完成，因为不断探索，比预定时间推迟了。我举出《致恩仇的彼岸》[①]的例子，洞门还没有打开，应该匆忙回京都凿洞，就这样告辞了，当天晚上就回家了。

汉文典籍

我考虑的"东洋"精神的世界，不能离开中国的古典书籍。不用说那是"东洋"精神荟萃的地方。"东洋"的理念是从古典教养中产生的。战前的政治家有教养的人居多，也有擅长汉诗的。他们在养成人格的基础上就有了汉文典籍的修养。汉文典籍是成人的修养书籍，大体上是一种理想主义。战后的教育把汉文作为旧弊而轻视，也就同时失去了作为成人的重要课程。

因为战后的教员审查，小泉苳三老师被视为不合格者。小泉老师门下的诸位弟子创立了白杨社，以国语科的图书出版为首。我根

①菊池宽的小说篇名。——译者注。

据全部课程的教学计划，编辑了《高等汉文》三册，被认定为教科书。因为考虑到作为新的修养设立了汉文教育。但是像这样新内容的教科书，由于大出版社马上就模仿我编辑的教科书，因此长久维持出版现状就产生困难。

小泉先生搜集的白杨庄文库，作为维新以后集短歌史资料的大成，是当时全国最丰富的，值得夸耀。小泉老师把它捐献给了立命馆大学，然后就这样离开了大学。解除清洗后，他提交了早就完成的论文《明治大正短歌史研究》，取得了学位，作为关西学院大学的教授回到了学界，但几年后就突然去世。我的新的汉文教育方法也消失了。

汉文教育作为学校的课程消失了，但是中国的古典书籍是"东洋"值得夸耀的遗产，这一点没有改变。由于现在的国际政治性状况，现在"东洋"被故意分割。本来应该是近缘，由于强国的世界战略，可以说勉强地被分割。东洋人作为东洋人的自觉性，就没有恢复其近缘的道路吗？连多次夹杂战火的欧洲诸国现在也以一个联邦国家为目标。"东洋"为何被分裂呢？此问题的修复应该是急待解决的课题。

接近中国古典的方法有各种各样，最一般的是辞典。但是以前的辞典，对于文字的理解也不充分，只是汇集了字典式的训读和字义，只是举出作为用法的例句，没有统一贯穿的东西，没有为之感动的东西，没有引起知识性探索的要求。没有对文字的充分理解，就看不到古典文学中清新的惊奇的世界，就没有促使在古典文学中短暂的留连、想游玩的智慧性的冲动。

文字起源性的意义是怎样的呢？汉字在历史上是怎样展开的呢？我国是怎样理解的呢？与其他字义有怎样的近缘关系呢？根据其历史性及体系性的知识，字典成为一个世界，学习者在其稳定的

秩序中能够进行丰富的想象。

为了编写这样的字典，在准备阶段得到了多方的协助，执笔阶段由我一个人写。关于引用文章的取舍、古典文例的选择，我自己进行调查、抄录，这是为消除以前汉文教育的习气。引用文章追求表现的完整性，不避开长文章。我训读全文，有时加上补充解释，让读者读后能够理解。加上多数词语下面的连语，丰富了语汇。

这本《字通》超出了《字统》出版时引起的反响，我的想法几乎得到了理解。由于这三部字典的出版，第二年我被授予朝日奖。在那之前被授予了京都府文化特别奖。我因为寿命长，得到的幸运也多。

对谈和讲演

我不太擅长说话，尽量躲避，所以讲话的机会不多。最早的机会也是在花甲之后。由岩波书店出版了新书《汉字》不久，在中央公论社纪念出版《书法艺术》之际，我被邀请与中川一政[①]先生关于“书法和文字”进行会谈。一政画伯以独特的画风为人所知，我期待着听他的书法理论。一政画伯当时七十五岁，由于身体欠佳，突然换为白井晟一先生。作为有特色的建筑评论家的白井先生还嗜好禅僧墨迹的书法。他具有孤高的风度。我们进行了讲述各自志向的会谈。会谈的内容收录在昭和四十六年(1971 年)一月的《中央公论》。

近几年，与谷川健一[②]先生进行了“关于古代人的心象风景”、与江藤淳[③]先生进行了“关于日本人与汉字世界”的会谈。这些会谈

①中川一政(1893—1991)：油画家。——译者注。

②谷川健一(1921—　)：民俗学家。——译者注。

③江藤淳(1932—1999)：文艺评论家。——译者注。

都是以对方向我提出问题、我回答的形式进行的，即是讲话的形式。谷川先生是和女诗人山中惠子、水原紫苑一起来的，会谈结束后四人欢快地吟唱了“和歌”。谷川先生是京都大学谷川道雄教授的长兄。我到名古屋大学讲课时，道雄教授在名古屋大学曾给我以照顾，这次见面他因奇缘而感到吃惊。

因为我懒得出门，江藤先生在百忙中来到京都。那是第一次见面。这位笔锋极其尖锐的评论家，这次以极其温和的态度而使我感到吃惊。这两次会谈，前者收录在《自然与文化》，后者收录在平凡社发行的《电脑文化和汉字的行踪》。江藤先生在爱妻去世后很快也去世了，那是我与江藤先生见面后一年半的事情。

我也不常外出讲演。《金文通释》作为《白鹤美术馆志》发行，因为我是其财团的评议员，关于陈列品的相关内容先后做了十次讲演，隔了好久，在去年秋天又讲演了一次。老年人相当多，从远处看也有没能进入会场的人。

我几乎没有到过外地。在编辑汉文教科书时，为宣传教科书在北陆召开了说明会，当时是在福井做了演讲。在城里的公共礼堂讲演后坐车通过大名町，只见护城河都被埋上了，昔日的迹象已经消失。

北陆仍然使人怀旧。富山县的书法家常川汀华先生的女儿在我的专业学习。常川先生说有书法家的集会，我什么也不知道就出门了，那是金泽市的表立云先生的新建书堂的祝贺兼玄土社的总会，玄土社的重要人物都来参加了。玄土社推进前卫书法，又以书法研究为人所知。第二天，表先生还带我参观了金泽市的史迹、文学遗迹等。

三年后的昭和五十五年(1980 年)9 月，我赴富山县的冰见市讲演时，乡土史学家北元融教先生和我教中学时的学生菱澄雄，为

我向导了这个与大伴家持[1]有因缘的地方，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对于正准备写《后期万叶论》稿子的我来说，这儿是务必详查之处。

讲演与书法相关的团体较多，在“全三河书道二十五年展”时，因几年前就受到堀尾胜彦先生的委托，平成九年(1997 年)十月我前往讲演。由于听众较多而突然变更会场，引起一时混乱。讲演后堀尾胜彦先生带我到了路程较远的天龙峡的汤谷温泉，给权田穗园先生等几人添了麻烦。宾馆后面的一块岩石上的流水极其清澈，特别是拂晓时老鹰在饵食上狂舞的景象是最精彩之处。这使我想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的幽趣。

第二年春天的四月，受到仙台市书法团体的邀请，我住在松岛的南天棒，由中冢仁先生做向导游玩了青叶城，离开那儿去了中尊寺。对于我来说，只有讲演时才是旅游。

文化功劳者

作为文化部审查重点文物的临时专业委员，从昭和四十二年(1967 年)开始的十年间，有一年一次到东京的机会。到东京的那天我就拜访住在杉并的小野教孝先生，会议结束后马上就回京都。这成为惯例，只有一次由亲戚做向导顺路到了热海温泉，但没有到镰仓[2]的机会。

临时委员的任期结束时，受日本经络学会委托在大会上做讲演。在前一年，以冈部素道会长为首的几名干部到我的研究室来笔

①大伴家持(718—785)：奈良时代的贵族、“和歌”诗人。——译者注。

②镰仓时代(1185?—1333)的首都。——译者注。

录谈话，准备发表。但是，因为召开大会时会集全国的学者，所以大家想让我讲演。我想当天除了会员以外，研究东洋学的有关人士也相当多。当天的快速记录以“古代文字与生命之思想”为题，刊登在学会的机关杂志《日本经络学会志》3卷5号上。

近几年到东京的机会增多了。《字统》的出版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特别奖，《字训》出版时获得了菊池宽奖。经过近十年的时间出版了《字通》，完成了三部著作，获得了朝日奖。每次受奖都是到东京，都是当天回京都。授奖仪式后，与参加仪式的老友见面也是一个乐趣。

得到菊池宽奖时，文艺春秋的汽车为同行的妻子和女儿做了半日的导游。我没能自由行动，也没在东京彷徨。新宿的新市中心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战后排列着的不正经的店，以及战后成为废墟的景象。

去年读卖书法会[1]举办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委托我做基调讲演，十月六日十点开始讲演，下午有分科会场形式的发表。第二天大冈信、今井凌雪等出席，上午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结束后不久的二十三日，电视上发布了文化功劳奖的授奖者名单，我又去了东京。

我以前没有参加过学会性的活动。东方学会也只是排列着名字，没有参加过活动也没有发表过论文，因此没有受到学会的推举也是当然的。但是对我的研究感兴趣的大阪大学的加地伸行教授等，发表了极力推荐我的文章。我认为那是宣扬我是在野[2]学者。

但是后来听说，林屋辰三郎先生建议授予我学士院关系的奖，

①读卖书法会是读卖新闻（报社）主办的书法展览会的团体。——译者注。

②在野是不担任官职的意思。——译者注。

林屋先生为办手续上东京之前病重去世，那件事没能实现就过去了。对各位人士的好意我无上感谢,我的学问本质上具有一种反时代的性质,能够受奖是没想到的。

在文部省大臣的授奖仪式上我作为代表读了答词。受奖者中有水上勉先生。他幼年时期离开故乡,历经辛酸,有一个时期在立命馆专业部的夜校文学科学习过。好像比我晚两年,前几年水上先生被推荐为立命馆的名誉馆友时,我也陪同参加了祝贺宴会,谈了怀旧的话题。这是隔了好久的再会。他是福井县若狭之人,我也出生于福井,我们是同乡,所以福井广播电台来采访了。

第二天下午,在宫中拜见、会餐,以两陛下为首的各殿下、妃殿下,各自按顺序就座,就座后开始了讲话。我们桌子的受奖者三位都是八十岁以上高龄之人。皇后问讯了我的年龄,陛下说:“那么说……”于是站起对大家说“干杯”。能够参加这样的典礼,我感到无上的感激。

我 国

现在“东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东洋”一定会恢复,也必须恢复。东亚之地是季风地带,其气候风土一样。在那里营造的生活有史以来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由于法国的殖民地政策，现在像越南那样。有废除汉字的地方,还有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丢弃汉字的地方,因此远离用汉字记载的过去的珍贵的自己国家的文献,这样,文字文化就要消失。从相反的观点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化政策。

汉字成为妨碍教育、减弱人的思维创造力的想法是极其错误

的。认为不努力就能学会的东西,能产生出色文化的想法,应该说是刁猾的想法。在学习条件提高的今天,比以前能够有效地学习,应该期待着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可以看出,人们好像不太渴望知识。对未知的东西好像也不想知道。例如,就是在文字方面也只停留在常用汉字的范围内。是不是掌握更多的汉字知识就是多余的呢?是不是一切都满足于提供的范围便不需进取呢?

知识全部从产生疑问开始。没有疑问就难以得到真正的知识。一开始产生疑问,所有事情就都能看出问题。在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解明的过程中,就产生知识性的世界。同样的,对世上的所有事物都应该进行探索。

我追求"东洋"理想,志向于从历史性的实证开始研究。但是时代与我完全不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我面对走向崩溃的"东洋",为追求更古老、更丰富的"东洋"的原形而彷徨。二十岁时就抱有这个志愿,至今已有七十年。因此我的行动时常被视为反时代的。

我在战后被认为是最民主的母校中的圈外之人。我为何读中国古典、读《万叶集》、论文字、批判限制汉字、论汉字文化的恢复?人们大概认为这是由我的保守性而形成的。我的想法逐渐被一部分人所理解,所注目,是因为我编写了字源字典《字统》吧。我在《字统》的序文中,简明地述说了自己的志向。

但是,"东洋"的恢复,如果首先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恢复,它就难以实现。政治性意义上的"东洋"的恢复,如果东亚的世界首先不恢复本来东亚的世界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吧。

我的履历书是与时代逆行的一个读书人的手记。如果我的研究能给以某些时代性意义的话,那就是与时代逆行,具有反时代性

的性格的缘故,也许反而会反映其时代颠倒的面貌。

以从大正时期黑暗贫困时代成长的我的记忆来说，在现在过于散漫、失节度的社会中,可看出一些异质的东西。在纪律严正的自卫队、警察内部,也渗透着腐败的形迹,企业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在恢复“东洋”之前,首先必须恢复我们的国家。从东洋性的理念来说,贫困也是一种美德。

文字讲话

我两年前接替前任中田勇次郎先生的文字文化研究所。自创立以来正好迎来十周年。其间一年进行四次研究发表会,以公开讲演的形式持续着。我计划发行讲演记录,但是现在的经济状况处于萧条状态,于是考虑得到一定程度的会员数、继续活动,我决定连续讲演。这是我最不擅长、一直回避的事,而且要继续讲演,对于我来说也需要下一定的决心。

我过了年就九十岁了,不知到什么时候还能保持健康,姑且尽量贪得无厌地制定了计划。

我首先想总结著作集。因为稿子是无秩序写的,也没有打算出著作集,所以总结起来会发现许多不足之处。著作集分主题来编,10卷或12卷比较适当吧。现在出版也是困难时期,仅靠学校、图书馆等公共机关的册数也是有限的,也不能让平凡社负担太重。因为我是老年人了,校对就让中国艺文研究会的年轻学者参加。这样著作集12卷的出版就决定了。平凡社的岸本武士先生被任命做编辑工作。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把另外发行的几册出版物再次编辑。首先把油印出版的初期论文的《甲骨金文学论丛》10集,分为上下两册;

把《说文新义》16 卷合并为各 2 卷的 8 册，因为《金文通释》56 辑只是周代金文，把殷代金文的 4 辑作为《殷文札记》加在一起，一共 60 辑，合在一起总共 10 册。

作为二玄社发行的《书迹名品丛刊》的一部分，我编辑了《甲骨文集》1 册、《金文集》4 册，再加上《续金文集》4 册，共编辑 9 册。关于《续金文集》4 册的编辑事务，其目录我已经交给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委托他协助。这些全部要出版，1 月 1 册的话，最少也需要五年。这样，我还必须继续工作五年。以现在的健康状态来说，不发生特殊情况的话，好像暂且还能够继续工作。

我想为了继续工作，做出定期性的计划较好。文字讲话我设想用五年的时间，打算一年进行四次，五年完成计划。为了让大家理解文字文化的事业，一年四次的公开讲座，安排我的文字讲演，设想举办 200 人至 300 人规模的愉快的讲演会。著作集的事也决定了，文字讲话也决定尽早开始。决定了二十次的讲演题目，第一次是“文字以前”，第二次是“与身体有关的文字”，第三次是“身份与职掌”，第四次是“关于数字”，像这样从相关的基本语汇讲起，今年(1999 年)三月开始讲演。

报纸登出通知，第一次参加者超过 250 人。当场发了十页左右的资料，边看时间边讲了一个半小时，稍微休息之后是三十分钟的答疑。因为以愉快地享乐于文字学为目的，我也爽快地说话，质疑答辩也饶有兴趣，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次 300 个座位几乎满座，随着录音的保存、录像的发放、记录的发行等一个接着一个的建议，我嗜好的事逐渐成了不容易的工作。但是如果来参加的各位能够愉快，我也只好愉快地继续游玩。孔子也把“游于艺”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艺是六艺，文字是其

根本中的根本。我也在此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今后把京都国际会馆的一室作为定例的会场，打算和诸位会员一起继续游玩于文字的世界。

游玩

《论语》中有"游于艺"之语，孔子把其视为人生的至境。此艺是六艺、中国古代的学艺[①]。学艺的世界也是游玩的地方。

我也在学艺的世界游玩了许久。在那个世界游玩是我的梦想。但在一生中并不是没有过世间的游玩。年轻时身体虚弱的我，在大阪工作时，休息日登山旅游。登山的旅行路线是，沿着生驹山脉爬到信贵山，在龙田下来。邀请两三个朋友，从这个山峰走到那个山峰，左面是奈良盆地，右面面临茅渟[②]之海，游玩到傍晚。于是，当时的日记起名为"驹茅集"。

在故乡的福井时，傍晚乘凉时在路边下棋，记住了象棋。离开大阪暂时找工作期间，受到关西棋院棋士的推荐，学习了围棋的棋谱，而且接受了几次实际作战的指导。从那以后，就开始看报纸上的围棋。遇见喜欢的棋局，就背下来。

桥本宇太郎九段还是四段时，在大阪的中央公会堂与村岛谊纪四段有对局。当时我去观看了。这场对局是名人本因坊秀哉解说的。名人的扇子稍微一动，接受指示的其他解说员在大盘上进行了十几个棋子的解说。从那以后我也和朋友下过围棋，到京都以后没

①学艺指学术和艺术。——译者注。

②茅渟是从堺市至大阪府南部范围的古称，古称和泉国。——译者注。

有下围棋的朋友了。大学的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的石田幸太郎教授经常和我对局。石田教授棋艺相当高明,之后获得业余爱好者六段的段位。他就是让我两个棋子我也难以战胜。

报纸上的棋谱,吴清源时代的棋谱还留下几种,最近也没有看的机会,所以也没有剪下、保存。我约定和贝冢茂树先生对局一次,也没能实现。

其他兴趣还有看能[1]、听歌谣。但是现在没有享乐的时间。十几年前,为做两眼的白内障手术,住过一段时间医院。那时不能用眼看东西,只能听磁带。歌谣的磁带我在研究室也听。我的研究室面向操场,嘈杂时候较多。那时一放磁带,杂音就被吸收。我妻子也长时间地继续练习着梅若[2]的歌谣。毕业生集会时我们夫妇受到邀请,站着唱歌,结束时两人齐唱谣曲。我在中学时教过的学生,现在也已是超过七十岁的老人了。班里的同学会一年有十次左右。同事几乎都去世了,几乎是我一个人参加聚会。

大学里外地学生较多,没有像同学会那样的聚会。但是我退休的时候,本专业的毕业生组织了中国艺文研究会,定期举办研究发表会并一年发行两期杂志《学林》。

在我的"游玩"中介绍这样的研究活动,也许有些狂妄,但是合乎《论语》中的"游于艺"之语的旨趣吧。他们好像也愉快地游玩于艺术之中,但是我最近忙于著作集的编辑、校正。多亏了大家的帮助,我的著作集从今年(1999年)十一月开始发行。

退休离开大学时,我的书必须从研究室拿出去,所以在京都市

---

①能是日本表演艺术、歌舞剧之一。——译者注。

②梅若是能乐的一派。——译者注。

内的桂(地名)买了一个小家,在空地盖了书库。那书库就是我的工作间。家的前面有三步到头的小院子。那是妻子游玩的场地。妻子爱好花草,在狭窄的地方没有下脚之处地摆放着花盆,早晚一叶一花地进行修整。这里虽然窄小,却各有各的天地。

长寿

十一月五日,实在是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之日。我们夫妇在大女儿津崎史的陪伴下,早上很早就出发赴东京,等待着下午的授奖仪式。

这次受勋对于我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大学退休时,曾有人询问我是否申请授勋。一般来讲,私立大学退休后不办申请手续的人居多。

在研究室期间我几乎没有和妻子去旅行过。退休后搬到京都市内的桂,妻子有机会就出去旅行,但是没有一起远行过。一起出去只是在受奖的时候,就是受奖也是近十年的事。1991年的菊池宽奖、1997年的朝日奖、去年的文化功劳奖,然后是今年的春季游园会、这次的受勋。

这次的授奖仪式是在下午。我们早上出门,仪式结束后当天就回家了。因为是中午的时间,东京车站人群川流不息,夕阳时回到京都车站时,人群的流动也安静下来,这些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寿则多辱"是住在双冈、避开社会的兼好法师①的语句。但是我

①兼好法师(1283?—1352以后):原名吉田兼行。镰仓末期的"和歌"诗人、随笔家。——译者注。

寿命长,编写了三部字典,由此获得了多次受奖。

在研究方面,发行较早的是1955年的《甲骨金文论丛》10辑、《说文新义》16卷、1980年的《金文通释》56辑。这些完成了研究的基础,但为了在社会上普及,需要采取字典的形式出版。

明年四月,我迎来九十岁,妻子八十八岁。妻子长时间付出了辛苦,无论如何也想平安无事地迎接生日那一天的到来。

著作集也总算开始发行,全部发行需要一年。另外,著作集的别卷即使作为月刊也还需要四年。即使全部发行难以期待,也要把稿子准备好。

社会在变,时代风尚也不同了,现在像我这样在尝试学问的领

域里游玩的人好像出乎意料的少。考虑“东洋”问题,考虑到我国将来的文化和国语的将来,此学问的领域应该是特别重要的。

从历史性的观点来看,我国的现状是极不正常的。探索东洋文化的渊源,追溯其展开,追求其历史的必然性,必须考虑实现这些的方法。

汉字是担任探索东洋文化任务的重要纽带。有必要使汉字活性化。必须让汉字更加发挥书写上、表现上的特性,必须恢复以前的丰富的文化。

为了创造具有活力的文化,不对汉字施加限制为好,能够自由地使用汉字、游玩为好。因为游玩能产生自我冲动,能开辟新的世界。

去年见到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讲到预定出版《续金文集》时,关于我国汉字文化、古典教育的现状,我讲了我的忧虑之处。但是,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废除古典会使源泉枯竭,没有源泉就不会流动。

不久就要迎来公元2000年。这是一千年才有一次,是拥有崭新、宏大希望的一年。值此之际,借此让我投稿的机会,对于我来说无比幸福,祝大家过个好年。

白川静先生简历

1955年住在京都市北区时，和长女经常到京都市加茂川散步。

1910年4月

生于福井市佳枝中町。根据他母亲的希望,给他起了一个字的名字,叫静。

1917年4月 7岁

上顺化寻常小学。

1923年3月 13岁

毕业于顺化寻常小学。寻常小学高等科的第一学期结束后的秋天,搬到住在大阪的姐姐家。后来到民政党代议员的广濑德藏的事务所就职,并住在他家里。

1924年春 14岁

到今宫成器商业夜校学习。到三年级的时候,因出勤不足被开

除学籍。他喜爱广濑先生藏书中的《国译汉文大成》，背诵《楚辞》、《唐诗》，还读了《明星》、《昂》文学杂志。另外，受到以万叶调歌人而著名的故乡的橘曙览先生的影响，细读了《万叶集》的佳处，梦想研究《万叶集》与《诗经》的比较。

1927年秋 17岁

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临时返回家乡两个月。从家乡的前辈佐佐木文苑先生那里借来朱子的《诗集传》，抄写至《小雅》末篇。年末由同窗岩永末雄等送回大阪。

1928年春 18岁

通过了大阪府守口市的私立京阪商业学校第二本科的三年级插班考试。子安雄二郎（牛山）先生担任班主任。和老师交换了汉诗。那时读了冈仓天心的《东洋之理想》、前田利镰的《宗教的人间》、久松真一的《东洋的无》等，对“东洋”之语感兴趣。

1930年3月 20岁

大阪府私立京阪商业学校第二本科毕业。

1932年秋 22岁

由于广濑德藏的关系，就职于京都中京区东洞院的白畠正雄

的事务所,并住在他家里。

1933 年 4 月 23 岁

立命馆大学专门部文学科国汉学科入学(第七届学生)。遇见终生的老师国文(日本文学系)的小泉苳三老师、汉文(中国的古文)的桥本循老师。那时,读了吴大澂的《字说》、《说文古籀补》,对古代文字学感兴趣。

1934 年 12 月 24 岁

在小泉老师的指导下,与白木直也、法桥理知、冈本彦一通过了国语科的检定考试,得到文部省中等教育国语科许可证。

1935 年 9 月 25 岁

当立命馆中学教师。担任汉文、国语课(至 1941 年)。已经开始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同时一边编辑当时刊行的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索引,一边阅读。

1936 年 3 月 26 岁

立命馆大学专门部文学科国汉学科毕业。

1941 年 4 月　31 岁

立命馆大学法文系汉文学科入学。当时，探求《皇清经解》中收录的《诗经》、《书经》相关的考证文献。

1943 年 9 月　33 岁

立命馆大学法文系汉文学科毕业。同年 10 月，为立命馆大学预科教授。

1944 年 4 月　34 岁

为立命馆大学专门部教授。夏天，管理舞鹤市(京都府的地名)第三海军火药厂被动员的中学、商业学校的学生。秋天，10 月 7 日在舞鹤市接到中川小十郎校长的讣告。预科的学生被动员的爱知县丰川市由于受到 Grumman(美军战斗机的名称)扫射，所教的学生中出现牺牲者。

1945 年 10 月　35 岁

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大学在校园促进战败后的民主化，开始了教职员资格审查。小泉老师成为牺牲品、成为不合格者。他立刻写了请求复审书，会见中央教职员审查委员长牧野英一博士，但是翌年 11 月决定革职小泉老师。

1948 年 1 月　38 岁

处女论文《卜辞之本质》发表，接着《关于训诂的思维形式》(3月)、《殷之社会》(9 月)先后在《立命馆文学》上发表，这是他在学术界迈出第一步的标志。

1949 年 4 月　39 岁

创刊《说林》杂志，登载《关于诗之兴》。

1951 年 10 月　41 岁

参加创建日本甲骨学会。

1952 年 1 月　42 岁

与角田文卫、梅田忠良、三森定南先生等成立古代学协会，发行机关杂志《古代学》。

1954 年 3 月　44 岁

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那时，孔德成来访日本，与随员的屈万里先生会面，一起参观了静嘉堂文库的书库。从那以后与中国台湾同专业的学者董作宾、陈槃、严一萍、周法高，中国大陆的杨树达、胡厚宣、容庚、杨宽等通信，进行论文、资料的交换。同年 9 月担

任平凡社出版的《书法全集》第一卷的殷、周、秦的解说和释文。在此之后，参加由内藤戊申先生建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贝冢茂树先生为班长的甲骨、金文解读班。得到与来日调查甲骨资料的香港饶宗颐先生见面的机会。

1955年4月 45岁

受到木村英一先生的邀请，为大阪大学文学系的讲师（至1962年3月），给本科生讲中国文学史，给研究生院讲甲骨金文学。并且在楪社的例会进行西周金文的解读和注释，还进行了《说文解字》的讲课。这年的3月《甲骨金文学论丛》初集由立命馆文学系研究室油印，至以后的10集。同年10月受到宇都宫清吉先生的邀请，为名古屋大学文学系讲师（后期课程）。

1957年1月 47岁

参加小泉苳三先生创立的出版社白杨社的计划编辑，编辑汉文教科书《新修高等汉文》三册。

1958年2月 48岁

立命馆大学设置文学部博士课程东洋文学思想专业，讲《诗经研究》。

1960年6月　50岁

《稿本诗经研究(通论篇、解释篇)》两册由立命馆大学文学系研究室油印。10月,《兴之研究》(《稿本诗经研究》别册),同样由立命馆大学文学系研究室油印。

1962年3月　52岁

接受桥本循、吉川幸次郎博士的建议,把《兴之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提交京都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从这年8月起,《金文通释》开始在白鹤美术馆馆志上发表。以后至1984年发表了56辑。

1967年7月　57岁

为文化厅的重要文化遗产审查委员的临时委员。

1969年7月　59岁

《说文新义》15卷、别卷由樸社的社友小野楠雄先生(五典书院出版社)开始发行季刊。1974年完成。

1970年4月　60岁

已到花甲开始新写普及性书籍《汉字》(岩波新书)。从这年开始，陆续为一般性读者新写了《诗经》(中公新书)、《金文的世界》

(平凡社东洋文库)、《孔子传》(中央公论社)等。

1972年1月 62岁

前一年的12月31日到了台北。与樸社的诸位同行前往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五天的调查。

1976年3月 66岁

立命馆大学教授职务退休。4月开始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特别任用教授(至1981年度)。

1981年4月 71岁

被授予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称号。8月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在语言文字组发表论文《古代文字学之方法》。

1982年 72岁

周法高编辑的《金文诂林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78,全8册)全14卷,附录2卷,补1卷的大部分内容,翻译了《说文新义》及《金文通释》的字说。

1983 年 1 月 73 岁

成立中国艺文研究会，创刊内部杂志《学林》。

1984 年 8 月 74 岁

由平凡社出版《字统》。11 月由于出版《字统》，获得每日出版文化奖特别奖。之后，设想《字统》、《字训》、《字通》三部字典。

1991 年 12 月 81 岁

由于《字统》、《字训》等文字研究，获得菊池宽奖。

1996 年 2 月 86 岁

获得京都府文化特别功劳奖。10 月，由平凡社出版《字通》。

1997 年 1 月 87 岁

经过 50 余年宏大的设想形成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及古文字研究，因此获得 1996 年度朝日奖。4 月，为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理事长。8 月，参加在中国沈阳召开的文字文化共同研讨会，进行了基调讲演。

1998 年 7 月 88 岁

出版《诗经·雅颂》(全 2 册,东洋文库)。和 1990 年的《诗经·国风》合并,完成《诗经》的全部译文和注释。8 月,赴上海、郑州、洛阳、南阳,收集甲骨、金文资料。11 月,作为文化功劳者被表彰。

1999 年 3 月 89 岁

在文字文化研究所以文字文化为论题, 开始作了第一次讲演(全部 20 次)。4 月,NHK 电视台的 ETV 特辑,放映"孤高的学者白川静,汉字的宇宙"。11 月,获得勋二等瑞宝章。平凡社开始发行著作集。12 月,日本经济报一个月连载《我的履历书》。

2000 年 1 月 90 岁

NHK 电视放映"年老游心、钻研学术的白川静,汉字的宇宙"。

4 月,由平凡社发行《回思九十年》。

参考《白川静著作集·12·杂纂》2000 年 11 月 平凡社

白川静先生著作目录

1993年在同学会上与夫人吟诗。

著　作

《甲骨金文学论丛》10 集　1955 年 3 月—1962 年 6 月　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

《初集》释史、释文　1955 年 3 月

《二集》作册考、召方考、金文索引一(官制)　1955 年 5 月

《三集》释师、金文索引二(人名)　1955 年 8 月

《四集》周生鲇铭文考释、载书关系字说　1956 年 12 月

《五集》殷代雄族考一郑、金文索引三(地名)　1957 年 12 月

《六集》殷代雄族考二雀、殷代雄族考三畢　1957 年 12 月

《七集》殷代雄族考四肃、殷代雄族考五皋、媚蛊关系字说 1958 年 5 月

《八集》殷代雄族考六亩、殷代雄族考七戉、罪辜关系字说 1958 年 8 月

《九集》羌族考 1958 年 12 月

《十集》安州六器通释、释南、蔑历解　1962 年 6 月

《甲骨金文学论集》(《甲骨金文学论丛》的一部分复印) 1973

年 12 月 朋友书店

释史、释文、作册考、召方考、释师、载书关系字说——古代的诅盟祝祷仪礼与文字、殷代雄族考郑、媚蛊关系字说——中国古代咒术仪礼的另一方面、罪辜关系字说——关于主要的中国古代身体刑法、羌族考

《甲骨金文学论集》(再版) 1996 年 11 月再版 朋友书店

《稿本诗经研究》(通论篇、解释篇)2 册 1960 年 6 月 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

《诗经研究》通论篇(再版) 1981 年 10 月 朋友学术丛书 朋友书店(白川静著作集 10)

《兴之研究》(《稿本诗经研究别册》) 1960 年 10 月 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白川静著作集 9)

《中国学研究法》1961 年 5 月 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白川静著作集 12)

《金文通释》一辑~五十六辑 (白鹤美术馆志) 1962 年 8 月~1984 年 3 月 白鹤美术馆(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殷·甲骨文集》(书迹名品丛刊第三集) 1963 年 8 月 二玄社

《金文集》一~四(书迹名品丛刊第三集)1964 年 2 月~6 月 二玄社

《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下册)1955 年 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东洋精神的母胎》(临时的题目) 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

《说文新义》(一五卷 别卷一)1969 年 7 月—1974 年 6 月 五典书院(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汉字——成长过程和其背景》(岩波新书 747) 1970 年 4 月岩波书店(白川静著作集 1)

《诗经——中国古代歌谣》(中公新书 220) 1970 年 6 月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9)

《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东洋文库 184) 1971 年 4 月平凡社(白川静著作集 5)

《甲骨文之世界——古代殷王朝的结构》(东洋文库 204) 1972 年 2 月平凡社(白川静著作集 4)

《孔子传》(中公丛书) 1972 年 11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6)

《中国神话》1975 年 9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6)

《汉字的世界 1 中国文化的原点》(东洋文库 281) 1976 年 1 月平凡社(白川静著作集 2)

《汉字的世界 2 中国文化的原点》(东洋文库 281) 1976 年 3 月平凡社(白川静著作集 2)

《中国的古代文学 1 从神话至楚辞》1976 年 4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8)

《中国的古代文学 2 从史记至陶渊明》1976 年 11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8)

《汉字百话》(中公新书 500) 1978 年 4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1)

《初期万叶论》1979 年 4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11)

《中国古代文化》(讲谈社学术文库 441) 1979 年 10 月 讲谈社(白川静著作集 7)

《中国古代民俗》(讲谈社学术文库 484) 1980 年 5 月 讲谈社

(白川静著作集 7)
《字统》1984 年 8 月 平凡社
《文字逍遥》1987 年 4 月 平凡社(白川静著作集 3)
《字训》1987 年 5 月 平凡社
《文字游心》1990 年 4 月 平凡社(白川静著作集 3)
《诗经国风》(东洋文库 518) 1990 年 5 月 平凡社
《后期万叶集》1995 年 3 月 中央公论社(白川静著作集 11)
《字通》1996 年 10 月 平凡社
《诗经雅颂 1》(东洋文库 635) 1998 年 6 月 平凡社
《诗经雅颂 2》(东洋文库 636) 1998 年 7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六卷 《神话和思想》1999 年 11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一卷 《汉字Ⅰ》(新写《吴大澂的文字学》) 1999 年 12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二卷 《汉字Ⅱ》2000 年 1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三卷 《汉字Ⅲ》2000 年 2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七卷 《文化与民俗》2000 年 3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八卷 《古代文学》2000 年 4 月 平凡社
《回思九十年》2000 年 4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四卷 《甲骨文与殷史》2000 年 5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五卷 《金文与经典》(新写《金文札记》) 2000 年 6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一一卷 《万叶集》2000 年 7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九卷 《诗经Ⅰ》2000 年 8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一〇卷 《诗经Ⅱ》2000 年 10 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一二卷 《杂纂》2000 年 11 月 平凡社

《编辑字典》2002年1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别卷 《说文新义1》~《说文新义8》2002年1月—2003年3月 平凡社

《文字讲话Ⅰ》2002年9月 平凡社

《文字讲话Ⅱ》2003年2月 平凡社

《桂东杂记Ⅰ》(新写《文字答问》) 2003年6月 平凡社

《文字讲话Ⅲ》2003年12月 平凡社

《常用字解》2003年12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别卷《金文通释1》~《金文通释7》2004年1月—2005年11月平凡社

《桂东杂记Ⅱ》(新写《文字答问》) 2004年4月 平凡社

《桂东杂记Ⅲ》(新写《卯月抄》、《文字答问》) 2005年4月 平凡社

《桂东杂记Ⅳ》(新写《文字答问》) 2006年4月 平凡社

《白川静著作集》别卷《殷文札记》、《金文通释续篇》2006年7月 平凡社

《续文字讲话》2007年2月 平凡社

《桂东杂记Ⅴ》(新写《汉字的系统》、《文字学杂记》) 2007年4月 平凡社

论文

《卜辞的本质》1948年1月 《立命馆文学》62号(白川静著作集4)

《对于训诂的思维形式》1948年3月 《立命馆文学》64号(白

川静著作集 1)

《殷之社会》1948 年 9 月《立命馆文学》66 号(白川静著作集 4)

《关于“诗”之兴》1949 年 4 月《说林》一辑

《关于商颂五篇》1949 年 6 月《说林》三辑

《殷之神话》1949 年 7 月《说林》四辑

《殷之世系——关于所谓六示》1949 年 8 月《说林》五辑

《卜辞关系文献年表》(一)~(三) 1949 年 9 月、10 月、1950 年 3 月《说林》六辑、《说林》七辑、《说林》二卷三号

《帝之观念》1949 年 10 月 《立命馆文学》70 号、71 号、72 号

《殷之族形态——关于所谓亚字形款识》1950 年 1 月 《说林》二卷一号(白川静著作集 4)

《衣祀考》1950 年 4 月《说林》二卷四号

《诗经学的成立》(一)~(六) 1950 年 9 月—1951 年 2 月 《说林》二卷九号~一二号、三卷一号、二号

《殷之基础社会》1951 年 2 月立命馆创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篇(白川静著作集 4)

《大学原始》1951 年 7 月《说林》三卷七号

《尚书洛诰解》1951 年 8 月《说林》三卷八号(白川静著作集 5)

《关于尚书大诰篇》1951 年 9 月《说林》三卷九号(白川静著作集 5)

《周初的对殷政策和殷之余裔——特别以召公问题为中心》(上、下) 1951 年 9 月、1952 年 3 月《立命馆文学》79 号、82 号

《关于令彝——周公子明保与康宫》1951 年 12 月《说林》三卷一二号

《周初殷人活动——作为主要的军事关系考察》1952 年 1 月

《古代学》一卷一号

《西周期东南地域的政治与文学——周南·召南和其背景》1953年5月

《立命馆文学》九六号

《胡厚宣先生的商史研究——甲骨学商史论丛》(上、下) 1953年11月、12月

《立命馆文学》一〇二号、一〇三号(白川静著作集4)

《殷代的殉葬与奴隶制》1954年1月《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2》(白川静著作集4)

《殷的王族与政治形态》1954年3月《古代学》三卷一号(白川静著作集4)

《屈原的处境》(上、下) 1954年6月、7月《立命馆文学》一〇九、一一〇号(白川静著作集8)

《释南——殷与南方文化、其一》1954年10月《甲骨学》三号(之后收录在《甲骨金文学论丛》10集)

《小臣考——殷与南方文化、其一》1955年1月、2月《立命馆文学》一一六、一一七号(白川静著作集4)

《楚辞丛说》(上、下) 1955年5月、6月《立命馆文学》一二〇、一二一号(白川静著作集8)

《蔑历解》1956年10月《甲骨学》四、五号

《诗经所见农事诗》(上、下) 1956年11月、12月《立命馆文学》一三八、一三九号

《楚辞天问小笺》1957年11月、12月《立命馆文学》一五〇、一二五一号 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创设三十周年纪念论集 (白川静著作集6)

《中国古代的共同体》1958 年 12 月《古代学讲座·共同体研究》(上)古代学协会编 理想社(白川静著作集 4)

《矗羌钟铭文考释》(上、下) 1959 年 1 月、2 月《立命馆文学》一六四、一六五号

《周颂的成立》(上、下) 1960 年 6 月《立命馆文学》一八〇号(桥本循先生古稀纪念特集)

《诗经蠡说》1960 年 7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篇》(庆祝董作宾先生 65 岁论文集上册)(白川静著作集 12)

《兴的构思的起源和其展开》(上、下) 1961 年 1 月、2 月《立命馆文学》一八七、一八八号

《从甲骨文来看殷代社会》1961 年 4 月《历史教育》九卷四号

《甲骨文的解读》(上、下) 1961 年 10 月《古代史讲座第一·古代史学序说》学生社

《大丰鮎的时代》1962 年 2 月《立命馆文学》二〇〇号(创刊二百号纪念特集)

《金文賸》(一、二) 1962 年 6 月《立命馆文学》二〇一、二〇四号

《西周彝器断代小记》1965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6》(庆祝董作宾、董同龢两先生论文集上册)(白川静著作集 12)

《西周后期的金文和诗篇》1967 年 6 月《立命馆文学》二六四、二六五号(桥本循先生 77 岁寿辰纪念特集)

《作为资料的西周金文》1970 年 9 月《历史教育》一八卷七号

《文字学的方法》1970 年 5 月《文学》三八卷九号岩波书店(《文字逍遥》)

《汉字的构成》1972 年 4 月《书道讲座第五卷》二玄社(《文字逍遥》)

《万叶集与中国思想——关于其接受方法》1973 年 5 月《万叶集讲座第二卷》有精堂(白川静著作集 11)

《古代歌谣的世界——诗经和万叶集》1973 年 6 月《讲座比较文学第一卷 世界中的日本文学》东京大学出版社(白川静著作集 11)

《汉字和文化》1974 年 2 月《亚洲文化一一卷二号》创价学会东洋哲学研究所(《文字逍遥》)

《金文学前史》(上、下) 1974 年 5 月、7 月《立命馆文学》三四六、三四七、三四八、三四九号

《金文学的方法》(上、中、下) 1975 年 3 月、5 月、7 月《立命馆文学》三五五、三五六、三五七、三五八、三五九、三六〇、三六一号

《神话和经典》1976 年 11 月《中国哲学史的展望和摸索》(木村英一博士颂寿纪念论文集)创文社(白川静著作集 6)

《西周史的诸问题》(上、下) 1976 年 12 月、1977 年 5 月《立命馆文学》三七七、三七八、三八二、三八三号

《新出土青铜器铭文考释》(上、中、下) 1978 年 5 月、7 月、9 月《立命馆文学》三九四、三九五、三九六、三九七、三九八、三九九号

《两周青铜器释文》(上、中、下) 1979 年 12 月、1980 年 3 月、9 月《立命馆文学》四一二、四一三、四一四、四一五、四一六、四一七、四二二、四二三号

《淮戎与氏诸器》1980 年 6 月《立命馆文学》四一八、四一九、四二〇、四二一号(三田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集)

《关于吕刑系统书篇》1980 年 9 月《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

洋学论文集》柳盛社(白川静著作集 6)

《再论蔑历》1980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1》(纪念李济、屈万里两先生论文集)(白川静著作集 12)

《中国文学和万叶集》1981 年 9 月《国文学·解释与鉴赏》四六卷九号至文堂(白川静著作集 11)

《金文学史 1》(许礼平翻译) 1981 年《中国语文研究》(香港)第三期

《金文图像的体系》1985 年 5 月《中田勇次郎先生颂寿记念论集、东洋艺林论丛》平凡社

《古代文字学之方法》1986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白川静著作集 12)

参考《学林》第 46、47 号《白川静先生著作目录》2008 年3 月立命馆大学 中国艺文研究会

白川静著作中文翻译出版现状

张莉

1998年在仙台演讲之后到岩手县的中尊寺。

一、中国大陆

白川静博士著作译本：

1.『金文通釋』,白川静著,白鶴美術館,1962年8月~1984年3月。

《金文通释选译》,曹兆兰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2.『中国の神話』,白川静著,中央公論社,1975年9月。

《中国神话》,王孝廉译,长安出版社,1983年。

3.『漢字の世界1·中国文化の原点』,『漢字の世界2·中国文化の原点』,白川静著,平凡社,1976年1月、1976年3月。

《汉字》,朱家骏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

4.『金文通釋』四六輯、四七輯「西周史略」,白川静著,白鶴美術館,1977年4月、1977年10月。

《西周史略》,袁林译,三秦出版社,1992年5月。

5.『中国古代の民俗』(講談社学術文庫),白川静著,講談社,1980年5月。

《中国古代民俗》,何乃英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11月。

6.『常用字解』,白川静著,平凡社,2003年12月。

《常用字解》,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 年 10 月。

白川静博士论文的翻译:

1.「周初における殷人の活動一主として軍事関係の考察」,白川静著《古代学》一卷一号,1952 年 1 月。

《周初殷人活动》, 刘志扬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 3 卷·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 年 11 月。

2.『金文通釋』三八輯,「東土諸器一·斉公器」,白川静著,白鶴美術館,1972 年 9 月。

《齐侯盘》,高广政译,《管子学刊》,2003 年 1 期。

3.『金文通釋』四一輯·四二輯,「通論篇一」「通論篇二」,白川静著,白鶴美術館,1974 年 6 月、1974 年 7 月。

《金文學史》(一)(二), 許禮平譯,《中國語文研究》(香港),第 3、6 期 1981 年。

研究白川文字学现状:

1.著作:《青铜器铭文研究——白川静金文学著作的成就与疏失》,白冰著,学林出版社,2007 年 6 月。

2.论文:《白川静“金文学史”的汉语文字学成就》,白冰著,《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

论文:《白川静“金文之世界”校补(选辑)》,白冰著,《古汉语研究》2005 年第 3 期(总第 68 期)。

论文:《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及其文字学思想》,刘海宇著,《汉字文化》2007 年第 4 期(总第 78 期)。

3.论述:《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赵诚著，书海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五章"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的金文研究"的第六节"金文通释"。

论述：《中国古文字学基础》(复旦大学文博系列教材)，朱顺龙、何立民编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七章"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第二节"20 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二、中国台湾

白川静博士著作译本：

1.『詩經ー中国の古代歌謡』，白川静著，中央公論社，1970 年 6 月。

《詩經研究》，杜正勝譯，《幼獅月刊》，學術叢書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4 年 9 月。

《詩經的世界》，杜正勝譯，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6 月。

2.『金文の世界——殷周社会史』，白川静著，平凡社 1971 年 4 月。

《金文的世界》，温天河、蔡哲茂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年 8 月。

3.『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構造』，白川静著，平凡社 1972 年 2 月。

《甲骨文的世界——古殷王朝的締構》，温天河、蔡哲茂譯，巨流圖書公司，1977 年 9 月。

4.『漢字百話』(中公新書)，白川静著，中央公論社，1978 年 4 月。

《漢字百話》，鄭威譯，大家出版，2012 年 4 月。

5.『中国古代の文化』,白川静著,講談社,1979 年 10 月。

《中國古代文化》,加地伸行、範月嬌譯,文津出版社,1983 年 5 月。

白川静論文的翻譯:

1.「訓詁に于ける思惟の形式について」,白川静著,『立命館文学』六四号,1948 年 3 月。

《對於訓詁的思维形式》,徐復觀譯,『民主評論』9 卷 7 期,1958 年 4 月。

2.「董作賓教授を想う」,白川静著,『古代文化』一三卷四号,1964 年 10 月。

《懷念董作賓教授》,梁英茂譯,『中国文字』18 号,1965 年 12 月。

3.「作冊考」,『甲骨金文学論集』,白川静著,朋友書店,1973 年 12 月。

《作冊考》,鄭清茂譯,『中国文字』39、40 号,1971 年 3 月、1971 年 6 月。

4.『中国古代の民俗』,白川静著,講談社,1980 年 5 月。

《月令的形式》,(七章一節)、《採桑女》(六章二節),範月嬌譯,『日本漢学論文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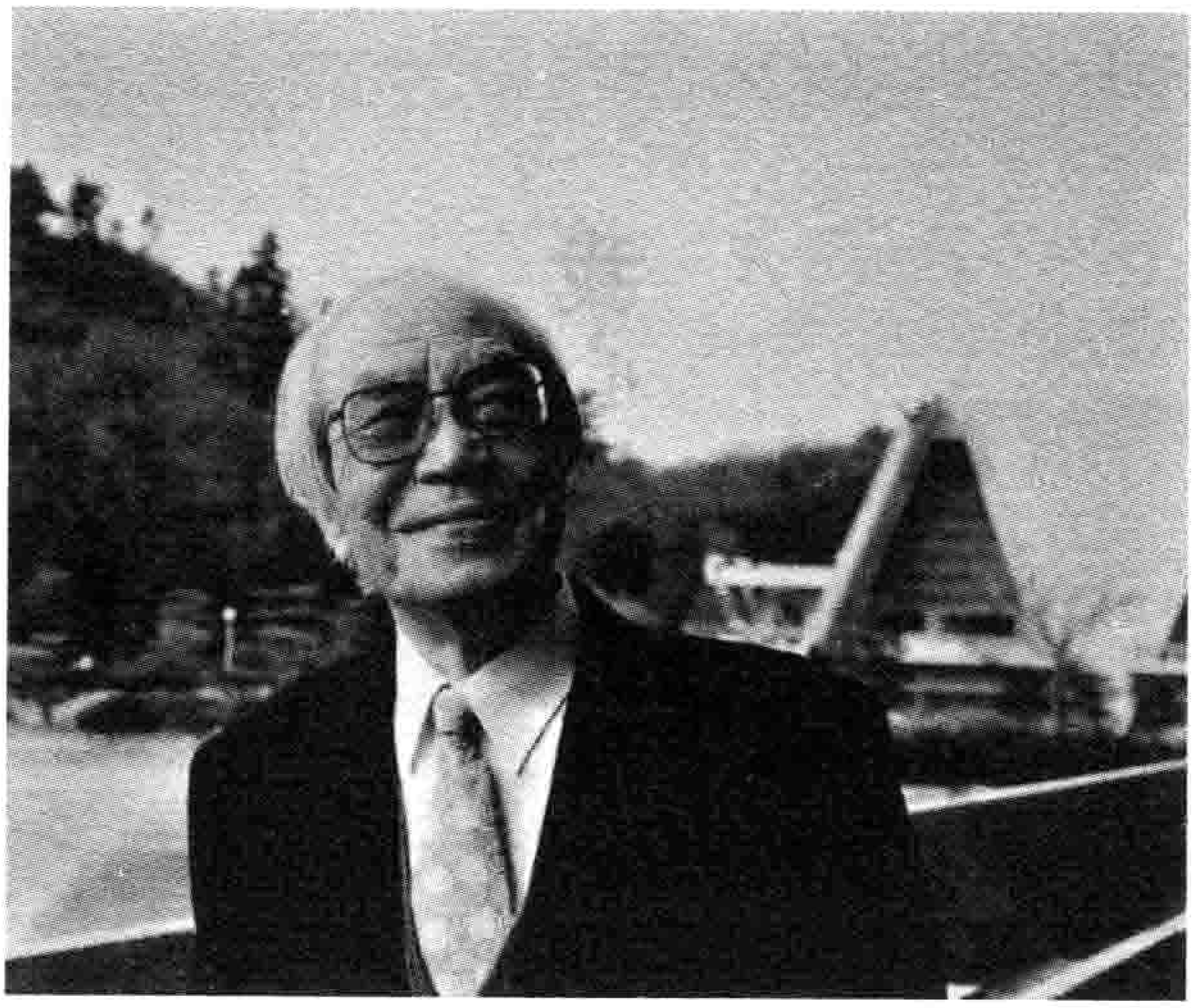
5.「淮戎と㦰氏諸器」,白川静著,《立命館文学》418~421 号,1980 年 6 月。

《淮戎與㦰氏諸器》,範月嬌譯,《日本漢学論文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 1 月。

我心中的父亲*

津崎史

*本文来源于《月刊　百科》,2007 年 1 月号。



2002 年于“文字讲话”的会场，京都国际会馆。

再给我两年的生命——这是父亲对医院的医生及护士所说的话。我想这是父亲如果再有两年健康的身体、能够完成著作集的强烈愿望的表现。10月6日住院的时候，坚信及早治疗便能恢复精神、稍微恢复健康就能够出院的父亲，好像认为这只是需要暂时的休养。

但是，在进行检查过程中，他被诊断为内脏各处不良。抽胸水等都是第一次经历，父亲好像对健康失去了信心。

尽管如此，他对工作的热情没有减退，脑子中考虑着新稿子的计划。到了紧要关头想到也许不能回家时，他便吩咐《金文集》[1]的出版委托给A氏和B氏，把《桂东杂记V》整理后寄出，放在立命馆“白川静研究所”[2]的书籍，放在福井市的“白川文字学之室”之物等，把能想到的都说了出来。父亲一边确认我记的笔记，一边说：“你都记清楚了吗？”遗嘱全部是有关工作的。

大约住院三个星期，除了去世前的最后几天外，他的意识都非

①白川静著作集别卷《新修金文集》。

②立命馆大学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

常清醒。住院期间，听着父亲讲了文字、《源氏物语》、《万叶集》等故事，还夹杂着我喜好的文学故事的对话。这对我来说内容充实而深刻，是难得的时光。

1998 年于岩手县中尊市金堂。在仙台演讲后和长女史去旅行。

父亲去世前几天出现了幻觉症状，看到天花板好像稿子。有铅字、有的地方有甲骨文。他拼命地注视着——那写着什么呢？即使那样，把天花板看成稿子的人太少见了吧。

父亲一生工作到最后。最后的讲演是 9 月 16 日。住院的前一天 10 月 15 日，他校正完成《续·文字讲话》的初稿。在身边能够看到 96 岁仍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工作的身影，是非常幸福之事，并且我理解为，通过讲演、著作充满干劲所讲的对汉字之爱，对《诗经》、陶渊明的倾心，对孔子生活方式的感怀，对于学问等所倾注的不尽激情，从他的磁带录音中的讲演的语调与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表现出来。

除了工作之外，父亲还有多种兴趣爱好。好像从年轻时就喜好围棋、日本象棋，经常看电视的对局。谣曲好像是幼时其长兄学唱时，他听后而记住的。我母亲一开始唱谣曲，二人就齐唱。在医院他也把“松风”[①]等磁带带来，有时和着音乐唱谣曲。体育方面喜欢看相扑，不放过棒球选手 Ichirou（铃木一郎）、松井秀喜的电视节目，因与花样滑冰的 Arakawa Shizuka（荒川静），只是一字之差而有亲密感情，即使清晨深夜也观看比赛。有时散步途中身体向后仰，做出花样滑冰的姿势 Inabauer[②]。

父亲对新事物非常感兴趣，他常用电子辞典，对数码相机、电脑也饶有兴趣。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好奇心，他才一直保持年轻。

母亲住院以来过了七年，我每天陪在父母身边，增长了很多见识。其中最大的收获也许是父亲“体谅人”之处。他从不考虑自己，

①谣曲的曲名之一。——译者注。

②花样滑冰的技巧之一。——译者注。

而经常挂虑对方。这是很难办到的。身体不舒服也不让人看出来。痛苦得要倒下了也不想让人担心,这也许是明治时代的人的精神。自己不去主张,结果自然会出现,结果不是应该追求的,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我也想尽量继承父亲的生活态度去生活。

遇到困难、不知解决的办法时,我总是“爸爸,怎么办呢”,去跟父亲商量。我失去了巨大的顶梁柱而深深地感到寂寞,茫然地凝视着留下的稿子、书库的书籍。

不归的父亲往天国之旅的早上,上弦月光朦胧。

十月三十日 津崎史

后记

张莉

1934 年在京都车站，为参加教员资格证书考试赴东京。
穿和服的是白川静先生(右)。

白川静博士在汉字文化中追求博大精深的世界，他的学问体系被世人称为“白川学”，并开拓了“白川文字学”领域。白川文字学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以古解古”，批判许慎的“以今解古”的方法；二是系列字的研究方法。

《甲骨金文学论丛》初集的《释史》、《释文》，最早在1955年3月由立命馆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油印，1973年12月由朋友书店复印出版，又修改后登载在2008年6月由平凡社出版的《白川静著作集》别卷《甲骨文金文学论丛》(上)。这次翻译的《释文》和《释史》是根据《甲骨金文学论丛》上(平凡社)中登载的两篇论文。

《释文》和《释史》的特征是白川博士列举大量甲骨文、金文的各种事例论证文字解释。在中国、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研究文字的学者中没有发现用这样的论证方法探求文字字源的学者。白川博士的论文难以理解，即使日本人整个通读这些论文者也极少见。《释文》和《释史》难解的原因是字源的解释必须以广泛的事例进行论证。《释文》比《释史》容易理解，也论述了中国及日本其他学者的字说，哪个正确在阅读过程中就能一目了然。《释史》相当难解，通过多数甲骨文、金文事例来分析“史”与“事”、“使”的区别。这些文字解释的根源

中存在着“ㅂ”字。我想“ㅂ”字的解释是白川博士最出色的功绩。他论文中对“ㅂ”的解释与“史”、“事”、“使”的解释毫无矛盾、保持吻合,望读者确认为盼。把白川博士的文字学方法所暗示的文字学的未来的研究方向介绍给中国读者是我翻译这两篇论文的初衷。

从《我的履历书》和著作目录,可知白川博士是如何以专心致志的态度埋头于研究的。96岁的生涯以“一以贯之”为志向,全神贯注于文字学。晚年捐献巨额资金,2005年5月在立命馆大学设立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任名誉研究所所长。白川博士捐赠给研究所《皇清经解》、《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本居宣长全集》等大量藏书、资料及一部分手稿。非常遗憾的是,2006年10月白川博士仙逝。2008年1月白川博士家属把遗留的藏书及手稿捐赠于立命馆大学,图书馆用了两年时间整理这些藏书,终于在2010年5月,正值白川博士诞辰100周年之际,在立命馆大学图书馆开设了“白川静文库”,共计17692册,并发刊约达500页的《白川静文库目录》。白川博士对生活的豪迈的气概,令人钦佩。我读了《我的履历书》,被白川博士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生活方式所感动。

我于1996年10月到日本留学,幸运的是2007年4月至2011年3月能在立命馆大学任教,担任汉语教学。可惜那时白川博士已经去世,我没有过与白川博士谈话的机会。我在京都大学读博士课程时,去听过白川博士的“文字讲话”。自那以后开始学习白川文字学。2009年4月开始担任立命馆大学开设的“白川学的世界”讲座中的“从中国视角看白川文字学”一节课。从那时起我决心翻译白川博士的著作。我首先感谢白川静博士。

2010年7月我参加了在福井县举办的白川静诞辰100周年纪念公开座谈讨论会,在会场有幸见到白川博士的女儿津崎史女史

和她的丈夫津崎幸博先生。他们读了我的拙作《从中国视角看白川文字学——关于白冰著〈青铜器铭文研究——白川静金文学著作的成就与疏失〉》(立命馆大学《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纪要》2010.3),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承蒙津崎夫妇的好意,几天之后给我寄来了很多白川博士的著作,我万分感激。这次翻译出版得到白川博士的女儿津崎史女史、深田都女史、羽田节子女史的协助。特别是津崎史女史还提供了白川博士的珍贵的原版照片。同时,日本平凡社的竹内凉子女史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立命馆大学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高岛敏夫先生的热心指教。出版之际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华老师、伍绍东编辑的帮助,特别是伍编辑对我翻译的中文精心审阅,并给予了多处修改,为出版此书竭尽全力,方得顺利与读者见面。在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我到日本留学之前在天津市少年宫任书法教师,那时师从于著名书法家曹柏昆老师。曹老师对书法的执著追求,让我产生敬佩之情。这种精神时常鼓励着我。读了白川博士的履历书,我不禁想起曹老师。此译本也献给尊敬的曹柏昆老师。

对于日语中难解部分,我先生出野正给予了通俗平易的说明。我深表谢意。另外,衷心地感激允许我到日本留学的双亲,愿这小小的译本能让天津的父母和弟弟露出欣慰的微笑。

白川博士的论文内容复杂,多采意译,难懂之处加上注释。由于译者学识疏浅,译文错误或不妥之处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赐教。

2012 年夏 译者记于日本奈良